

6065/13

出版说明

本书是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编写的，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由日本青年出版社出版。它集中记录了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日中友好运动的史实。

这部友好运动史指出，日中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道路是坎坷不平的；日本从事日中友好运动的团体与各界友好人士为了促进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好合作，开展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争取两国邦交正常化等，作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唤起广大日本人民关心并投身于友好运动中，才获得了今天的成果。

这部友好运动史记录了中国政府及有关团体和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下，给予日本人民的斗争以巨大的支持和援助。毛主席曾多次会见日本各方面的访华团体或人士，包括友好地会见田中角荣首相，手书鲁迅先生的诗赠送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并为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团题词；周总理曾会见过数以百计的日本各方面人士，包括政府首脑、各政党领导人、工商业界代表、文化人、作家、评论家、记者、演员、体育运动员等等，并向他们表达了中国人民希望与日本人民世代友好合作的愿望。这一切都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历史增添了无限的光辉。

这部《日中友好运动史》较好地体现了日中两国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兹翻译出版，内部发行，供有关单位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同志参考。

前 言

一九七二年九月，日中两国人民多年的夙愿——日中恢复邦交实现了。我们认为，这不单纯是通过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所取得的，也是日本国民与中国人民长期共同斗争的成果。当时中国的领导人也指出了这一点，并强调了“饮水不忘掘井人”。

确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中关系的特征是：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一贯冷眼看待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的成果；与此相反，日本广大的国民则在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寻求同中国友好；而且日本国民的这种努力一向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终于成为推动日本政治的动力。尽管政府之间的极不正常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二年，但是，在民间，人民的交流自一九五二年以后逐步获得了扩展，经济交流也冲破了政府的阻碍，开始发展；日本国民中根深蒂固的陈腐中国观，也一一被粉碎了。总的来说，日中友好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反映国民的愿望，始终领导日本国民争取日中友好，从而推动运动持续地前进。

战后日中友好运动的起点，可以追溯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这以前，几十名战前与战争期间一直从事研究中国的人员，在一九四六年检查了过去研究中国的工作并作了反省，重新组织了研究团体；从一九四八年前后开始，许多大学的学生也组织了中国研究会。不过，这些还不能称之为一个运动。

但是，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间，中国革命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日本的有识之士也从中看出了中国革命必定胜利。这种

状况同国内对占领军实行种种经济压迫的不满情绪结合在一起，乃使国内要求日中贸易的愿望，从一九四九年初开始高涨；同年五月，一部分经济界人士组织了“中日贸易促进会”，部分国会议员组织了超党派的“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十月十日，人们激动的心情尚未平静下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筹备会又宣告成立。友好协会经过一年的准备工作后，以二十多个地方成立的支部为基础，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

这样开始的友好运动，不久就因在朝鲜战争爆发的更加严酷的形势下，遭到占领军的压制而未能向国民充分扩大影响。一九五三年初，协会从事协助在华日本人归国这一全民性的事业之后，友好运动才冲破这种“遏制”的壁垒，开始影响广大国民。这项援助在华日本人归国的工作，一方面是首次与中国的人民团体中国红十字会等共同进行的事业，另一方面也是友好运动能够不受意识形态差异的影响而同广大友好力量相结合的第一步。这次运动的成果之一是，终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派遣的第一批友好使节——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迎到了日本。在此新形势下，促进日中贸易的运动，也在工会的支持下，作为一个全国性的独特的运动而获得发展。

这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日中友好运动，正如本书所叙述的，在经常开展“宣传和了解中国”活动的同时，始终致力于为恢复日中邦交而大造舆论，并组织了多次运动，其中包括开展象一九六六年“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那种两千年历史中前所未有的年轻一代大规模的交流活动。我们作为运动内部的人，无意夸耀我们的运动的成果。但是，我们感到具有四分之一世纪历史的日中友好运动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国民运动，它不是什么上层人士的社交活动，也不是单纯的文艺和技术交流，它包括了促进国民真正相互了解并

同阻碍它的人进行的斗争，是各阶层人士完全以尽义务的方式来开展和不断扩大的运动。大家都知道，日本战后的历史记录下禁止原子弹氢弹、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维护宪法以及支援越南人民等许多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而日中友好运动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民运动，它的历史应当与这些运动一起载入史册。要正确了解战后的日中关系，就不能忽视两国人民通过这个友好运动而建立起来的团结合作关系的成果。编写本书的目的，首先是新旧参加友好运动的人士记录并保存这一历史。

当然，我们希望读者通过本书不仅了解日中恢复邦交以前的“掘井”历史；记载这段“掘井”历史本身固然是一件重要的工作，但同样重要的是，也希望读者能够明确地认识到，具有这种传统的日中友好运动的任务，决没有随着日中恢复邦交而告结束。

回顾恢复邦交以后的日中关系，证明正常的国家关系对于亚洲和日中两国是多么重要；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日本方面以邦交正常化这个大前提来实际促进日中友好的，决不是政府机关，而是各阶层的国民和民间团体。例如，在恢复邦交以后的三年期间，东京和大阪举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很多艺术团体来日本演出，两国的体育团体进行了友好比赛，而日本主办这方面工作的单位，都是民间团体。又如作为恢复邦交后的新生事物之一，中国的城市与日本的城市互相结成了“友好城市”；此外，地方自治体^①以“青年之船”、“农民之船”和“友好之翼”等形式，负责组织了大批人员访华。这一切都是作为多年来友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开花结果。两国的民间交流将会越来越频繁。因此，肩负交流工作的组织和协助的责任，友好运动的任务将会越来越繁重。

^① 亦称地方自治团体、地方公共团体或地方团体。据日本地方自治法规定，分为普通（都、道、府、县、市、町、村）和特别（如特别市、特别区等）两种。这里指前者，它们实行地方自治，对国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译者注

此外，就政府间的关系来说，日中航空协定的谈判花了十六个月的时间；至于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日本方面甚至对确认日中联合声明中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条款也犹豫不决，可见政府之间的相互理解还处于相当低的水平。日本方面对待日中友好的态度，仍旧国民是先进的，政府是落后的。而且还决不能够轻视那种不愿同中国友好而想同台湾的蒋帮勾结的动向。这些都是日中关系长期不能正常化所留下的后遗症。这些严峻的事实，表明了日中友好运动不应该是随着日中复交而结束，而是迎来了争取“世代友好下去”的更加重要的阶段。我们将在本书第一部分的第五章里，详细地阐述这个问题。

另外，协会在二十五年前是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的名称而成立的，为什么从一九六六年十月以后，在协会的名称后加上了“（正统）”两字呢。本书要回答人们产生的这个疑问。关于这个问题的事实经过，很多人至今还不十分了解。这是一九六六年以后，代代木的“日本共产党”^①开始阻挠和破坏日中友好运动，协会在对付这种阻挠和破坏的过程中所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措施。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一部分的第四章和第二部分的部分回忆文章，详细地叙述了当时的事实经过。自那时以后，已经过去了八个年头，但直到现在，“日共”仍然把“日中友好协会”的招牌挂在那个同中国不进行任何交流的分裂集团的门口。这件事本身就暴露了这个政党阴险而顽固的反华本质。为了同这个伪组织划清界限，所以我们至今还保留“（正统）”这两个字。

本书就是以上面所提到的问题为重点，并作为“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事业”的一部分而编写的。编辑与执笔工作由纪念事业委员会下设立的编辑委员会（委员长：岩村三

^① 指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因其总部设在东京涩谷区的代代木车站附近，故名。——译者注

千夫^①，委员：岛田政雄、坂田辉昭、依田喜家、长岛又男、林茂、福井肇）担任。在起草的时候，不只是注意本组织内部的活动，而且努力联系二十五年来中日关系，阐明友好运动的巨大潮流，和日中恢复邦交后如何延续和发展这一潮流。关于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方面，未经本协会直接负责组织的部分也尽可能搜集记录。至于友好团体所采取的方针等，避免作深入的分析。我们热烈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得到各有关方面的协助，写出更充实的日中友好运动史来。

在以我协会为中心的二十多年运动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方针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本书在涉及这些问题时，避免加以评论，而着力于叙述运动的巨大洪流。我们希望本书有助于早就从事友好运动的“老朋友”进行回忆和总结运动的工作，也能成为新近关心运动的“新朋友”的指南。最后殷切地盼望读者能给本书的内容提出坦率的意见。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日中友好运动史》
编辑委员会

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

① 岩村三千夫（1908—1977），新潟县人，一九三一年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一九三七年入《读卖新闻》社工作，一九四六年参加中国研究所的创立工作，任常务理事，一九四九年参加日中友好协会的创立，任副理事长和机关报《日本与中国》编辑委员长，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和日中友好运动，著有《中国学生运动史》、《现代中国的历史》和《新中国二十年史》等。——译者注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日中友好运动史

序章 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	2
--------------------	---

第一章 日中友好协会的诞生	6
---------------------	---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

(一) 筹备会期间	6
-----------------	---

筹备开始	6
------------	---

发起人大会	8
-------------	---

朝鲜战争与日中友好会议	9
-------------------	---

反对造谣诽谤	10
--------------	----

(二) 协会的成立大会	11
-------------------	----

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	11
----------------------	----

组织广大群众的工作方针	12
-------------------	----

(三) 美国占领军的镇压	13
--------------------	----

考验的岁月	13
-------------	----

镇压分发《人民日报》事件	14
--------------------	----

(四) 同单独媾和作斗争	16
--------------------	----

日本人民要求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	16
-------------------------	----

中国的呼吁	18
-------------	----

纪念“七·七”行动月	19
------------------	----

第二章 开辟了友好的道路·····	24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	
(一)“遏制”的壁垒·····	24
单独媾和与周恩来声明·····	24
奋起反对“日台条约”·····	25
(二)依靠全体国民的力量开展日中贸易·····	25
战后日本人首次访华·····	25
第一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缔结·····	27
(三)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28
组成六十人的大型代表团·····	28
《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	29
(四)开辟友好往来的道路·····	30
促进在华日本人归国问题的解决·····	30
悼念中国殉难烈士的活动·····	32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来日·····	34
(五)以累积方式活动的三年·····	36
争取扩大交流·····	36
日中民间渔业协定的缔结·····	39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成立与划时期的第三次贸易协定的签订·····	42
打开学术、技术交流的门户·····	43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频繁的文艺交流中诞生·····	44
日本工人应邀参加北京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48
第一次体育交流·····	49
青年互访的开始·····	50
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代表团来日·····	50
日中友好扩大到地方性的交流·····	51
“人道与宽恕”——释放战犯·····	52

商品展览会分别在日本和中国举办·····	55
第三章 同非友好行动作斗争到友好交流恢复 ·····	57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	
(一) 贸易及其它交流的中断·····	57
岸信介首相访问台湾·····	57
破坏第四次贸易协定·····	58
长崎国旗事件·····	61
提出“政治三原则”·····	62
刘连仁事件·····	63
(二) 打开危机与反对“安全条约”·····	64
同制造“两个中国”作斗争·····	64
“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65
反对一九六〇年“安全条约”与打开日中关系的运动·····	69
社会党浅沼委员长遇刺逝世·····	72
(三) 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	73
重开友好贸易·····	73
“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的开始·····	76
盼望中的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	79
第四章 恢复日中邦交的实现 ·····	85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	
(一) “中苏论战”公开化·····	85
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85
一九六四年的事件·····	87
佐藤内阁上台·····	88
(二) 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	90
五百名日本青年访华违反国家利益吗?·····	90
毛主席接见日本青年·····	92

(三)“日共”堕落为反华集团与协会改组为协会	
(正统)	94
第二次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遭到破坏	94
同破坏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的行为作斗争	96
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的旗帜下前进	98
(四)同来自四方面的破坏作斗争	99
善邻学生会馆事件等	99
暴风雨的时代	102
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106
(五)开展大规模的争取恢复邦交的国民运动	108
“两个中国”谎言的破产	108
“团结胜利的大会”和协会的发展	110
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权利和尼克松访华	112
抓住了“复交三原则”	114
“八·二〇”中央集会和政府代表团访华	116
第五章 邦交恢复后的形势和友好运动的新阶段	120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	
(一)“新篇章”的开始	120
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120
联合声明所表明原则	121
新形势的特点	123
(二)友好运动的新阶段	126
“任重道远”	126
一九七三年度全国代表大会的成果	128
(三)广泛发展的友好交流	130
日本列岛上的友好热潮	130
结成友好城市	131

“青年之船”、“友好之翼”	133
中国展览会的巨大成果	133
(四)同政治任务相结合	135
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仍在活动	135
要求缔结航空协定的斗争	137
波澜壮阔的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运动	139
结束语——“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45

第二部分 二十五年友好的回忆

第一批春燕——回忆访问新中国的日子	帆 足 计 150
回忆日侨归国问题的谈判	岛 津 忠 承 154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日本代表团访 华始末	官 崎 世 民 159
回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和“备忘录 贸易”——怀念松村、高碕先生	冈 崎 嘉 平 太 165
中日友协的成立	西 园 寺 公 一 169
中国展览会在与三种反华势力斗争中胜利展出	川 濑 一 贯 172
我们协会史上的一幕剧——一九六六年的情况	黑 田 寿 男 178

第三部分 日中友好运动资料

日中友好运动重要文献	184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成立宗旨(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184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于成立大会上通过的工作方针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186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于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章程（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190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于成立大会上通过的中央总部干部（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192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成立大会致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的电文（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	196
《人民日报》社论 中日友好的里程碑（一九六三年十月五日）.....	197
中国政府关于进行原子弹试验的声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199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关于中国进行原子弹试验的声明（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201
三十二人声明——面临国内外危机，为促进日中友好，再告国民书（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203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代表团和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的共同声明（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	206
关于革新日中友好运动的声明（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209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处的支持电（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211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214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关于日中复交的声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215
《人民日报》社论 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一九七二	

年九月三十日)	216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在欢迎日本有关友好团体 访华团、参观团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二年十 月二十三日)	219
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团长廖承志在日中友 好协会 (正统) 一九七三年度全国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221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在一九七四年度全国代表 大会上决定的中央总部干部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 十七日)	223
日中友好运动史年表	228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

第一部分

日中友好运动史

序章 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

“啊，是他！”

郭沫若团长不觉发出了深深的感叹声，突然停下了脚步，站在奈良唐招提寺开山堂的日本国宝鉴真和尚的干漆像^①前。一千二百年前，这位双目失明的高僧就是这样泰然自若、瞑目深思地在坐禅的。郭沫若先生一动不动地凝视着这尊坐像，在他心中该是百感交集啊！

那天是一九五五年（昭和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郭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访日学术考察团团长，率领十四名学者，于十二月一日在羽田机场降落，来到了日本。第二天，他去已故的大山郁夫^②家吊唁之后，访问了日本学术会议^③；从三日开始，同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东北大学进行了专业的学术交流；八日，参加了在大隈礼堂^④举行的大山郁夫先生的追悼会；以后，经京都、大阪，于十三日来到奈良访问。

① 奈良市的唐招提寺为中国唐代渡日高僧鉴真和尚于公元七五九年所创建。鉴真死后，他的弟子为纪念他在日本传播佛教和唐代文化的功绩，塑造了他的干漆坐像，置于唐招提寺内，日本把这座坐像定为文化财富的“国宝”。——译者注

② 大山郁夫（1880—1955），出生于兵库县，早稻田大学毕业，战前从事社会主义运动，担任劳动农民党委员长，战争期间亡命美国，战后回国，任早稻田大学教授，当选为参议院参议员，从事和平运动，任日本和平委员会委员长，曾来我国访问。——译者注

③ 日本学术会议创立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为日本学术界的代表性机构，其任务可就国家的学术政策进行讨论，接受咨询，提出建议。下分七个学部，共由二百一十名会员组成。会员每三年改选一次。——译者注

④ 建在早稻田大学内。因资产阶级政治家大隈重信（1838—1922）曾任早稻田大学校长，为纪念他而得名。——译者注

日中民间交流的渠道,经过战后长达十年的艰苦的斗争,好容易开始扩大了。这一次郭沫若先生站在鉴真和尚的像前,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象征。

在古代,鉴真和尚接受日本赴华留学的僧人的请求,率领众多弟子,带着盛唐的文化,筹划渡海赴日。在十一年期间,他遭到五次失败和在海上遇难,历经千辛万苦,双目失明,仍然不屈不挠,第六次终于胜利地渡海来到日本,在奈良创造了天平文化^①,并把自己的遗骨埋葬在这块土地上。他同安葬在唐朝土地上的日本人阿倍仲麻吕^②一样,都是日中文化交流的先驱。

当时阻碍日中交流的障碍是大自然。而现代,则是政治上的障碍一直在阻挠着两国的交流。为战胜这种障碍所付出的努力,并不亚于当年鉴真和尚所经历的千辛万苦。在中国方面,郭沫若先生一向站在这一斗争的前头。今天他面对着鉴真和尚的坐像,一定是感慨万千。

日中友好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期待着通过文化和经济交流的累积从而达到邦交恢复的日中关系,经历了鸠山内阁的两年和石桥内阁的两个月,随着岸内阁的上台而碰到了巨大的障碍。由于岸内阁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在长崎发生了侮辱中国国旗的事件,于是使逐渐扩大的日中贸易中断了,日中之间的友好往来也几乎完全陷入断绝的状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党第二次访华使

^① 天平为日本圣武天皇的年号(729—749)。天平文化是指以天平时代为中心的整个奈良时代(710—784)的文化。当时日本派出大批僧俗人员到唐朝学习,吸取了大量的盛唐文化,在建筑、雕刻、绘画乃至文学等方面建立了自己的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化。——译者注

^② 阿倍仲麻吕(701—770),是古代毕生为日中两国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而献身的一位日本学者和诗人。十六岁时从日本来唐朝首都长安学习,长期担任文化方面的官职,与李白、王维等著名诗人交往甚密。七五三年一度乘船回日本,途中为风暴所阻,漂流至南海,历尽辛苦,又重返长安,继续在唐朝任职,最后死于中国。——译者注

节团在一九五九年三月访问了中国，团长浅沼稻次郎^①在北京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礼堂发表了演说，大声疾呼“占领中国的台湾，占领日本的冲绳，在日本全国遍设军事基地的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敌人。”在这一“浅沼精神”的鼓舞下，“一九六〇年反对安全条约斗争”又再次开辟了日中友好往来的道路。

由于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②先生等人的努力，开辟了“廖承志—高碓达之助办事处”贸易（参看第76—79页）。其第一个成果，就是一九六三年八月使日本政府批准了仓敷人造丝公司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用日本进出口银行的贷款分期偿付。这是日本政府摆脱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希望改善日中关系所迈出的第一步。中国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方面考虑到日本友好力量的多年愿望，一九六三年十月三日在北京成立了以郭沫若先生为名誉会长、廖承志先生为会长的中国日本友好协会。这是对未恢复邦交的国家破例采取的友好措施。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以及在这之前于北京举行的“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纪念”，可以说是战后日中友好运动史上第二个划时代的象征。

然而，日中友好的道路仍然是不平坦的。一九六六年，“日本共产党”堕落到加入了国内反华势力的行列，开始与美国、苏联一起表演反华大合唱。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清除了“打着友好招牌，干着不友好勾当”的分子，在协会（正统）的旗帜下，改组了全国组织。在经历了国内外这种友好同不友好的广泛斗争之后，一九七一年

^① 浅沼稻次郎（1898—1960），东京人，在早稻田大学念书时，参加学生运动，毕业后参加工人运动，一九三六年曾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日本投降后参加社会党的创立，任书记长，一九六〇年在东京日比谷公园讲演时，被反动分子刺死。——译者注

^② 松村谦三（1883—1971），富山县人，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当过记者和大隈重信的秘书，长期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战后当过东久迩内阁的厚生大臣兼文部大臣、币原内阁的农林大臣和第二届鸠山内阁的文部大臣等。晚年任自民党顾问，多次访问我国，致力于日中友好。——译者注

十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九月二十九日，日中两国政府代表签署了历史性的日中联合声明，终于实现了人们盼望已久的日中邦交正常化，揭开了日中关系史上的新篇章。

这不仅是战后日中关系史上崭新的一章，也是清算了日清战争^①以来长期黑暗的历史后，争取巩固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历史新起点。可是，如果不冲破重重的险阻，这崭新的一章历史仍然是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路确实是由人走出来的。

一九五〇年诞生的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将于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迎接成立二十五周年。回顾历史，这二十五周年不仅是日中友好协会一个团体的二十五周年，而且是几乎与协会的成立同时开始的日中友好运动的二十五周年。为了促进日中贸易而产生的经济团体及国会议员的组织，虽然比协会的成立稍早一点，但是促进贸易的运动逐渐成为群众性的运动还是在协会成立以后。专门进行文化交流的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成立稍晚一些；该协会将于一九七六年迎接创立二十周年。各团体的成立经过和成立时间虽然有些差别，但是，在全国拥有会员和组织，并在开展日常工作的同时、一贯争取与邻邦中国友好的“新生事物”——日中友好运动出现以来，到今年大体经历了二十五周年。那末，这个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它如何经受了严冬时代的考验，并如何为恢复日中邦交这一国民愿望服务？在迎来了恢复邦交这一新阶段之后，又将如何继续开展新运动？

下面想以日中友好协会的活动为中心，来回顾一下日中友好运动二十五年来所走过的路程。

^① 即中日甲午战争。——译者注

第一章 日中友好协会的诞生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

(一) 筹备会期间

筹备开始

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十月十日下午,秋高气爽,晴空万里,大地沐浴着和煦的阳光。男女老少,络绎不绝地涌入东京神田的共立讲堂。这天的集会一方面是庆祝十月一日刚诞生的新中国的建国,另一方面是成立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筹备会。

会场上洋溢着欢乐的气氛。主席台上并排坐着各政党、文化界、贸易界以及旅日华侨总会的代表们,会场中挤满了各界各阶层的人士,其中还有中华学校^①的学生和他们的父母,孩子们手持自己做的小国旗^②,他们为祖国的新生而欢笑。大家好象早已预料和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这也毫不奇怪,从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如疾风暴雨,席卷全国,胜利的消息也不断地传到日本。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渡长江,解放了南京和上海。五月,蒋介石逃窜到台湾。

这时的日本正处于美军的占领之下,报纸和广播不仅不正确

① 旅日华侨子弟学校。——译者注

②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制定的五星红旗。——

原注

报道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反而拚命地散布许多谣言，说什么“用人民的审判进行大屠杀”，什么“血腥的清洗”、“共产共妻”等等，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污蔑得简直象妖魔鬼怪。但是，越来越多的国民却认识到，干尽这种无耻勾当的正是蒋介石匪军，所以他们才被人民所唾弃，无论美国供给他们多么厉害的现代化武器，但他们终究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特别是在五万名旅日华侨中占半数的台湾省籍华侨，他们对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①记忆犹新。在这次事件中，蒋介石匪军在他们的故乡——台湾，用武力镇压了人民的反抗，残酷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同胞。

参加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成立大会的人们，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但是，他们都为人民当家做主人的新中国的诞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一致希望永远与这个邻邦保持和平友好。为此，决不允许重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与再次发动侵略战争。

特别是经济界，他们处于美国占领之下，经济上受到种种控制，正在萧条的深渊中挣扎。所以不论是资本家或工人都对日中贸易抱有巨大的希望。在日中友好协会成立之前，已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四日成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后改称“日中贸易促进会”），五月二十四日，又成立了由国会议员组成的超党派的“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后经改组，改称“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这些团体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的成立大会。

筹备会成立大会通过了决议，要把日中友好运动扩展到全国各界、各阶层中去；同时，还发表了声明，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府表示衷心的支持并预祝她的发展。

^①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省人民不堪忍受国民党的压迫，举行了起义。国民党对此采取全面的武力镇压，一个月的时间内，逮捕了一万多名台湾省人民，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原注

发起人大会

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召集人小组胜利地结束了成立大会以后，以召集人内山完造先生^①为首，向各界各阶层人士作了宣传工作。到年底，参加协会创建的发起人已超过四百人。于是，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二日在参议院议员会馆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发起人大会。

“哎呀，他也来参加我们的会了！”

最使大家惊讶的是华侨方面^②谢南光先生^③出席了会议。因为他当时是属于国民党驻日代表机构的人。日本方面出席的有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劳工界等各界各阶层人士，总共达一百二十余人。

这次的发起人大会把协会正式命名为“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简称“日中友好协会”，决议把“筹备会纲要”作为协会的规则。并选出了一百二十二名干事（包括五十名常任干事）。

另外还决定工作计划如下：

- (1) 在全国举办恳谈会、座谈会，扩大中央和地方的组织；
- (2) 发行机关报、杂志和小册子等；
- (3) 放映中国电影；

① 内山完造(1885—1959)，冈山县人，店员出身，一九一七年开始在上海开设内山书店，一九二七年认识鲁迅，曾掩护过鲁迅，给鲁迅的革命文艺活动提供过种种方便，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时，担任治丧委员，一九四七年回国，在东京开设内山书店，一九五〇年参加日中友好协会的创建工作，任协会理事长，献身于日中友好运动，一九五七年在上海逝世，著有《活中国的姿态》、《平均有钱》和自传《花甲录》等。——译者注

② 日中友好运动的初期，旅日华侨与日本人一起开展活动。一九五四年以后，为避免“干涉内政”的误解起见，旅日华侨不加入日本的团体，作为华侨团体来从事日中友好活动。——原注

③ 谢南光以后回到北京，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活跃在外交界。一九六七年在北京逝世。——原注

- (4) 向会员分送中国的资料；
- (5) 举办中国语文讲习会；
- (6) 争取获得中国文学作品等的翻译权^①。

机关报由常任干事会定名为《日本与中国》，于二月二十日发行了创刊号。

从三月二十日开始在日本举办了首次“日中友好周”。在东京银座的数寄屋桥公园举办了“新中国摄影街头展览”，这是在日本举办的第一次展览会，其中展出了介绍解放后的鞍山钢铁公司、抚顺煤矿等的图片约三百幅，并由干事轮流担任解说员。穿着制服的美国水兵曾闯进展览地点捣乱，殴打解说员，并破坏了一块裱在木板上的图片展品，把朱德将军像框上的玻璃打碎。

朝鲜战争与日中友好会议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七月十三日，日中友好协会筹备会与华侨总会在参议院议员会馆会议室联合召开了“日中友好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劳工界和华侨的代表二百人。会议讨论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华侨四个方面的基本情况报告。特别是参议院议员大山郁夫的政治报告，明确地指出了当时运动中的问题，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山先生强烈谴责吉田内阁对美国占领军唯命是从，建立警察预备队，增加海上保安队人员，为美军侵朝战争效尽犬马之劳。他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和介入朝鲜战争，强调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媾和不是真正的媾和。

接着，会议一致通过了胜间田清一先生所作的强调日中贸易必要性的经济方面的报告和帆足计先生所作的补充发言。

^① 当时出版需要占领当局的许可，翻译著述如无原作者同意翻译的证明，一律不准出版。——原注

反对造谣诽谤

“啊呀，这是怎么回事呀？！”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七日清晨，很多人打开《每日新闻》的朝刊^①，都大吃了一惊。报上头版的通栏大标题是：“活跃于日本革命中的特务集团”，“获悉日中友好协会的活动系奉远东国际共产党情报局之命，侦察美军的动态和军需生产等情况。”这段造谣报道的主要内容是：H机关是直属远东国际共产党情报局的特务组织，它背着一般会员，在协会内建立了党组（左派集团），侦察美军的动态和军需生产等情况。这显然是个要搞垮日中友好协会的阴谋。

协会筹备会立即发表声明，向每日新闻社提出了抗议。经过强硬的交涉，结果以作家丰岛与志雄^②代表协会给报纸投稿的形式，在七月二十六日《每日新闻》的来稿栏中发表了文章，说明上述报道是毫无根据的捏造。

当时，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已经下达了命令，解雇拒绝为美军侵朝战争服务的人，开始所谓的“整肃赤色分子”。“整肃”的对象涉及到所有产业部门的工人。后来从三井矿山揭露出来的事实证明，“日中友好协会会员”也被列入这次“整肃”的范围。

但是，尽管美国占领当局如此迫害，日中友好协会的组织在全国各地还是日益发展壮大。

① 日本大报纸一般都出“朝刊”、“夕刊”两种。——译者注

② 丰岛与志雄(1890—1955)，作家，冈山县人，作品有《潮水和他们》、《风吹雨打》、《丑角》等。战后从事日中友好运动，担任过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译者注

(二) 协会的成立大会

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召开了

通过一年的准备活动，协会在东京以及大阪、福冈、山口、兵庫、爱知、岐阜、岩手、宫城、埼玉、大分、熊本、京都、奈良、石川、新潟、千葉、群馬、秋田、岡山、神奈川和北海道分别建立了支部，正式成立协会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和十月一日，分别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和神田教育会馆召开了协会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协会正式宣告成立。全国各地的支部、二十多个工会、各政党、贸易促进团体、文化界以及华侨等各方面的代表共一百八十人参加了成立大会。大会继续在十月一日举行是为了配合新中国的国庆节。

大会通过了协会“成立宗旨”（包括纲领）和工作方针，并制定了十二条章程。

“成立宗旨”（参照第 184—185 页）呼吁不许重新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立即建立两国人民之间正常的关系，宗旨最后说：“我们保证要在下列四项纲领的指导下，竭尽全力实现本协会的目的”。这四项纲领是：

（一） 本协会要深刻反省日本国民中存在的关于中国的错误观点，并努力予以纠正；

（二） 本协会为建立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努力从事两国的文化交流；

（三） 本协会为了有助于日中两国的经济建设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努力促进日中贸易；

（四） 本协会以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基础，谋求相互安全与和平，从而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纲领第一项提出要纠正日本国民中存在的关于中国的错误观点，有着重大的意义。日本军国主义为了侵略中国，长期在日本国民中灌输蔑视中国的思想。当这种思想还未能彻底根除的情况下，美国为了把日本作为推行其遏制中国政策的策源地，又一直大肆进行反华宣传。同这种“关于中国的错误观点”进行斗争并加以粉碎，是开展日中友好活动中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在纲领中之所以没有提出恢复邦交的问题，是因为当时日本仍处于占领之下，而且各国对日媾和方针也还没有明确。当时，作为纲领来说，从日本国民的立场出发，自然要呼吁“全面媾和”，并把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为前提，在第四项中提出了“以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基础”，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组织广大群众的工作方针

工作方针包括下列八项：①友好运动的原则，②纠正关于中国的错误观点，③文化交流活动，④宣传和促进日中贸易，⑤与旅日华侨合作，⑥与和平运动的联系，⑦运动的各种形式，⑧组织工作的方针。

随着形势的变化和运动的发展，协会的运动方针得到大大丰富。而第一届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工作方针，为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方针的第一项“友好运动的原则”这样说：

“我们的友好运动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的友好运动。其含意是：它是全民规模的友好运动，是不通过彼此国家机构的人民友好运动。我们希望将来能通过两国的国家机构来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但目前的实际情况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开展的友好运动，是不依赖于国家或政府的自发的国民运动。

“它决不是偏向于一党一派、在少数国民的小范围内活动的运动。凡是对日本过去所犯下的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进行了深刻的反

省、并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立场上赞成两国人民应该紧密合作的人们，不问其阶级、职业以及政治信仰如何，各界各阶层的人士都可以成为本会的会员。”

另外，在第七项中说：“我们的友好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怎样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来。”于是，开展“丰富多采的活动”就成为以后每年的运动方针。

第八项“组织工作的方针”中说：“对于积极赞同友好活动的人士，均应吸收成为会员。支部还必须重视通过各种方式与尚未加入本协会的人士联系。只有这样，协会才能组织起数百万群众来。”虽然组织对象包括社会各阶层人士，但作为具体的组织方针，要特别重视现代产业中有组织的工人和青年。支部或班向希望日中友好的人们敞开大门，以便让他们参加进来。即使是对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抱有怀疑或批评的人，也应让他们能够在组织内部发表意见，展开讨论。只有具备这种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气氛，才能组织数百万人民群众。

（三） 美国占领军的镇压

考验的岁月

协会是在美军占领下、在朝鲜战争期间的环境下成立的，它作为国民运动开始活动。协会的干部也是在广泛的范围内选举出来的。第一任理事长是毕生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基督教徒内山完造先生。

但是，协会成立不久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被美国看作眼中钉、肉中刺。美国妄图封锁和消灭她。朝鲜战争就意味着美国要打开从北面进攻中国的途径。美国如果能从三八线推进到鸭绿江边，那末，紧接着的下一个行动

就是侵略和进攻中国的东北地区。朝鲜人民卫国战争的胜败也关系着中国人民保卫祖国的安危。因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了援助朝鲜人民、与朝鲜人民共同战斗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于是日本的宣传机构报道朝鲜战况的调子逐渐发生了变化。在这以前，他们报道的尽是美军所发布的消息，如“美二十四师迅速向中国国境推进二十二公里”、“美第一军命令向中国国境出击”等等。之后，《朝日新闻》十一月三日在头版横贯三栏的大标题“一个团被包围、联合国军在云山后退十四公里”下，透露了“联合国军”的惨败。随着“联合国军”战况失利，日本宣传机构的反华宣传也日益露骨，如说什么“在中国国内，许多人因国民党特务嫌疑而遭逮捕枪杀，人心动摇，很多人想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十一月十六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横贯六栏），“估计有十二、三万日本人被中国扣留，处于痛苦之中，特别是妇女儿童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十一月十九日《朝日新闻》第三版头条横贯四栏），等等，连篇累牍地造谣中伤。这与日中友好协会的机关报《日本与中国》的报道简直有着天壤之别。《日本与中国》通过刊载旅居中国的同胞所寄回的信件等，介绍了旅华同胞们的安定生活。

镇压分发《人民日报》事件

十一月十五日，大阪市警察署奉美军的命令，袭击了我协会的大阪支部事务局。他们以违反第三二五号波茨坦政令^①嫌疑的“罪名”，带着搜捕证，搜查了支部事务局，没收了中国发行的《人民

^① 日本政府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后，为实施美国占领军或美方同意执行的行政命令，可以不经法律手续，直接由日本政府以所谓“波茨坦政令”的形式推行。——译者注

日报》、《世界知识》及其它许多资料，逮捕了支部事务局长坪井正、事务负责人平井己之助、事务局工作人员山口和子三人。

当时，我们协会是与中国进行交流的唯一窗口。当然，在美国的“遏制中国”政策下，是不会允许人员往来的。但我们通过国际邮政，进行了资料交换。我们寄出日本发行的各种报纸、杂志和书籍，中国方面则按我们预订的份数，给我们邮寄《人民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人民中国》（英文）、《世界知识》、《文艺报》等报刊。协会的主要支部都备有这些中国资料，向提出要求的大学、研究所、报社等分发，从而为正确宣传和了解中国的工作尽了一点力量。

当时日本新闻机构的一切消息来源都被美国占领军所控制，所以协会所提供的《人民日报》等对他们都是很宝贵的消息来源。当时能够提供正确了解中国消息的机构，除了我们协会外，只有一个爱国华侨的组织。记录延安广播的《中国通讯》（负责人杨春松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创刊，但因收听困难，不能定期发行。记录北京新华通讯社电讯的“中国通讯社”（负责人李铁夫先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即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五日起，到本协会事务所所在的神田的大楼里办公，开始定期发行《新华社通讯》（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以后，改名为《亚细亚通讯》）。

当时的《新华社通讯》、《人民日报》、《世界知识》，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对外政策，特别是具体生动地报道了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把朝鲜人民卫国战争作为自己事业而开展的伟大“抗美援朝”运动。

美国把《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报道，当作炸弹一样，怕得要死。他们想先通过镇压大阪支部来威胁我们协会分发中国报刊的工作。然而，协会的全国组织坚持开展了援救遭到镇压的大阪支部的活动，同时一天也没有在全国中断过正确宣传了解中国的活动。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国占领军在大阪军事法庭宣判平井先生重劳役三年、山口女士重劳役六个月。中央总部事务局长小泽正元^①，因在法庭上以证人身份进行了抗议，当场遭到逮捕，关进了监狱。接着在十二月三十一日，警视厅奉美军命令，搜查了设在东京神田的协会中央总部，没收了大量的《人民日报》等资料，并逮捕了资料部长赤津益造先生。

小泽、赤津两位先生被美军军事法庭判处重劳役五年，并罚款五百美元。他们与已在服劳役的平井先生一起，在堺^②监狱里一直被关到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所谓的旧金山条约生效之日。这就是协会史上永远难忘的“镇压分发《人民日报》事件”。

(四) 同单独媾和作斗争

日本人民要求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

美国国务院于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十一月宣布正在准备起草对日媾和草案。第二年三月，将草案分送给除中国以外的有关各国。美国政府中负责对日媾和问题的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早在对日媾和工作的准备阶段，他就制定了排斥中国的方针。我国在野党外交政策协议会针对这一情况，于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六日发表共同声明，提出了“和平、永远中立、全面媾和”的主张。当时正在美国的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③发表谈话，认为包括中国

^① 小泽正元，一八九九年五月出生于长野县。一九二五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系，曾在朝日新闻社、内外社、日本外事协会、企画院工作过。战后任日本大学讲师、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四九年参加日中友好协会的创立工作，以后一直从事日中友好运动。著有《内山完造传》等。——译者注

^② 市名，属大阪府。——译者注

^③ 南原繁(1889—1974)，香川县人，东京大学毕业。一九二一年在东大教授政治学，一九四五年任法学系主任，以后任东大校长、名誉校长，著有《国家与宗教》、《人与政治》等。——译者注

在内的全面媾和是日本国民的要求。吉田首相^①骂他是“曲学阿世之徒”(用违背真理的学问来迎合时势),曾引起一场争论。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一日的《朝日新闻》,用头版头条横贯五栏的标题刊登了美联社华盛顿专电,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为了对付朝鲜的新危机,在必要时,将对中共军队(原文如此)使用原子弹。”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困境越陷越深,它就更加急于要搞对日媾和和重新武装日本,从而把日本变为远东作战的巩固的前沿基地。

一九五〇年十月,美国向各个有关国家分送关于对日媾和的备忘录时,又把中国排除在外。

对此,中国在同年十二月四日,以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名义发表了阐明其立场的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和拟制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与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根据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占领军应自日本撤退。”“不得再行武装日本。”等等。

一九五一年元旦,麦克阿瑟在新年文告中强调对日媾和与集体安全保障(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吉田首相按照这一基调,向外国记者团发表了谈话。

一月十日,日本人民成立“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开展签名活动。许多工会把经济要求与这一政治要求结合了起来。

一月二十五日,以杜勒斯为团长的媾和代表团来到日本。私营铁路工会总联合会、劳农党、日本农民组合^②、妇女团体、全国金属产业工会、日本教职员组合^③、总评等组织以及野上弥生

^① 吉田茂(1878—1967),东京人。战前曾任日本驻天津、沈阳、安东、济南等地的领事、总领事,进行侵华活动。战后连任五次内阁首相,推行一系列出卖日本和敌视我国的政策。战后日本很多反动政客都是出自他的门下。——译者注

^② 日本最大的农民组织,一九四六年成立,后不断分裂,一九五六年统一,简称“日农”。——译者注

^③ 日本大、中、小学教职员的组织,但以中小学教职员为主,一九四七年成立,为总评的加盟组织。——译者注

子^①等文化界人士，接连不断地向代表团递交了包括要求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要求日本完全独立等内容的请愿书。

中国的呼吁

一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在北京召开了对日媾和座谈会。会长张奚若以及理事廖承志、梅汝璈等人参加了会议，表示反对日美单独媾和、反对重新武装日本。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一月二十八日以《粉碎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阴谋，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为题，发表了社论。《人民日报》的这一号召立即把全中国人民动员了起来。

同天，北京四万名妇女召开了“抗美援朝、反对重新武装日本爱国大会”，通过了北京妇女的七项爱国公约^②。其中一项提出了“反对重新武装日本”。

二月一日，中国的三个青年团体发表了反对美国对日单独媾和及重新武装日本的联合声明。接着以中国青年对日本青年、中国学生对日本学生的方式发表了公开信，号召“团结东方各国和日本的青年与人民，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和约和非军国主义的民主的日本而奋斗”。

二月五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给日本工人的信中说：“我们中国工人阶级、全中国人民关心日本人民的命运，就象关心自己的命运一样。我们从来就主张缔结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反对重新武装日本，以便尽早恢复日本人民的和平生活，并为此目的进行坚决的奋斗。”

^① 野上弥生子，一八八五年出生于大分县，为日本现存的最老的女作家，主要作品有《海神丸》、《大破雄》、《真知子》、《迷路》等。一九七一年获文化勋章，为日本艺术院会员。——译者注

^②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国的人民群众为努力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制订的公约。——原注

二月八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及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发表宣言说：“我们必须联合全世界自然科学工作者，尤其是日本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展开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与武装日本的运动，争取缔结公正的全面的对日和约。”十八日，在中国学术界拥有许多会员的九三学社^①，向日中友好协会、日本的文化界打来了同样意思的电报。协会以前因“分送《人民日报》事件”而遭到镇压时，九三学社曾与中国民主促进会一起向占领军发出过抗议电。

另外，郭沫若先生于二月九日在《人民日报》^②上发表文章，强烈谴责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指出：“五十年来，日本帝国主义者和我们中国人民的一篇血债是算不清的。单拿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八年间的大规模的军事侵略来说，我们牺牲了一千万人以上，损失了价值五百亿美元的财产。”

日中友好协会把这些宣言、文章发表在《日本与中国》上，同时，于二月下旬汇编成小册子，书名为《中国向日本提出什么希望——对日媾和与中国的主张》（三十五页、定价二十日元），作为“日中友好丛书”第一号广泛发行。

纪念“七·七”行动月

北京广播电台对日广播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四日报道，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对日单独媾和与重新武装日本的签名已超过二亿一千万人。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要求全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的签名也超过了三百万人。在这期间，日中友好协会举办了报告会，广

^① 为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的文化、教育、学术界的民主人士所建立的带有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为纪念国际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日——九月三日而命名为“九三学社”，派有代表出席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原注

^② 原文如此，应为二月四日《人民日报》。——译者注

泛发行了机关报《日本与中国》和其他小册子等，全力以赴地进行了斗争。

日中友好协会一九五一年六月开会决定，把“七·七”芦沟桥事件十四周年纪念日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日六周年这段时间定为“反对排除中国的片面媾和、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行动月”；并把这个活动作为一次统一行动，建议各团体、工会及个人坦率地发表感想，向中国人民致电或信。

在日本人民向中国人民写信之前，中国人民就已经不断地给日本人民来信，呼吁“反对排除中国的片面媾和、反对重新武装日本”。

中华全国总工会给日本的各工会拍来了电报。从沈阳、大连、北京、张家口、青岛、太原、上海等城市，从湖南省的农村，中国的工人、农民、店员、学生、教育工作者、科学技术人员、文学家等各阶层人士都给日本人民来了信。河南省开封市省立开封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六年级五班学生也给日本的小学生来了信。

协会把这些信翻译了出来，进行了宣传，同时先后把日本各界的来信陆续地转给了中国。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五日，中国的《大公报》^①发表了《大公报给日本人民的一封信》，《日本与中国》译载了这篇文章的全文。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六年前的今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皇昭和广播‘降服诏书’，帝国主义的日本由此死亡，人民的日本应该由此新生。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对日本就抱着各种美好的希望，希望中日两国在经济上互利互助，在文化上交流切磋，在国际上平等合作。

^① 当时在上海和香港发行，社长是王芸生，现为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原注

“中日两国人民有志团结合作，一定能为亚洲以至全人类建树很多事业。日本人民诸君：中国人民这些希望也是亚洲人民共同的希望，相信也是你们的希望。

“现在日本国内某些势力，正与美国在侵略行为上互相勾结，企图再走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我们认为这是危险的，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日本是亚洲国家，必不能与亚洲人民为敌。你们要起来坚决反对单独对日和约，不能让帝国主义在亚洲埋下的战争炸弹，使我们亚洲人互相残杀。”

同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再次严正地指出：“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因而也是无效的。”

八月十八日，日本政府决定派以首相吉田茂为首的日本全权代表团出席旧金山媾和会议。正在这时候，日中友好协会把日本人民给中国人民的第一批九封信寄给了上海大公报社。这些信都表示坚决反对旧金山和约，反对“日美安全条约”。

八月二十日，《大公报》几乎用头版整版的篇幅译载了这九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我们接受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挚热的友谊，让我们向在战斗中的日本人民致兄弟的敬礼”。另外还以《可珍贵的九封信》为题，在同一版面上发表了一篇短评，其主要内容如下：

“今天本报发表了日本人民寄给中国人民的九封信，这是日本人民的真正心声，是中日人民团结的亲切呼唤，更指出了日本民族独立解放的唯一道路。日本人民这样的觉悟与这样的呼声，正是表现着日本人民睿智与英勇的本质。这样的民族，是决不会灭亡的，也决不会永远被奴役的。

“我们中国人民，应该仔细读这九封信。在坚毅奋斗中的日本

人民正把胜利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我们的援助，本报谨先代表中国人民告诉可敬爱的日本人民诸君——在伟大的毛泽东领导下的全中国人民决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一九五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协会在参议院议员会馆召开了“日中友好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政党代表，安川电机公司经理安川第五郎等经济界代表，全面媾和爱国运动协议会等和平团体的代表，以及煤矿工会、教职员组合、钢铁工会联合会、全日本港湾工会、私营铁路工会总联合会等工会组织的代表。会议集中了各界代表的意见，通过了《对日媾和问题要求书》，向日本政府表明：国民的愿望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媾和。

郭沫若先生在九月一日发行的英文杂志《人民中国》上发表了《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再一次表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对日单独媾和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立场，鼓舞了日本人民的斗争。

九月三日，中国人民在北京、上海、重庆、西安、广州、南京、张家口、归绥、包头、兰州、延安、福州、宁夏、青岛、合肥、长沙、常德等许多城市举行集会，谴责旧金山会议，并通过了不承认这次会议的决议。

第二天——九月四日，旧金山媾和会议在日中两国人民强烈的反对声中于歌剧院开幕。七日，吉田首相把经过杜勒斯加工修改过的讲稿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八日，四十八个国家和吉田首席代表等五名日本“全权代表”签订了“和约”。

当天傍晚，在旧金山下级军官会议厅，日本方面（仅吉田茂一人）与美国方面的国务卿艾奇逊、外交顾问杜勒斯私下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

日中友好协会立即发动了不承认和反对这一“条约”的运动。

在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内山完造的倡议下，各大学的教授首先联名向十月二十六日的众议院与二十八日的参议院所召开的批

准条约国会会议提出了意见书。接着几十名文化界人士联名发表了反对这两个条约的声明。

日中友好运动从此进入了反对所谓的旧金山“体制”——“遏制中国”的政策之一——这一新阶段。

第二章 开辟了友好的道路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

(一) “遏制”的壁垒

单独媾和与周恩来声明

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中国周恩来外长《关于美国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生效的声明》一开始就这样写道：“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时宣布非法的单独对日和约自该日起正式生效；……同日，日本吉田政府与盘据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也签订了所谓‘和平条约’。这一系列严重露骨的挑衅行为，已引起了我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反对。……”

这篇充满义愤的长篇声明谴责了“美国政府包办制造的单独对日和约，决不是什么恢复日本主权、独立和改变日本的被占领地位的条约；恰恰相反，它是彻底变日本为美国军事基地和附属国家的备战条约和奴役条约。”另外，在这一媾和条约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生效的同时，日本政府还与蒋介石之间签订了所谓的“日台条约”。对于这个条约，声明这样指出：

“美国政府强令日本吉田政府和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缔结所谓‘和平条约’，显然是企图用这个所谓‘和约’，把它所一手培植的两个走狗联合起来，妄想借此构成对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威胁。”

周恩来的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旧金山“体制”的本质：它不仅是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而且是奴役日本民族的政策。

奋起反对“日台条约”

一九五二年，对于日中友好运动来说，是从开展反对所谓“日台条约”的斗争开始的。这个条约是作为旧金山体制的一个环节而炮制出来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来日本的美利坚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曾发表声明说，美利坚政府希望：第一、日本为适应独立后形势，应逐步加强重新武装；第二、关于与中国媾和问题，应以台湾的“国民政府”为对象。据说吉田首相同意了这些要求。^①对此，日中友好协会理事会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发表了《答杜勒斯声明》的抗议声明。

各在野党、工会、民主团体对杜勒斯声明及接受这一声明的吉田首相纷纷发出的抗议声越来越高涨。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吉田内阁于四月二十八日签订了这个可耻的“日台条约”。美利坚认为已经通过“旧金山体制”筑起一道“遏制中国”的高墙。但也就是从这时起，中日两国人民开始了推倒这道高墙的共同斗争。

（二） 依靠全体国民的力量开展日中贸易

战后日本人首次访华

在旧金山体制的压力下，早就孕育着的日本的经济危机，到一九五二年终于在生产部门尖锐地表现出来，许多企业不得不缩短开工时间，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收到一封宝贵的信。信上这么说：

“最近各国的工商业家正在发起召开国际经济会议。这个会

^① 日本政府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六日宣布，吉田首相早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就致函杜勒斯，同意美国的要求。——原注

议将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以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作为中国的发起人之一,希望就发展国际贸易及开好国际经济会议等问题,听取您们的意见。如蒙赐教,不胜荣幸。”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的《日本与中国》,登载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这封信,同时报道了这封信是寄给日本财界十位实力人物的。并且在同一版上刊登了这十位先生中的三井化学公司常务董事冈田启基、函馆修船所经理加纳久朗、原大藏相北村德太郎、安川电机公司经理安川第五郎、东洋经济新报顾问三浦铕太郎五位先生的文章。文章是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的:(1)对中国来信有何感想;(2)对国际经济会议有何希望;(3)对同中国经济合作事业有何长远考虑。

倡议召开这一国际经济会议的目的是,以开展促进国际贸易的运动,来打破美国的“遏制”政策。五位先生都对之作出了热情的答复。为了响应中国的倡议,村田省藏(大阪商船公司董事长)、鲇川义介(参议院议员)、石桥湛山^①(通产相)、北村德太郎(众议院议员)、帆足计(众议院议员)、安川第五郎(安川电机公司经理)、新关八洲太郎(第一物产公司经理)、箕浦多一(日产重工业公司经理)、和田博雄(众议院议员)、山本米治(参议院议员)等政界、财界实力人士,于一九五二年一月组成“国际经济恳谈会”。

国际会议从四月三日开始,在莫斯科举行十天。日本准备派代表参加,申请发给出国护照,但是,忠实执行美国“遏制”政策的

^① 石桥湛山(1884—1973),东京人,早稻田大学毕业,一九二九年任东洋经济新报社社长,战后初期参加日本自由党,一九四六年任第一届吉田内阁大藏大臣,一九五四年参加民主党的创立,任鸠山内阁通产大臣,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任自民党总裁,同时组阁,采取扩大中日贸易的方针,一九五七年二月因病辞职,以后致力于日中友好,曾来我国访问。——译者注

吉田内阁却不予批准。

尽管在护照问题上受到了阻挠，但日本代表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三位议员终于绕道参加了莫斯科会议的最后阶段会议。会议结束后，他们应中国代表团的邀请，作为战后日本人首次进入了北京。日本国内与此相呼应，日中友好协会与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等发起，不仅向实业界，而且向政界、文化界、劳工界以及农业协同组合^①等发出“用全体国民的力量实现日中贸易”的号召，五月二十二日，二百名各界代表在众议院议员会馆集会，成立了日中贸易促进会议，并向在北京的三位议员发出电报，希望他们缔结日中贸易协定。

第一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的缔结

六月一日，日中两国代表在北京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议室签订了进出口各三千万英镑（约三百亿日元）的第一次日中贸易协定。当北京广播电台对日广播传来签字时的实况和三位日本代表的致辞时，立即受到日本国民热烈欢迎。“遏制”的高墙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日中贸易的道路终于被打通了。

帆足、宫腰二人于七月一日、高良富于七月十五日乘飞机回国。群众象欢迎凯旋归来的将军似地热烈欢迎他们。

七月三日一万七千人在大阪的扇町广场、四日万余人在神户的湊川公园、五日六千人在京都东山的丸山公园、七日四万人在名古屋的大须球场先后举行了欢迎帆足、宫腰两位先生的报告会。参加报告会、而且是贸易问题的报告会的人数之多，简直是不能设想的。这是反对美国“遏制”政策的一次国民性示威。

在东京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欢迎这三位议员（包括稍后回国

^① 为根据一九四七年“农业协同组合法”而成立的自耕农民的组织，宗旨标榜增进农业生产力和提高农民社会、经济地位。——译者注

的高良女士)的盛况空前的报告会。人们为第一次听到新中国的情况而沸腾。三位议员打破了美国和日本政府的“遏制”，他们的行动不仅开辟了日中贸易的道路，而且也开辟了日中友好的道路。

(三)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组成六十人的大型代表团

继第一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签订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根据中国政府的意见援助在华日本人归国，和日本方面为表示感谢而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于是大大冲破了“遏制”高墙、打开了日中友好往来的可靠道路。但不能忘记，作为这些活动前提的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一九五二年春季，日本的和平团体收到了宋庆龄女士和郭沫若先生等署名的电报，邀请日本方面参加一九五二年秋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于是由大山郁夫、末川博^①等人组织了日本筹备委员会；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三人参加了六月三日开始在北京举行的、由十九个国家的代表组成的筹备会议。筹备会议内定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议题如下：

(1)开展维护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独立、自由与和平的各种活动；

(2)发展平等互利的正常国际经济与文化交流；

(3)为了消除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威胁，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反对把日本作为侵略基地。

日本各界各阶层人士热烈支持这次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

^① 末川博(1892—1977)，山口县人，京都大学毕业，历任京大教授、立命馆大学校长和名誉校长。为著名的资产阶级法学家，主要著作有《权利侵犯论》、《民法总则》等，编有《六法全书》、《法学辞典》等。生前主张日中友好。——译者注

议，在各地成立了选派代表的筹备会。八月在东京举行了选派日本代表的大会，全国各地四百八十名代表候选人参加了大会，从中选出了以松本治一郎为团长的六十人代表团，其中既有要求开展日中贸易的公司经理，也有工会干部、学者以及文化界人士，代表性广泛。可是，日本政府顽固地拒发护照。九月十九日，在外务省静坐的代表们遭到暴徒的袭击，外务省的走廊上发生了流血事件。

《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

十月二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开幕。四十个国家的三百九十八名代表参加会议。尽管日本政府没有签发一张去北京的护照，但是一桥大学教授南博、日本驻巴西商务代表樱井英雄等十四人仍然作为日本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绕道欧洲，经历了种种的艰辛才到达北京。

会议举行了十二天，于十月十三日闭幕。会议一致通过了宣言和十一项决议。特别引起我国国民巨大关心的是《关于日本问题的决议》，它提出下列四点要求：

(1)应当由有关各国缔结全面的真正的对日和约；

(2)反对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支持日本人民建设独立、民主、自由、和平的新日本；

(3)任何外国军队应立即撤离日本领土，任何外国不得在日本保有军事基地，任何外国不得干涉日本内政；

(4)必须撤除外国政府对日本的和平建设及对外贸易的各种人为限制。

日本的代表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各国的代表一起，谴责美国与日本政府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及侵略亚洲的路线，同时针锋相对地提出日本人民争取和平、独立、民主、中立的路线，从而进一步增

进了中国人民对日本国民的友谊和信任。是这种信任促进了在华日本人归国问题的解决。

(四) 开辟友好往来的道路

促进在华日本人归国问题的解决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北京电台向日本广播了中国政府有关方面回答新华社记者的问题，说明旅居中国的日本侨民的实际状况，并指出解决他们归国问题的途径。这在日本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战争期间到中国去的日本人为数甚多。日本战败后，根据国际法的规定，军人、军队文职人员和一般侨民都陆续遣返回国。但遣返工作尚未结束，蒋介石军队在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间，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爆发了所谓的“内战”，因而造成了遣返工作的中断，以致在华日本人无法回国，仍居留中国。日本政府所发表的数字，一会儿说是十万人，一会儿说是七万人，含糊不清，缺乏根据。

一九四九年，中国内战结束，全国获得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自然，旅居中国的侨民集体归国的道路跟着也就通了。于是，在华日本人的归国问题便成为日本重要的社会问题而不断有人向政府提出要求，并且也成为国会的大问题。日本政府当局在国会的答辩中含糊其词，只是反复地说：“正通过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进行交涉。”此时，新华社通过北京广播电台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其要点如下：

(1) 当前旅居中国的日本人为数约三万左右。他们在中国政府的保护下，生活安定，而且能给日本家属汇款。

(2) 对于希望回国的日本侨民，正给予他们协助。但由于缺

乏船只,无法集体行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日本方面相当的机关或人民团体可以派人与中国红十字会具体协商解决。

因日本政府敌视中国,这一问题长期未能获得解决。现在北京的广播一下就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日中友好协会自创立以来,一直帮助在华日本人与其日本家属取得书信联系。协会通过沈阳在华日本人的报纸《民主新闻》,在该报开辟“寻人”栏,以互通消息;协会帮助在华日本人向其日本家属汇款,并组织家属会,开展日中友好运动。当听到北京电台广播后,协会立即致电中国红十字会说:“将与日本各界各阶层合作,就解决这一问题立即派遣代表和进行其他准备工作。”随后,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红十字会联系,邀请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与和平联络会(为筹备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而建立的组织)三团体派出代表。三团体立即组成代表团(团长是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代表协会的是内山完造理事长等三人)。这个代表团作为国民的代表,在盛大的欢送下,于一月二十四日由羽田机场起飞,经香港赴中国。日本政府过去从未签发过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护照,这是第一次给代表团签发了写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而且是公干护照。

三团体代表团在北京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是廖承志先生)顺利地进行了协商,并于三月五日^①共同发表了一项公报。双方议定接运归国人员所需的船只由日本政府负责派出,中国方面负担归国人员到港口前的一切旅费。此外在携带回国的物品及金钱方面也充分照顾归国人员的利益。双方还商定接人的船不得有(日本)政府的代表,三团体各派一代表随船照料,以防止日本政府进行反华的阴谋活动。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三月七日。——译者注

接运归国人员的第一艘船“兴安丸”三月二十三日到达舞鹤港^①。协会与其他许多团体共同组织了“归国协助会”，负责照顾归国人员的工作。之后，每当接运归国人员的船只一到日本，就成为新闻界关心的目标。人们通过归国人员了解到新中国社会生活真实生动的情况。这些情况同占领当局所大肆散布的反华宣传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此后将近一年中，归国人员口述关于新中国的情况，通过报刊广播的介绍，乃成家喻户晓、人人热烈谈论的话题。“日中友好协会”也随之广泛地为人们所了解，并获得许多人的信任。

在此期间，日中友好协会于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两天举行了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松本治一郎先生^②为第一任会长。这次大会通过的工作方针中谈到：“自今年一月派遣归国谈判的国民使节以来，日中友好运动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飞跃发展的时期。”同年六月一日，日文版《人民中国》在北京创刊。此后，这家杂志在向日本国民正确介绍中国情况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同年“归国协助会”编辑发行的小册子《新中国》也大大地帮助人们了解新中国。

悼念中国殉难烈士的活动

正当日本政府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时候，中国以日本的民间团体为对象，并给予无微不至的援助，使三万几千名日本人平安地

^① 位于京都府北部、面临日本海的不冻港。战后运载自中国遣返人员的船只均由这里入港。——译者注

^② 松本治一郎(1887—1969)，战前人们尊他为全国部落解放运动之父。战后曾担任第一任参议院副议长，在国会开会时拒绝拜谒天皇(即所谓“螃蟹横爬事件”(松本讽刺日本官员拜谒天皇时的样子象“螃蟹横爬”。——译者注))。一九五三年被推选为日中友好协会第一任会长。——原注

回到祖国。日本全国各界各阶层普遍对此表示深深的感谢，进一步促进了日中友好事业的开展。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们协助数百名华侨从舞鹤港乘船回国，送走了第一批自愿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华侨。

七月二日，为了送回第一批未能生还故国的中国殉难者的遗骨，迫使日本政府派出了“黑潮丸”，从而迈出了送还遗骨工作的第一步。这个问题起源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当时的东条内阁^①为弥补战时劳力的不足，在内阁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向日本内地运进华工问题》的决议。根据这个决议，在一九四三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五月这段时间内，主要在华北地区抓捕中国人强行运到日本，分到全国一百三十五个企业中强制劳动。被抓的劳工共一百六十九批、约四万人。到日本战败为止，这四万人中约有七千名被虐待致死或惨遭杀害。战后，日本政府对于抓捕中国劳工和在日本国土上残杀中国人的罪行不但不作丝毫的反省，反而掩盖罪证，任凭惨遭杀害的中国死难者的遗骨抛弃于山野荒郊之中，置之不理。协会与总评、佛教界、日本红十字会等合作，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七日组成“中国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委员长为 大谷莹润法师），一方面追究政府的责任，阻止日本军国主义的重新复活；另一方面由民间来调查这一事件，收集遗骨，举行悼念活动，并把遗骨送回中国^②。

^① 东条英机(1884—1948)，东京人，出生于没落的武士家庭，陆军大学毕业。为陆军“统制派”的主要人物。一九四〇年任近卫内阁陆军大臣，一九四一年组阁，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文部大臣、外务大臣、军需大臣，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战后被国际军事法庭定为战犯，处绞刑。——译者注

^② 慰灵实行委员会依靠民间的力量，在全国一百三十五个企业进行了现场调查，详细调查了秋田县花冈矿山的中国人暴动及大屠杀事件等抓捕中国人事件，发掘牺牲者的遗骨，举行悼念，把三千具左右遗骨分十批送回中国。另一方面还追究了日本政府对这罪行的抵赖。——原注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来日

一九五三年三月，日本红十字会岛津会长作为三团体代表团的团长，在北京进行在华日本人归国问题协商会谈的时候，为了向中国红十字会的极其友好的帮助表示感谢，表示希望说：“俟集体回国问题结束后，我们准备邀请红十字会的各位先生访日，那时务请同意。”廖承志先生代表中国红十字会回答说：“我们高兴地准备接受邀请。”为了遵守信约，日本红十字会外事部部长工藤忠夫作为日本红十字会的代表，随第一批华侨归国船访华时，再次转达了邀请之意，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回答说：“衷心地期待着访日的实现。”

日中友好协会号召全国开展一个运动，以争取邀请中国代表访日的实现。协会倡议以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为中心开展日中友好月，在此期间出现了比上一年更加活跃的高潮。中国方面的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以及青年、妇女、文学艺术界、人民救济总会、工商业联合会等九个团体为友好月拍来了加强团结合作的贺电。友好月的中心活动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周年中央大会”。大会是十月一日在东京青山的日本青年馆举行的，有各界代表一千人参加。大会在宣读日本红十字会会长岛津忠承的贺词之后，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一致通过了西园寺公一^①先生提出的日本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访日的决议案。

在这次中央庆祝大会上，还以热烈的掌声通过了高良富女士提出的《尽快与中国建立邦交》的决议案。

^① 西园寺公一，一九〇六年出生于东京，家庭为贵族，英国牛津大学毕业，曾当过参议院议员，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〇年作为日本民间和平团体的代表常驻我国，从事日中友好运动。——译者注

这一年的友好月，日本北起北海道、南至九州都举办了盛大的活动。全国十八个府、县的三十四处地方举办了介绍新中国的展览，约有十二万人参观。全国二十七个府县放映了中国电影二百二十一场，约有十四万人观看。有二万九千人参加了在全国十二个府县五十处地方举行的庆祝中国国庆节大会。在友好月期间，日中友好协会会员大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配合上述活动，还开展了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签名运动；参议院的厚生委员会^①通过了邀请决议。

一九五四年，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运动进一步活跃起来。日中友好协会一月十日召开的常任理事会向全体会员和机关报的全体读者发出了以下呼吁：

(1)要不断地向外务大臣及众、参两院外务委员长递交各团体要求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决议；

(2)促使全国各地的地方议会通过邀请的决议和意见书，并集中递交给政府；

(3)希望各地的日本红十字会都为促进邀请的实现而奋斗。

为响应这一号召，全国向外务大臣及众、参两院外务委员长要求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决议以及全国各府县议会、市议会的邀请决议和意见书等，纷纷送到政府和国会的有关机关。在各个车站和繁华的大街上都可以看到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员和从中国回国的人在开展签名运动。这一活动已经发展成为巨大的国民运动。

结果，众议院于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一致通过了由各政党共同提出的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的决议。接着参议院也于五月二十九日通过了该决议。

同年十月三十日，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和副团长

^① 参议院中负责福利、卫生问题的组织。——译者注

廖承志等十人)的访日终于实现了。代表团在两周的时间里访问了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神户等城市,在各地受到各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在全国掀起了一个被称为“李德全热”的热潮。如代表团乘汽车从京都去大阪时,沿途五十公里的公路两侧都挤满了人群。当时的盛况成为人们的话题。

由于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美国“遏制中国”的高墙就这样被冲开一个个缺口,开辟了友好往来的道路。

(五) 以累积方式活动的三年

争取扩大交流

一九五四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建国五周年的国庆节。不管美国怎样采取“遏制”政策,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已经成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她在建国后不久就遇到了朝鲜战争;在使全中国沸腾起来的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中,她派出了五十万人民志愿军;中朝两国并肩战斗,粉碎了美国的侵略,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定。在一九五四年七月协商印度支那三国的独立与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挥了巨大作用。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国还在中印会谈中提出了有名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长期以来,这些原则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准则。在国内建设方面,工农业生产早在一九五二年就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并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开展了经济建设。在九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威望的不断提高以及她所采取的对日友

^① 这五项原则是:(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原注

好政策，不能不对日中关系起着极大的作用。中国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开始约一年时间援助在华日侨回国之后，接着于一九五四年八月赦免了四百一十七名已经悔改的前日本军人^①的罪行，并把他们释放遣送回国。

在这段时间里，超党派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三十一人，为庆祝中国国庆五周年应邀访华，日本政府发给了他们护照。同时，由协会派遣的日本学术文化考察团十五人（团长为学习院院长安倍能成^②）和妇女代表团十三人（团长为神近市子），首次取得了民间出国的护照访华，参加了中国国庆五周年的庆祝典礼。

周恩来总理于十月十一日在北京中南海的紫光阁与国会议员代表团及学术文化考察团的全体成员举行了会谈。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它为开辟后来被称为“累积方式”的日中关系的经济、文化、友好交流的道路奠定了基础。日本方面对在押战犯问题，日本渔船在中国近海安全捕鱼问题，以及扩大日中贸易、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等问题提出了希望。对此，周恩来总理说：中国是把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考虑的；妨碍日中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是不承认中国而承认台湾的旧金山“体制”的枷锁；这一“体制”违背了日本人民的意志，是美国强加给日本人民的；中国人民确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粉碎这一枷锁，建立一个和平、独立、民主的日本；在与日本人民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准备解决战犯问题和渔业问题，扩大贸易、文化与友好交流；相信日本人民一定能够战胜阻挠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参加议员代表团的松本治一郎议员，当时特

① 日本军队投降后，他们曾为国民党阎锡山军队雇用，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参加过反革命战争。——原注

② 安倍能成(1883—1966)，资产阶级哲学家，爱媛县人，东京大学毕业，战前曾任京都大学教授，战后曾任贵族院议员、市原内阁文部大臣、贵族学校学习院院长和平问题恳谈会议长等，著有《时代与文化》等。——译者注

别以日中友好协会会长的身分发言说：“通过日本国会各党派代表的发言和周总理的讲话，令人感到这就是为恢复日中邦交而作了非正式的协商。日中友好关系是通向世界和平的道路，希望各党派要齐心协力，为此而努力。”

以这次会谈为基础，打开了争取邦交正常化、发展日中关系的道路。郭沫若先生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①发表了《关于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谈话。郭先生指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提是“日本人民应该促使日本政府和蒋介石卖国集团断绝关系”，而“开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关系”是实现这一前提的一项重要措施。他还谈到：

“这次日本人民邀请我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去访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在日本受到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事实证明，在朝鲜停战后，特别是在日内瓦会议以后，世界和平力量已大大增强，美国好战分子更加孤立了。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政府继续追随美国政策是对它自己不利的。从我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这件事本身，可以证明日本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可以影响日本政府的态度。”

郭沫若先生强调指出，今后要不断发展友好往来，他认为由此而产生的“相互了解和友谊的增进对于促使两国之间关系的正常化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为了响应这一谈话，协会的顾问风见章^②发表讲话说：“随着一九五三年春天在华同胞归国的开始，已经打开了恢复日中邦交

① 原文如此。应为十一月二十日。——译者注

② 风见章，一八八六年生于茨城县，一九六一年逝世。他由新闻记者转入政界，曾任近卫内阁书记官长，近卫任法务大臣时，为其智囊人物之一。战后重新回到政界，一九五五年加入社会党，献身于恢复日中邦交运动。一九五八年与细川嘉六、伊藤武雄、中岛健藏三人共同发表《反省书》，在国内外博得好评。——原注

的道路。这条道路今后肯定会越来越宽广。关于应当排除万难、早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邦交的舆论，正在日本国内形成汹涌澎湃的浪潮。”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十日，吉田内阁倒台，成立了鸠山内阁，中国的《人民日报》在十二月三十日发表了题为《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社论。社论表明中国准备对日本战犯采取宽大政策和解决在中国近海拘留日本渔船的问题等，提出了中国的对日方针，希望日本的新政府用行动证实它的诚意。最后引用了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以下讲话：

“我国是愿意同日本建立正常关系的。如果日本政府也能抱有同样的愿望，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中国政府将准备采取步骤，来使中国同日本的关系正常化。中国政府主张同日本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广泛发展贸易关系，并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文化联系。”

社论最后写道：

“日本应该有它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人们有理由认为，日本的政治领袖们，应该迅速作出符合日本利益的决定。”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中间经过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日中关系中断的三年多时间内，以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为目的、不断扩大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所谓“累积方式”，就是这样开始的。

日中民间渔业协定的缔结

进入借经济与文化交流的“累积方式”以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阶段以后，最初的成果就是日中民间渔业协定。为了缔结这一协定，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八日离开日本前往北京，自一月十三日开始谈判，经过三个月的会谈，协定于四月十五日签字，六月十五日起生效。这个协定的签订也是日中友好协

会经过三年多努力，在“日中渔业恳谈会”的组织及活动中发挥了作用而取得的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就禁止拖网渔船或机动渔船在沿岸十二海里内进行捕鱼作业，以大力保护渔业资源。但日本的大批拖网渔船和机动渔船却不顾这一禁令，侵入这些地区，破坏了资源。当时正好处于朝鲜战争期间，日本渔船上关于气象情况等无线电通讯也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所利用。而且渔船作业海域的地形及水深程度都向上汇报，被美国利用为作战资料。在日本政府采取敌视中国政策的情况下，日本渔船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方面的制止，因此，中国方面从国防上考虑，只得捕捉这些日本渔船。

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领海内共有一百〇五艘日本渔船被捕捉；内有船员一千二百五十九名，其中被拘留的达三百五十八人。他们是从下关、福冈、长崎等渔业基地到中国的上海海面、青岛海面及大连海面的渤海湾，即中国的东海、黄海方面去捕鱼（这在日本称之为以西渔业）的。于是，他们的家属便纷纷请求下关、福冈、长崎等地的日中友好协会支部给予协助。协会乃以内山理事长出面致函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会长宋庆龄，附上被拘留船员的家属在一九五二年八月三十日以后写给他们亲人的二百余封信件，请求她惠予转交。中国人民救济总会曾于一九五二年五月赠给北海道的“月寒主妇会”震灾救济金一万五千元（一元等于一百五十日元）；一九五三年七月又为救济九州大水灾馈赠十二万元；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作为中国的国际救济组织早就在日本名扬遐迩。内山理事长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收到了宋庆龄会长的复信，谈到已经把家属的信件全部转交给被拘留的船员，同时还附来船员给家属的信二百〇二封。宋庆龄会长的信还说，被拘留的船员身体健康，受到人道的待遇等等。协会通过上述工作并从中协助，使以西渔业界和有关人士于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五日组织了日中渔业恳谈会，协商了解决以西渔业问题的办法。

一九五四年七月九日至十一日举行的日中友好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日中渔业恳谈会干事长山崎喜之助先生（大洋渔业公司专务董事）等许多有关人士参加第三分组会，进行了认真讨论。其结果是大会通过一项关于《争取和平解决渔业问题的决议》，其中规定日本渔船不得侵犯中国的领海；《决议》并要求日本政府与中国方面协商有关以西渔业问题。《决议》还决定向中国派遣民间渔业代表，举行日中渔业会谈；指出日中双方应协作保护以西渔场的资源，预防与援救海上遇难。此外，还决定争取舆论支持，要求日本政府解决渔业问题。

当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于一九五四年十月三十日开始为期两周的访问时，全体被拘留的船员三百一十八名和三十艘渔船释放回国。接着收到了中国方面希望日本派遣代表进行协商的邀请。

日中友好协会建议要站在国民的立场上来对待日中民间渔业谈判。根据这一建议，由日中渔业恳谈会、大日本水产会、远洋拖网渔业协会、水产冷冻工会协议会、渔业协同组合联合会、海员组合和水产研究会七个团体组成了日中渔业协议会，并向中国派出了以七田末吉（日本远洋拖网渔业协会副会长）为团长的代表团。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五日签订了日中民间渔业协定。这个协定包括缔结协定时发表的联合公报、协定正文和附件，以及两国代表团之间交换的书信和备忘录等文件。协定根据平等互利与和平共处的原则，阐明了合理利用渔场、保护资源及在作业时避免出现纠纷的基本立场，从而保证了日本渔船的安全作业。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成立 与划时期的第三次贸易协定的签订

在解决渔业问题的同时，经济界促进日中贸易的运动也得到发展，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以村田省藏为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总人数达三十八人的大型中国贸易代表团（团长是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理主席雷任民）于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访问日本。这是继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之后，中国代表团的第二次来日访问；在日本以经济界为中心掀起了欢迎的热潮。代表团于五月四日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及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签订了划时期的第三次日中贸易协定。作为这一协定的附件，附有村田省藏先生给雷任民先生的信，其中说明鸠山首相曾向议员联盟的代表表示对这协定支持并给予协助。日中友好协会对此表示欢迎，即日发表了声明，指出执行这个协定的首要问题在于日本政府方面。声明说：

“要实现这个协定，必需有政府的积极措施。要实现占进出口物资百分之三十五的甲类物资（钢材、机器等重要品种）的贸易，必需开放禁运（根据美国的倡议，西欧国家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协商决定了对共产主义国家及中国禁止出口的重要物资的品种）并扩大范围（协定第二条）；双方贸易上的支付及清算，应当由日本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缔结支付协定，开立清算账户来办理（协定第五条）；相互在对方国家设立常驻商务代表机构，双方的商务代表机构及其人员应给予外交官待遇的权利（协定第十条）。尽管目前两国的邦交尚未恢复，但以上各条是应当而且可以办到的；这个协定对两国是有利的。而要实行这一协定，首要的问题是在于日本政府方面。”

声明还进一步指出当前日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保证是含糊的，并呼吁国民舆论的支持。声明认为能否执行这一协定，也是能否向邦交正常化前进的标志。

打开学术、技术交流的门户

日本学术会议中国考察团^①一行十五人，应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邀请，于一九五五年五月访问了中国，并与许多中国科学家进行了学术交流，从而开创了日中学术交流的道路。六月九日，考察团一行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畅谈。六月二十日晚，茅诚司^②团长通过北京电台的对日广播，发表谈话说：“我深信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世界和平的基础，应当从学术方面打开这一关系，所以我访问了中国。我希望中国的科学工作者能早日访问日本。”

作为这次访问的回访，同年十二月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以郭沫若先生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考察团一行十五人应日本学术会议的邀请，来到了日本，访问了东京、神奈川、仙台、千叶、爱知、京都、大阪、奈良、冈山、广岛、福冈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日本医学代表团（团长堂森芳夫）应中国医学界的邀请访问了中国，缔结了两国医学界的交流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日本于一九五六年与一九五七年向中国派遣了医学代表团。中国也于一九五六年十月派出了中华医学会代表团访问日

① 根据日本学术会议的决议，一九五五年五月派出了访苏访华学术考察团。团长是当时的学术会议议长茅诚司先生。另外南原繁先生和大内兵卫先生还代表学士院、以顾问的资格参加了该团。——原注

② 茅诚司，一八九八年出生于神奈川县，东北大学毕业，留学德国，为金属物理学家，当过东京大学校长。——译者注

本,以团长刘允中为首的四名代表参加了亚洲产业保健会议,以菌种保存委员会主任方心芳为首的五名代表参加了亚洲大洋洲电子显微镜会议。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又派中华医学会代表团(柯麟团长等十一人)访问了日本。这些活动开始了医学交流。

在学术交流方面,土木水利学会(团长谷口三郎)一行六人于一九五六年十月、日本考古学考察团(团长原田淑人)一行十人和物理学访华代表团(团长朝永振一郎^①)一行十九人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又相继访问了中国。中国方面出席国际地球观测年西太平洋地区联络会议代表团(团长赵九章)一行八人也于一九五七年二月来到了日本。

在技术交流方面,电气通讯技术代表团(团长伊集院虎一)一行九人于一九五六年十二月访问了中国,农业技术代表团(团长村松久义)一行五十人于一九五七年六月访问了中国。农业技术代表团包括各方面的专家,分为农政组、综合管理组、耕作组(水稻、旱地作物、土壤、肥料、土地利用、植物防疫)、畜产组、果树林业组、农业机械组,在长达四十五天的时间里访问了华北、华中、华南、东北各个地区,举行了一百几十次农业技术交流。同年十月,中国农业技术代表团(团长是农垦部部长王震)一行二十六人来到了日本,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交流。这是农业技术交流的开始。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频繁的文艺交流中诞生

日中友好协会根据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协商的结果,于一九五五年十月派遣代表日本传统艺术的市川猿之助^②歌舞伎剧

^① 朝永振一郎,一九〇六年出生于东京,京都大学物理专业毕业,留学德国,历任东京大学教授、东京教育大学校长等,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学士院会员。——译者注

^② 市川猿之助(1888—1963),著名的歌舞伎演员,东京人,本名喜聚斗政泰,晚年改名为市川猿翁。——译者注

团访问中国，在北京、天津、广州进行了一个月的访问演出。第二年——一九五六年，与朝日新闻社共同邀请以中国著名演员梅兰芳为团长的中国京剧团，在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福冈举行了演出。这次歌舞伎与京剧的相互友好演出受到了两国人民热烈的欢迎。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以前首相片山哲^①为团长的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代表团一行二十七人，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邀请，访问了中国，并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亲切的会谈，与外交学会发表了联合公报，与总工会签订了关于各产业工会交流的协议，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签订了《关于文化交流的协议》。《关于文化交流的协议》由以下两项组成：

(1)日本拥护宪法国民联合会和日中友好协会、其他民主团体、文化团体合作，共同建立一联络机构，上述联络机构成立后，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密切联络，以促进日中两国人民间的文化交流事宜。

(2)由该联络机构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协助，互相举办介绍对方国家的绘画、雕刻、建筑、电影、戏剧、音乐、文学以及其他文化成就的展览会、表演会和出版等文化交流工作。

根据上述协议，片山哲团长等回国后，得到了日中友好协会等团体的协助，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三月二十三日，日本文化交流协会举行成立大会，推选片山哲先生为会长，中岛健藏^②先生为理事长，大野幸一先生为事务局长，并从学术界、戏剧界、文学

^① 片山哲(1887—1978)，出生于和歌山县，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当过律师，战后曾任社会党委员长，一九四七年组织日本第一个社会党内阁，仅九个月就辞职。——译者注

^② 中岛健藏，一九〇三年出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文学系毕业，文艺评论家，一直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致力于日中友好和日中文化交流活动。——译者注

界、美术界、舞蹈界、体育界和政界等选出了理事。当时正值中国京剧团应日中友好协会与朝日新闻社的邀请来日本访问演出。文化交流协会参与接待工作，协助演出成功，从此开始了活动。

一九五五年六月在赫尔辛基举行了世界和平大会。日本文化艺术界许多人士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在归国途中应邀访问了中国，为此后的文化交流开辟了途径。

另外，以横田实为团长的日本新闻通讯广播界代表团一行十五人，应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邀请于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次访问了中国。

在中国电影方面，《白毛女》自一九五二年起通过日中友好协会，在日本全国放映，并受到热烈欢迎。以后中国提供的纪录片和故事片又不断地在日本放映，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与此相配合，中国也在一九五六年六月首次举办“日本电影周”，北京等十大城市上映了《二十四只眼睛》、《正是为了爱》、《这里有泉水》、《没有太阳的街》和《最后的妇女》等影片。同时，乙羽信子^①等日本电影界的代表访问了中国，受到中国各方面的热烈欢迎。此外，一九五七年二月，北京举行的亚洲电影周期间，放映了日本电影的优秀影片《米》，其主要演员望月优子^②作为日本电影工作者代表团（团长牛原虚彦）^③十名成员之一，也应邀访问了中国。日本话剧代表团（团长宇野重吉）^④一行八人也于一九五七年四月首次访问了中国。

① 乙羽信子，原名加治信子，一九二六年出生于大阪，现为宝塚歌剧团演员。——译者注

② 望月优子（1918—1977），原名铃木美枝子，东京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当选为社会党参议院议员。——译者注

③ 牛原虚彦，又名牛原清彦，一八九七年出生于熊本县，东京大学文学系毕业，电影导演；日本大学讲师。——译者注

④ 宇野重吉，原名寺尾信夫，一九一四年出生于福井县，日本大学毕业，著名演员和导演。——译者注

在美术交流方面，一九五六年八月，为纪念日本室町后期^①的著名僧人画家、曾在明代到中国学习水墨画的雪舟^②逝世四百五十周年，在北京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日本方面由山口蓬春^③、桥本明治^④、北川桃雄三位先生代表日本的“雪舟纪念会”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

另外，第一次日中出版交流代表团（团长为平凡社社长下中弥三郎）一行八人，应中国国际书店的邀请，于一九五六年七月访问了中国。

一九五六年中国国庆节，日中友好协会派遣了以田边尚雄^⑤先生为团长、中村汀女^⑥先生为副团长的二十二人的文化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十月十九日，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日中友好协会派遣了长与善郎^⑦先生、里见弴^⑧先生等六人随同内山完造先生一起访问了中国。此外，以青野季吉^⑨先生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一行十一人也于十一月访问了中国。

① 室町是京都的地名。一三九二年至一五七三年，足利氏在此设立幕府，实际掌握日本政权，日本历史上称为室町时代。——译者注

② 雪舟（1420—1506），日本著名的山水画家。一四六八年曾来中国学画。他的著名作品有《山水长卷》《天桥立图》等。——译者注

③ 山口蓬春（1903—1971），北海道人，东京美术学校毕业，著名的日本画家。——译者注

④ 桥本明治，一九〇四年出生于高根县，东京美术学校毕业，日本画家，艺术院会员。——译者注

⑤ 田边尚雄，一八八三年出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毕业，日本民族音乐研究家，现为东洋音乐学会名誉会长。——译者注

⑥ 中村汀女，一九〇〇年出生于熊本县，又名中村破魔，俳句诗人，主编俳句杂志《风花》。——译者注

⑦ 长与善郎（1888—1961），东京人，东京大学毕业，资产阶级作家，著有小说《青铜的基督》、《竹泽先生这个人》和戏曲《项羽与刘邦》等。——译者注

⑧ 里见弴，一八八八年出生于神奈川县，本名山内英夫，东京大学毕业，资产阶级作家，艺术院会员，为有岛武郎的弟弟，著有《安城家的兄弟》和《多情佛心》等。——译者注

⑨ 青野季吉（1890—1961），新潟县人，早稻田大学毕业，左翼文艺评论家，著有《解放的文艺》、《文学五十年》等。——译者注

日本工人应邀参加北京的五一国际劳动节

中华全国总工会一九五二年首次邀请总评、产别会议、争取提高工资共同斗争委员会这三个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工会组织派代表团参加北京五一劳动节。

中国邀请我国工人参加北京的劳动节，引起了我国工人的巨大反响。很多人主张“不要仅限于干部，应该让更多的人都能到中国去”。车间的气氛很热烈，十分生动活泼地推选出了代表。

吉田内阁拒绝给选出的代表签发护照，并且对准备以实力强行出国的十五人代表团，以违反出入国管理令的罪名，从六月六日起，在山口地方法院下关分院进行公审。“参加中国五一国际劳动节日本代表团”从狱中写信给日中友好协会说：

“……日本的工人阶级对日本政府禁止和压制出国感到无比愤慨，并决定支持我们代表团以实力强行赴中国，这是保卫日本国宪法、维护国民权利的极其正当的行为。因为日本国民内心热烈希望与中国友好和进行和平贸易，希望把国民的生活从战争经济的破坏中解救出来。日本的工人阶级为了不辜负国民的这一热诚期望，坚决为维护国民的权利和出国的自由、为要求撤销出入国管理法令而斗争。为了维护民主和保卫世界和平，一定要争取日中友好与和平贸易。 参加中国五一国际劳动节日本代表团谨启”

不过，据同年九月二十一日新华社北京电讯报道，四名参加劳动节的代表排除万难，在这之前不久已到达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于二十一日举行了欢迎这四位代表的大会，总工会的代表和廖承志先生（以当时的“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主席”的身份）致欢迎词。总工会又邀请这四名代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周年的国庆典礼（十月一日）。

一九五三年的劳动节，中华全国总工会又向日本各工会发出

了邀请；日本的总评也相应地邀请中华全国总工会派一名代表参加东京的劳动节。中华全国总工会决定派常务委员李颀伯先生为访日代表。但均因日本政府的阻挠而未能实现。

总评代表首次到北京访问中华全国总工会，是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总评的柳本美雄先生作为中国殉难烈士遗骨护送团的成员之一，乘“黑潮丸”前往中国。中华全国总工会非常高兴，赠给日本工人一部中国电影《翠岗红旗》，总评也回赠了总评旗。

一九五四年的劳动节，中华全国总工会再次邀请总评、产别、海员组合等派遣代表团访华，总评也邀请总工会的代表访日。但均因日本政府在护照问题上刁难而未能实现。

日本的工会代表团迫使政府发给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参加了北京的劳动节，是从一九五五年的劳动节访华代表团（团长是高野实先生）开始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首次访日，是出席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八日在东京召开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七届大会的六人代表团（团长是李颀伯先生）。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应总评邀请正式访日是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代表团除董昕团长（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外，有教育工会、邮电工会、第一机械工会、铁路工会、重工业工会和煤矿工会等各个产业工会的代表十五人。他们受到日本全国各个工会的热烈欢迎。这年，日本除了派出劳动节代表团外，还有全日本电机机器工会联合会、金属方面六个产业工会、金属机械工会、国营铁路工会、私营铁路工会总联合会、煤矿工会、合成化学产业工会联合会、日本教职员组合、全国电气通讯工会、民间广播工会等许多工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工人交流的道路越走越宽广。

第一次体育交流

第一次体育交流是中国乒乓球队十八人参加一九五六年四月

在日本举行的第二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翌年——一九五七年，日本方面有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团长是松泽一鹤）六人，举重队访华团（团长并口幸男）八人，全国日本女子排球队访华团（团长冈田英雄）十五人，早稻田大学游泳选手访华团（团长安井俊雄）十三人和足球队访华团（团长竹腰重丸）二十二人访问了中国。体育交流也开展了起来。

青年互访的开始

一九五六年九月，日本青年团体协议会代表团（团长是塞河江善秋）二十二人，应中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邀请访问了中国，这是青年之间交流的开始。第二年——一九五七年三月日本青年团体协议会邀请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刘西元）十人，同年六月邀请第二次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项南）访问了日本。日本方面的社会党青年部代表团二十人和日本青年团体协议会两个代表团二十六人于六月访问了中国。

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代表团来日

一九五五年八月，召开了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中国方面派出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为团长，包括教育家成仿吾（东北师范大学校长）、作家谢冰心、赵朴初（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郑森禹等先生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大会。当时曾有过这样的一段曲折：法务省起初拒绝代表团团长入境，各界代表向法务省和外务省举行了抗议示威游行，最后协会的代表等与正在轻井泽休养的鸠山首相^①直接进行了谈判，首相乃用电话通知法务大臣，

^① 鸠山一郎（1883—1959），东京人，其父鸠山和夫曾任日本众议院议长，早稻田大学校长。鸠山一郎于东京大学毕业，战前参加政友会，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战后组织日本自由党，任总裁，即将组阁时，被剥夺公职。一九五四年组织日本民主党，任总裁，

使他同意中国代表团入境。中国代表团将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八个人民团体所捐赠的五万元(约合七百五十万日元)作为原子弹受害者救济基金,赠给了原子弹受害者团体。第二年——一九五六年,以许广平女士(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会长)为团长、由王芸生(大公报社社长、中国新闻工作者联谊会副会长)、曹禺(剧作家)和康永和(中国第一机械工会副主席)等先生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了第二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以蔡廷锴先生(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了第三届世界大会。中国代表团每次都给原子弹受害者馈赠救济基金。另外蔡廷锴团长一行还出席了当时正在召开的日中友好协会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并作了友好的讲话。

日中友好扩大到地方性的交流

日中友好协会应北京市的邀请,于一九五五年向中国派遣了六大城市代表团^①。以此为开端,第二年——一九五六年派遣了三重县、冈山县、爱知县,一九五七年派出了岐阜县、广岛县、千叶县、福冈县、东海地方自治体^②、冈山市、川崎市、京都市、北海道、熊本县、山阴三县^③、山梨县、静冈县、茨城县和东京都等许多地方单位的代表团。

这样,由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三万名在华日侨回国和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日中之间打破了美国的“遏制”高墙,开辟了友好往来的道路。这条道路由于中国各团体的大力援助而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连任三届内阁总理。其子鸠山威一郎曾任福田内阁的外务大臣,其孙鸠山邦夫为众议院议员。——译者注

① 东京、大阪、神户、京都、名古屋、横滨六大城市代表团由京都市长高山义三等六名协会的理事以及六大城市的议员和专家组成,共四十七人,于一九五五年九月出发访华。——原注

② 一般指日本中部靠太平洋的静冈、爱知、岐阜、三重等县。——译者注

③ 指鸟取、岛根、山口三县。——译者注

日益宽广，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的三年间，日本共有二百九十三个团体、三千二百七十二人对中国进行了友好访问，中国方面有二十七个代表团、三百八十二人访问了日本。日本的访华团包括一九五六年九月的日本旧军人代表团（团长是原中将远藤三郎）、一九五七年四月的第一次社会党访华使节团（团长浅沼稻次郎）、同月由协会派遣的第二次访华妇女代表团（团长久布白落实）三十人，以及由协会协助派出的日本农业农民代表团（团长石田有全）三十人；此外还有基督教代表使节团（团长浅野顺一）十三人和访华佛教使节团（团长高阶珑仙）等宗教团体。

一九五七年中国国庆节时，日中友好协会派出了以松本治一郎会长为团长的祝贺使节团，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等中国方面的五个团体发表了共同声明。这个共同声明反对“两个中国”的阴谋，表示要粉碎阻挠日中关系发展的国内外障碍和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信心。协会将这一共同声明交给全国讨论了一年多，使协会内外广泛地加深了认识。同年十二月，协会还协助中国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迎接了以李德全会长为团长、廖承志先生为副团长的第二次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

“人道与宽恕”——释放战犯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约六十名中年人和老年人在东京下落合的山乐会馆的大厅里集会。日中友好协会的内山完造理事长等数名干部作为来宾列席了会议。一九五六年六月至八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宣布对一千零一十七名战犯免于起诉，并由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与和平联络会三个团体接他们回国。这批中、老年人就是这些战犯的代表。他们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誓将余生献给反战、和平和日中友好事业。他们的集会就是归还者联

络会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他们回国一年来，为了安排生活而四处奔走，但许多人同时还在各自的家乡主动地参加了日中友好协会的活动。他们还写了描述侵华战争时，由他们亲手推行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带给中国人民的巨大灾难的书《三光》（由光文社出版）。这本书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新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却给予他们十分合乎人道的待遇。他们谈到这些情况时怎能不热泪奔流呢。北京的外文出版社正好在这时出版了题名为《人道与宽恕》的图片集，并寄到了日本。

他们大部分人是一九五〇年从苏联引渡到中国的，一小部分是率领日本兵参加了阎锡山雇佣军、进行了反革命战争而被俘的首要分子。在太原集体被俘的四百一十七名日本士兵，因有了悔改表现，于一九五四年被免于起诉，由三团体接回日本。他们中很多人也都参加了友好运动。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就战犯问题访华的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和平联络会三团体的代表，听取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的下列说明：

中国对日本战争罪犯分子的处理方针是极其宽大的。

第一，对占战犯绝大多数的一千余人免于起诉，受到审判的只有四十五人。

第二，中国的方针是不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最重的判刑也仅为二十年。因被拘留的时间也算服刑期，所以判决后仅服很短的刑期即可释放。国民党对一部分战犯判处了死刑，美国也同样判过死刑。

第三，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规定，即使已判刑的，只要悔改态度好，便可以释放。

采取宽大措施的原因，

第一，根据日本投降后十年期间的变化；

第二，在此期间，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获得了发展；

第三，获释的战犯虽有严重的罪行，但由于基本上都能痛改前非，有了显著的悔改表现。

三团体的代表翻阅了关于每个战犯的罪行的详细调查报告和证据、证件，并听取了说明。

十年的拘留时间也许不能算短，但当三团体的代表们参观了管理所并了解到其中的生活，听到获释人员的谈话，再一次感到非常惊讶。大厨房内鸡、鱼、肉、蔬菜堆积如山，理发室不亚于第一流的理发馆，还有大浴池；设备完善的医务室备有爱克斯光设备和设有牙科；既有大图书室又有花坛，自己动手修建的日本式庭园和剧场；每周看一、两次电影，有围棋、日本象棋、麻将俱乐部；组织了篮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等各种体育队，还有合唱团、管乐队、舞蹈队；五一国际劳动节时举行盛大的运动会；此外还建立了绘画部、雕刻部、演剧部、学习部、文化部等组织；这简直就象一个拥有一千寄宿生的大学生活。而且，他们在拘留期间还参观了北京、上海、杭州、武汉、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等十一个城市，简直就象学生的学习旅行。这些尽管在图片集《人道与宽恕》中都清楚地表现出来，但现在却是亲眼看见。他们就是这样地在十年期间彻底地进行了思想改造。

三团体代表还与中国红十字会代表进行磋商，签订了被人们称之为“天津协定”的联合公报。公报中保证要“为开辟日本和中国的侨民相互自由往来的道路而努力”。而且中国满足了日本方面的希望与要求，同意在中国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可以回日本探亲，结果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携带孩子回日本探亲的日本妇女，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一年多的时间内就达六百五十一家、一千五百七十二人。中国红十字会还接受日本方面的委托，

对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日本人努力进行调查，结果查清了一千四百六十九人的下落；此外还把在中国死亡的日本人的遗骨二千四百七十二具和十四个大箱，分三批为我们送回了日本。

此外，对战犯的家属到中国去探望也开辟了途径。家属们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协助下，可以到收容所去探望服刑人员，可以在中国逗留三至四周的时间。逗留期间的饮食起居，均受到中国红十字会热情的照料。

在这一年期间，许多家属到中国的收容所去探望了丈夫、父亲、儿子，看到他们精神饱满、充满了希望，并亲自受到中国红十字会无微不至的接待，所以回国时都激动地说：“受到这样的待遇，真叫人过意不去。”

当这六十名代表在释放归国一年后、召开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首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得到了好消息——他们仍在抚顺收容所监禁的伙伴中，有八人于九月刑满（监禁十三年）获释，另判处十八年徒刑的原中将藤田茂也因表现很好，同时获得释放，正在天津等船回国。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表示要相互帮助，誓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日中友好和反战、和平的事业，并推选了原中将藤田茂为会长。

还在抚顺服刑的人，以后相继获释。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最后三人获得释放。

商品展览会分别在日本和中国举办

日中友好协会一向把两国民间的友好交流和促进贸易当作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友好运动的两项相辅相成的工作。为此，协会下设经济交流委员会，协助各有关贸易团体，为实现第三次日中贸易协定所规定的各项条款而作了努力。

按照协定的规定,从一九五五年十月开始,在日本的东京和大阪首次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为争取展览会的成功,协会竭力协助宣传、动员和警卫等方面的工作。在东京晴海的展览会会场,自十月十七日开幕至十一月三日闭幕,共有六十七万人前来参观。在大阪中之岛会场,自十二月一日至十五日的展览期间,共有一百二十三万人参观。在了解新中国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效果。

协会为了一九五六年十月在中国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获得成功,为了动员舆论以打破巴黎统筹委员会和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限制出口商品的范围,协助贸易团体进行了斗争。中国方面为十月六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会作出很大的努力,以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国领导人参观了展览会,参观群众多达一百二十五万人。恰好在这次展览会期间,鸠山内阁于十月十九日恢复了日苏邦交。十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报》认为“今后应该尽速实现同中国恢复邦交”,殷切地表示了恢复日中邦交的期望。十二月一日至二十六日于上海举办的展览会会场,参观群众达一百六十八万人之多。

在此期间的十二月十二日,日本众议院一致通过了“关于放松巴黎统筹委员会和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的限制,实现设立民间商务代表机构等以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人们对十一月二十三日成立的石桥内阁在促进贸易和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方面抱有极大期望。日中贸易尽管有巴黎统筹委员会和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的限制,一九五六年度的贸易额仍然超过了一亿五千万美元。

第三次贸易协定的有效期间延长了一年,但一九五七年五月协定到期后,又处于无协定的状态,应当尽快缔结第四次协定。然而在协定缔结之前,石桥内阁不幸因首相生病而辞职。岸信介内阁乃于一九五七年二月上台。

第三章 同非友好行动作斗争到 友好交流恢复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三年——

(一) 贸易及其它交流的中断

岸信介首相访问台湾

一九五七年二月上台的首相岸信介^①，出身于商工省官僚，曾与军部相勾结，并曾在炮制伪满洲国的活动中大显身手。他在任东条内阁的商工大臣期间，顽固推行战时统制经济，推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为了弥补战时劳动力的不足，根据内阁命令，四万名中国人被强行劫持到日本，其中七千人被虐待而死；他是这一事件的直接负责人。他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甲级战犯，曾被关押于巢鸭拘留所。岸信介作为美国推行反华、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政策最合适的人选而从巢鸭拘留所释放出来之后，即以反动势力为后盾，活跃于政界，终于爬上了首相的宝座。

鸠山、石桥两内阁在国民舆论的压力下，多少还是朝着自主的方向前进。在恢复日苏邦交后，接着又开始争取恢复日中邦交、扩大日中贸易和文化交流。而岸信介首相却完全是反其道而行

^① 岸信介，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山口县，本姓佐藤，其兄佐藤市郎，为海军中将；其弟佐藤荣作。岸在东京大学毕业后入商工省，在东条内阁任国务相军需次官（东条兼任军需大臣）、商工大臣。战后积极组织保守政党，为极右分子，现为自民党顾问、皇学馆大学校长、众议院议员。——译者注

之。他刚一组阁就扬言“不可能考虑与‘中共’建交”。他从五月二十日开始历访东南亚各国，四处游说“‘中共’威胁”。在归国途中，于六月二日作为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问台湾，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当蒋介石声称“‘国府’即将反攻大陆，恢复中国大陆的自由”时，岸信介首相则说：“非常同意，太好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是理所当然的。

岸信介首相接着于六月五日访问了美国，二十一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日美联合公报》，高唱所谓“日美新时代”，暗示要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和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在日美会谈中，大肆叫嚷“中国共产党要向整个亚洲渗透”和什么中国的“威胁”，并商谈了增强日本自卫队，以及把自卫队纳入美国的核战略体制等问题。

七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日本民间广播联盟代表团一行和共同社及朝日新闻社特派记者，就中日关系发表了谈话，批判了岸信介在美国的反华言行。八月二日^①中国方面宣布：只要日本政府不改变对一向引起争论的指印问题^②的方针，就不得不暂时搁置原定于一九五七年度在名古屋、福冈举行的中国商品展览会。

破坏第四次贸易协定

日中友好协会从八月十七日在东京召开了为期三天的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严厉批判了岸信介首相，同时要求日本政府立即以诚意的态度来对待缔结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大会还对新

① 原文如此。应为八月七日，指这一天《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贸易和指印》。——译者注

② 据日本政府规定，外国人在日本逗留两个月以上者，根据外国人登录法，必须登录指印，但享有外交官待遇者除外。这里所说的指印问题，是把中国人当作罪犯看待，因此中国不能同意。——原注

近成立的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表示欢迎，并呼吁发起一个国民运动，为加速邦交正常化而共同努力。

此外，前首相鸠山一郎先生以日苏协会会长的身分，给大会寄来了贺信，对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给予热情鼓励。贺信说：

“诸位知道，不久前我为日本和苏联的邦交正常化曾尽过微薄之力。那时由于日苏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和人们疑虑日美关系会受影响等等，我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但我深信，世界的大势表明，尽管存在思想意识上的差异，而和平共处是可能的，并且也是应该这样做的。所以我断然采取了行动。结果表明不论对日本还是对苏联都带来了相当大的利益。应该说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也完全可以根据这一事实来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我祝愿与会的诸位先生能在日中两国人民之间建立起充满善意的友谊来。”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和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召开了“要求立即缔结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全国企业家大会”。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题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报告中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作了详细的揭露，其中指出日本对此问题的态度：“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生活中日益不容忽视的强大力量。但是，日本首相岸信介却企图利用这个形势，来达到别有用心目的。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在日本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上说：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是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自称对大陆中国据有主权的結果’，‘除非能调整他们的争执，否则就不可能消除紧张局势’。这不仅是替美国侵占台湾打掩护，而且是替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找论据。这个企图早已被日本人民识破。例如，在一九五七年先后来中国访问的日本社会党访华亲善使节团、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访华使节团和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就都表示了促

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热烈愿望，并且认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反对制造‘两个中国’。这就说明，用‘两个中国’的论调混淆是非、蒙蔽日本人民固然不可能，企图利用日本人民广泛展开的恢复日中邦交运动为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服务，也是办不到的。”

促进签订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的舆论日益高涨，在几十个市、町、村的议会上都作出了促进签订协定的决议。在这样的国民舆论的压力下，包括有执政党国会议员参加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也终于鼓起劲头，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进出口组合的代表一起前往北京，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五日签订了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在协定的第十一条中规定：“相互在对方国家设置常驻的民间商务代表机构”，在备忘录中规定：“商务代表机构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等。

要实施这一民间协定，当然需要有政府的保证。但是岸信介内阁在与台湾方面进行联系之后，于四月九日回答缔结贸易协定的三团体说：“不能承认有悬挂国旗的权利。”爱知官房长官同日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谈话。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拒绝接受由日本三团体转来的这个答复，并声明“在日本政府设置的障碍没有扫除以前，这个协定是无法实施的”。

四月十日，以日中友好协会为首的三十七个民间团体组成了完全实施协定国民运动实行委员会，向岸内阁提出抗议，以迫使岸内阁同意完全实施这个协定。

四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强烈追究岸内阁破坏第四次贸易协定的责任，揭露这是与岸首相妄图重建“大东亚共荣圈”的野心相联系的。日中友好协会于四月十七日发表声明，号召开展强大的国民运动对岸信介政府施加压力，同时于四月三十日召开了全国理事会紧急会议，发表了《告国民书》，谴责岸内阁用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来破坏日中贸易协定。

长崎国旗事件

就在这个时候，在长崎发生了侮辱中国国旗的事件。

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从四月三十日起在市内的滨屋百货公司举办介绍中国展览会，会场上悬挂了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的国旗。但是蒋帮驻长崎的“领事”常家铠却在当天向长崎市政府要求取下会场上的中国国旗。接着东京的蒋帮“大使”也于五月二日向外务省提出“抗议”，要求“取下长崎市滨屋百货公司的‘中共’国旗”。而外务省立即劝告滨屋百货公司取下中国国旗。

同日下午四时半左右，两名暴徒闯入滨屋四楼的展览会场，突然扯下了中国国旗。当时在会场上的主持人立即将这两名暴徒抓住，扭送长崎市警察局，认为这是“侮辱国旗事件”，要求查清其背景，并给予惩罚。可是警察局却很快将暴徒释放了。协会总部接到报告后，立即追究岸内阁的责任，同时广泛地向各界发出了呼吁，组织抗议岸内阁的运动。而岸内阁坚持其“不承认中国，因而也就不承认国旗”的立场，拒不承认有任何责任。这一事件引起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慨。

在发生这一事件前不久，一九五八年二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广州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参观人数达七十六万人。接着于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又在武汉举办了日本商品展览会，参观人数达七十四万人。

广州与武汉日本商品展览团副团长森井庄内先生听到日本发生的事件后，紧急回国并发表了以下谈话：

“广州、武汉的日本商品展览会的会场上都悬挂着太阳旗，并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旁守卫。中国方面还建议：晚上可以把旗子降下来加以修整，中途脏了可以更换。日本方面往往漫不经心，经常是中国方面不声不响地给换上新的太阳旗。中国对待日本国旗

的态度就是如此地严肃。但这并不就说明中国人喜欢太阳旗。很多人一看见太阳旗就想起过去令人憎恨的战争，有的人当场愣住了，有的人心里很难受。当日本开始接连发生对中国不友好的事件时，展览团中国方面的办公室接到许多关于悬挂太阳旗的信件、电话乃至直接的抗议。中国方面的负责人进行了说服工作，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发展两国的经济和友好。

“长崎国旗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线。在没有协定的这一期间，中国方面蒙受了不少屈辱。预定在名古屋、福冈举办中国展览会的先遣人员因指印问题而从香港退回去，这是日本政府干的事；在代表机构问题上吹毛求疵进行阻挠的也是日本政府。现在又发生了侮辱国旗的事件，中国看来是忍无可忍了。我临回国的时候，在武汉听到中国方面的负责人说：‘据说日本认为没有日本的援助，中国就不可能进行建设，……。’他们的语气表现出强烈的愤慨。”（《日本与中国》第二二一号）

五月九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发表讲话说：“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长崎事件后，与中国方面的商业谈判全部停止，日中贸易完全中断。正在日本演出的中国歌舞团和其他代表团均提前回国。文化交流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提出“政治三原则”

一九五八年七月七日，《人民日报》以《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为题，发表了长篇社论，强烈地谴责了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社论强调说：“具有潜在的军国主义野心和帝国主义欲望的日本垄断资本集团，在美国的扶持下，不仅正在把日本拖入灾难的深渊，而且也是对亚洲各国的一个严重的威胁。中国人民，考虑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考虑到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利益，

认为有责任从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彻底揭露这个政府的本质。这样做，不仅不是过火，而且是绝对必要和适时的。”社论最后说：“如果岸信介政府继续敌视中国人民，继续制造‘两个中国’，继续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那么，中日来往全面中断的责任，应该全部由岸信介政府担负。”并提出了重新恢复日中之间往来的原则，即：（1）反对敌视的政策；（2）反对“两个中国”的政策；（3）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些原则后来一般称之为“政治三原则”。

六月十一日，中国渔业协会拒绝延长已经到期的日中渔业协定。中国致电日中渔业协会发出这一通知时，也把政治三原则作为重新开展日中关系的前提提了出来。

刘连仁事件

在这个时期，刘连仁事件再一次暴露了岸内阁敌视中国的本质。

一九五八年二月九日，在北海道石狩郡当别村的一个积雪深山的山洞里，发现了一个名叫刘连仁的中国人。刘连仁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在故乡山东省诸城县正在地里干活时被日本侵略军捉走的；在强行劫持到日本后，被强迫在北海道雨龙郡沼田的明治矿业公司的煤矿上干苦役；因不堪虐待和饥饿，在日本面临战败的七月，与四名同伴一起逃跑了。以后十四年期间，一直在北海道的深山中到处辗转藏身，过着非人的生活。刘连仁被发现后，日本政府竟然企图以“非法居留日本”的嫌疑罪要对他进行审讯。刘连仁发表了《向日本政府抗议》的声明，他说：“要想了解我的身份，可以去问岸首相。”他拒绝一切审问。他以毅然的态度声明说：“如果日本政府还要谈什么法律，那末首先就要按照国际法，立即把我的情况通知我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让我早日重返和平的家

园。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和明治矿业公司赔偿我过去十四年间在日本所受到的身体和精神的损失。”

日中友好协会等三个办理日侨归国的团体，支持刘连仁的声明，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强行劫持”的事实，并向本人表示道歉。但爱知官房长官却逃避责任，说什么“过去的事不用提了，总之让他回国就行了。”刘连仁于四月十日乘“白山丸”离开东京港，带着一百二十位难友的遗骨（都是被强行劫持到日本，被虐待致死的）返回了祖国。现在刘连仁在他的故乡担任人民公社的干部，与等待他十四年的妻儿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二）打开危机与反对“安全条约”

同制造“两个中国”作斗争

协会同其他团体一起，于五月二十日召开了“打开日中关系紧急局面国民大会”，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个反对岸内阁的敌视中国政策、反对制造“两个中国”、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运动。协会在七月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把这一运动作为协会活动的中心内容。

八月，美国指使蒋介石把蒋军三分之一的兵力调到金门、马祖，把空军司令穆尔从菲律宾派到台湾，加强美国驻台湾的空军和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大肆进行军事挑衅活动。协会与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总评以及各和平团体和政党等互相配合，组成了“台湾海峡对策协议会”，提出“美军立即撤出台湾地区”、“不得使用在日美军基地”等要求，并向美国大使馆和日本政府发起了抗议行动。这些团体还于十月八日在东京日比谷露天音乐堂联合召开了万人规模的“打开日中关系、禁止核武装国民大会”，提出了（1）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从台湾撤退；（2）不准岸政府协助美军在

台湾水域的军事行动；（3）废除日台条约、与中国恢复邦交等口号，并举行了游行示威。同年十月，应邀参加中国国庆节的协会代表团（团长松本治一郎）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三团体发表了共同声明。声明中明确提出：相互支持日中两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干涉两国内政、侵犯主权以及威胁亚洲和平的斗争。

岸内阁为了进一步加强日美军事同盟，加速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一九五八年十月就开始了修改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协会认为：“从其结果来看，如果美国一旦向中国发动战争，日本就将自动地、积极地参战。这样不但谈不上日中友好，而且要把两国人民驱入无法挽回的不幸的深渊。”因而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发表了声明，主张立即停止修改安全条约的谈判，“安全条约”本身也应该废除。

“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一九五九年，协会与其他团体一起，结合反对“安全条约”、废除“日台条约”与恢复日中邦交，大力开展了活动。二月二十八日，由总评和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团体主持，在协会的参与下，于四谷外堀公园召开了约有三万人参加的“粉碎安保体制、恢复日中邦交国民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国的来电，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三月，社会党第二次访华使节团团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了讲演，指出“美国占领了日本的冲绳，占领了中国的台湾。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一讲话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协会与总评、促进日中贸易工会协议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打开日中关系企业家协议会等团体联合举办了欢迎社会党访华使节团的报告会，听取了浅沼团长

的报告，热烈支持浅沼的讲话。协会接着在三月二十八日与总评、社会党、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全日本农民组合联合会等十三个团体作为发起团体，出席了有数百个团体参加的“阻止修订安全条约国民会议”的成立大会。另外，协会还于四月七日在众议院议员第一会馆主持召开“打开日中关系、废除和阻止修订安全条约中央抗议集会”，共有二十六个团体的一百五十名代表参加了这次集会。会议通过的事项包括：“一、政府立即停止修订日美安全条约的谈判；二、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向六亿中国人民承认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采取具体措施，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争状态；三、政府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关于恢复邦交的直接谈判，采取重开贸易和保障东海、黄海渔业安全措施”等七项要求，并立即递交给了政府。

“阻止修订安全条约国民会议”所主持的第一次统一行动是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举行的。协会作为这个国民会议的干事团体之一，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全部参加了从第一次到二十三次伟大的全民性统一行动。

一九五九年八月，协会召开了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重申协会的基本性质是：“我协会是以日中友好为目的、由日本国民所组成的群众团体；不问政党、思想、信仰如何，凡是希望日中友好的个人或团体都可以加入”；同时强调指出：“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因受政府和新闻机构的宣传，不但不理解新中国的和平政策，反而对中国抱有不信任的思想。考虑到政府正利用这种情况作为修订安全条约的依据；必须在更广泛的国民中普遍介绍中国情况的任务已落到我协会的肩上。这是我们必须带头进行的一项独特的工作。协会与政党或工会不同，它有各界、各阶层的人士参加，他们的政见和信仰也各不相同。因此从协会来说，开展阻止安全条约的运动也必需具有自己的特点”（《一九五九年度运动方针》），并号召

根据协会活动的特殊性和加强扩大组织,来建立自己的主体性。

这一年利用放映中国电影的活动,在全国动员了二十多万人,另外还利用中国提供的资料,在全国的中小城市举办了“中国文化事业展览会”,一年期间里约有一百万人参观了展览会。当时发生了中印边境纠纷等事件,新闻机构大肆进行反华宣传。针对这一情况,协会以支部为单位,生动活泼地举办了讲演会和学习会。会员人数在这一年终于突破了一万人,全国的支部、支部筹备会和联合会达二百三十九个(《一九五九年度全国代表大会组织形势表》)。这次大会还部分修改了协会的章程,并写进了要开展“促进恢复日中邦交”、“排除阻碍恢复日中邦交的各种活动”。

大会还通过了致石桥湛山前首相和松村谦三先生的鼓励信。他们是自民党内的修订安全条约的批判派,也是主张日中友好的人士,他们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邀请即将访华。

石桥湛山先生在志同道合的宇都宫德马^①(协会创建以来的支持者)等先生的陪同下,自一九五九年八月至九月访问了中国,于九月二十日同周恩来总理发表了会谈公报。公报赞扬了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和作出的努力,特别肯定了“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加以分割。”

松村谦三先生于十月至十二月访问了中国,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谈,虽然未发表公报,但松村先生回国后所作的报告是支持和鼓励日中友好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世界八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次盛典。在日本,由协会倡议,将九、十两月作为“实现恢复日中邦交、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

^① 宇都宫德马,一九〇六年出生于东京,京都大学经济系毕业,众议院议员,原属自民党,一九七六年退党。历任行政管理厅政务次官、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副会长等职。对我国态度友好。——译者注

共同行动月”，并由七十多个团体组成了实行委员会。中国向实行委员会发出了邀请，要求派三十人的代表团参加北京的庆祝典礼。实行委员会派遣了以前首相片山哲为团长、包括协会代表宫崎世民^①先生在内的各界代表三十人的庆祝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与中国方面的七个团体发表了共同声明。在共同声明中，日本方面表示要努力排除岸内阁的敌视中国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争取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争取日本的完全独立、民主自由、永久的和平、中立的愿望和日本人民反对修改并且要求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运动是深刻理解的”。中国方面还指出：“为使远东的紧张局势得以缓和，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地区全部撤退。解放台湾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方面对此表示衷心理解。共同声明中还谈到要实现三月份社会党第二次访华使节团团长浅沼稻次郎所提出的日中两国渔船紧急避险协定。这个协定在一九六三年的第二次民间渔业协定缔结以前，日本方面已经通过日中友好协会、中国方面通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付诸实施。

日本在东京千駄谷体育馆隆重地举行了有五千人参加的“实现恢复日中邦交、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国庆中央集会”。

同年九月二十日，协会的副会长兼理事长内山完造先生访问中国，在到达的当天晚上，正与中国朋友谈笑时突然脑溢血，寿终于七十四岁。内山先生作为内山书店的主人在上海生活过四十年，人们都知道他与鲁迅先生的亲密交往。战后他是日中友好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不顾年高体弱，用他那种被称为“内山式漫谈”的通俗易懂的语言，亲自在全国进行宣传，为协会争取群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内山先生的逝世，日中双方都表示了深切的哀悼。

^① 宫崎世民，一九〇一年出生于熊本县，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现任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理事长，致力于日中友好运动。——译者注

反对一九六〇年“安全条约”与打开日中关系的运动

岸信介首相不顾日本国民乃至执政党内部的强烈反对，作为全权代表亲赴华盛顿，于一九六〇年（昭和三十五年）一月二十日签订了“新日美安全条约”。为反对和阻止国会批准这一条约的全国统一行动，一浪高过一浪地在全国开展起来。一月二十二日晚，北京电台广播了郭沫若先生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鼓励日本人民的斗争，并号召“让我们更紧密地携起手来，筑成一道和平与友谊的有生命的万里长城！”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一千五百人参加的“反对日美军事同盟大会”。

协会决定要与有关团体一起站在三月——四月的“打开日中关系、阻止修订安全条约行动月”的前列。国会从二月十九日起开始对“新安全条约”进行审议，这引起社会舆论哗然，反对批准条约的地区性共同斗争组织在全国已超过一千个。协会一再强调要把反对安全条约与打开日中关系的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协会结合反对安全条约的群众性行动，提出了协会自己独特的活动方针——使群众正确地了解中国的现状和对日政策，揭露日本政府的敌视中国政策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大力组织中国电影会和讲演会，把反对安全条约的请愿签名与争取恢复日中邦交的签名结合起来开展签名运动，争取市、町、村议会作出决议，等等。协会还携带当时仍在抚顺战犯收容所服刑的原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曾为岸信介的同僚）和原中将铃木启久等二十四人写来的信，并代表他们向岸首相提出了抗议。此外还举办了一年前的前首相石桥湛山和宇都宫德马先生等人的讲演会。法政大学教授谷川彻三^①等一百二十六位文化界人士于四月二十

^① 谷川彻三，一八九五年出生于爱知县，京都大学文学系毕业，文学博士，曾任法政大学校长，现为该校名誉教授。——译者注

一日主持召开了“日中团结国民集会”。协会和“国民议会”等四十五个团体支持这一行动，动员了二千人在日比谷公会堂集会，提出要“阻止批准‘安全条约’，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并派代表们会见了众、参两院议长，当面提出了要求。四月二十六日，由石桥湛山、松村谦三、有田八郎（前外相）等各界三十九位人士发起，在文京公会堂举行了有二千人参加的“强行劫持中国人事件死难者国民追悼大会”，原中将藤田茂等人用活生生的事实揭露东条内阁（岸首相当时也是这个内阁成员之一）的罪行，谴责签订“新安全条约”就是要重走过去的老路。

正当日本举行第十六次反对安全条约统一行动的高潮期间，中国从五月九日起在北京、天津、长春、旅大、成都、南昌、沈阳、西安、抚顺、重庆、武汉、南京、广州、哈尔滨等全国三十三个城市举行了有一千二百万人参加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大会”。当时正在访华的协会的活动家代表团（团长赤津益造）参加了一百万人的北京大会和各地的大会，并发表了讲话，表明了日本国民的决心。在十日举行的济南市三十万人的大会上，战争期间被劫持到北海道煤矿、在荒山中度过了十四年逃亡生活后回国的刘连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岸信介政府的罪行。十五日上海举行了一百七十万人的大会。在上述各地举行的大会的基础上，各个工厂车间、农村和地区纷纷举行小型集会，许多人在会上争先恐后地控诉过去身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之害，很多人在会上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日美军事同盟来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再次侵略中国。日本人民正在开展规模巨大的斗争来反对这一阴谋。日中两国人民是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兄弟和战友。”中国各大城市的大会都给日本正在开展第十六次统一行动的各地区共同斗争组织发来电报，呼吁加强双方的团结。

自民党在五月二十日午夜零时六分召开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

强行单独通过了承认“新安全条约”的决议。但是，不仅社会党和民社党拒绝出席这次会议，就连松村（谦三）派、石桥（湛山）派、河野（一郎）派^①等自民党反主流派的三十多名议员也拒绝出席。

人们对此感到无比愤怒，舆论更加激昂，国会周围连日被数万人的示威队伍所包围。在全体国民的支持下，于六月四日举行了抗议大罢工，七十六个产业工会的四百六十万职工以及一百万学生、民主团体人士、中小企业家共五百六十万参加了这次斗争。

六月九日上午十一时，正当自民党不顾国民的反对，在参议院单独对“新安全条约”进行审议时，协会的顾问、自民党参议员、中国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委员长大谷莹润先生向自民党总裁岸信介提出了退党书说：“考虑到安全条约的内容将给日本民族的前途带来不安和危机，从一个政治家对子孙后代承担的义务出发，难以同意这一条约的成立。”大谷先生同时还向党内外发表了退党声明。协会支持大谷先生的行动，编印了号外，在国会内外广为散发。

六月十日，美国总统新闻秘书哈格蒂为了安排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日的日程到达日本，在通往羽田机场的公路上被“阻止美国总统访日”的示威队伍所包围，进退不得，只得改乘直升飞机逃脱，躲进了美国大使馆。

六月十五日举行的第二次实力行动，有一百一十一个产业工

^① 河野一郎（1898—1965），神奈川县人，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入朝日新闻社工作，后当选为国会议员。战后积极组织保守政党，曾任鸠山内阁的农林大臣、岸内阁的国务大臣兼经济企划厅长官，池田内阁的农林大臣兼建设大臣。河野派在自民党内是一个大派，河野死后，分为中曾根派和森派（即园田直派，后并入三木派）。河野的儿子河野洋平于一九七六年退出自民党，另组了新党“新自由俱乐部”。——译者注

会的五百八十万人参加，十万人的示威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在与警察的激烈冲突中，东京大学女生桦美智子被警察杀害。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六月十二日离开美国，开始了他的远东之行。他在前往日本的途中，怯于日本全体国民的怒吼声，不得不打断了访日的念头。毛泽东主席对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说：“桦美智子已成全世界闻名的日本民族英雄。”

六月二十一日，“新安全条约”逃避了人民的监视，偷偷地通过了批准手续而生效了。协会立即发表了《关于不承认安全条约的生效的声明》。许多人民团体都发表了不承认这个条约的声明。

在国民的一片斥责声中，岸内阁于七月十五日总辞职，池田内阁十八日上台。

协会从七月二十三日起，在东京千代田公会堂召开了为期三天的“纪念创建十周年、第十次跃进大会”。会上表扬了在协会的十年斗争中作过贡献的人们，表彰了已经去世的丰岛与志雄、内山完造等二十九人的功绩。《大会宣言》总结了我们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为反对“新日美安全条约”而掀起空前的斗争中所进行的活动；认为“日中友好运动由于十年活动的积累，特别是由于不断高涨的国民运动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已经迎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宣言》表示决心为创造能够适应新任务的主体条件而努力，迅速在国民中扩展日中友好运动，争取全面打开日中关系和实现邦交正常化。大会还通过了《争取废除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决议》。

社会党浅沼委员长遇刺逝世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二日，面临大选的前夕，公明选举联盟主持召开了三党首脑竞选演说会。时值反对“安全条约”的伟大斗争之后，外交政策自然成为政治论战的中心主题。社会党委员长浅沼

稻次郎在一九五九年三月所作的“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论断，一直成为尔后外交争论的中心，遭到美国的憎恨。在反对安全条约斗争的高潮中，浅沼委员长代表全体国民的意志，曾走访美国大使馆，要求取消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当时麦克阿瑟大使敲打着桌子，逼迫浅沼委员长收回“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讲话。浅沼先生挺立着高大的身躯反驳说，美国现在还非法地占领着冲绳和台湾，没有必要收回讲话。在八月的总评大会上，浅沼先生再一次重申了这一论断；在竞选演说中更是加以强调。

就是在这一天，挺立在日比谷公会堂讲坛上的浅沼委员长，用宏亮的声音压倒自民党和右翼分子的嘲骂和嚎叫，他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只有一个。尽快使日中邦交正常化是日本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池田内阁死抱着与台湾的条约不放，在联合国跟着美国后面跑，反对承认中国的代表权……。”

浅沼先生的话正讲到这里，突然一名右翼分子跳上讲坛，用利刃刺进了他的心脏。浅沼先生倒下了。

但是，指出“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浅沼精神，仍然继续成为争取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日中两国人民团结的口号。

（三）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

重开友好贸易

经过两年多日中两国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的斗争，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开始打开了日中友好的新局面。以下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自长崎国旗事件发生以后，对岸信介内阁敌视中国、制

造“两个中国”的政策表示抗议，没有一名中国代表访日，日中文化、友好交流完全变成了仅有少数日本人访华的状况。现在打破了这种状态。这年的八月，为出席第六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由十二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来到了日本。他们是相隔了两年半的时间从中国来的客人。中国代表团对我国国民掀起反对“新安全条约”的伟大国民运动作出高度的评价，认为“取得了重大胜利”，“为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的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支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日本政府一手签订“新安全条约”，但中国代表团更重视的是站在不承认和要求废除这一条约立场上的日本国民；对日本国民表示了高度的信任和友好。他们还根据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的立场，阐明了重开和发展日中友好交流的方针。

八月十六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日中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的联合声明》。九月十八日，日中友好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日中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和文化交流的共同声明》。这两项声明表明了要坚持上述的原则，打破这两年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停滞局面，展示了要大力开展交流的计划。

第二，是根据政治三原则、政经不可分的原则以及新提出的贸易三原则，把日中民间贸易作为新的“友好贸易”而重新开展。当时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应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廖承志的邀请访问中国，贸易三原则是周恩来总理在八月二十七日对铃木一雄表明的中国对日本贸易的方针。

贸易三原则的第一条：贸易协定必须是政府协定。这是因为鉴于所谓“累积”时代的惨痛教训，只有政府协定才能有保证，民间协定不能获得保证。因此中国方面再一次表明，不准备对民间协定给予支持。

周总理还指出：“政府协定，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才能签订。”并说明了只有在过去提出的政治三原则的前提下两国政府才能开始商谈。这就是说，前提是改变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两个中国”的政策和阻挠邦交正常化的政策。而这也可以理解为，在邦交正式恢复以前，也可以缔结这种政府间的贸易协定。

关于贸易三原则的第二条，周总理说，即使政府协定不能签订，但“条件成熟时”，日本的某个企业也可以和中国的某个公司签订民间合同。这里所说的“条件成熟”的意思，是说日本企业的态度要根据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离的原则，努力促进签订政府协定的条件趋于成熟。

贸易三原则的第三条，是个别照顾。这是为了满足在贸易中断后的一九五九年大量依靠中国原料的日本中小企业的愿望，由中国方面提供草帽辫、生漆、滑石、中药、中国宴席原料等，日本方面则出口农业机械、搬运机械和农药等作为回销。这种照顾贸易今后将继续下去。

周总理提出，日本方面的有关团体可以根据上述贸易三原则，“认为友好的、有可能作的、对双方都有利的生意，……可以同我国的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接洽。”

日中贸易界对于根据中国方面提出的贸易三原则重开的日中贸易表示衷心的欢迎。日中友好贸易是通过下列方式来进行的：表示支持政治三原则及以此三原则为基础的贸易三原则的日本企业，首先经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友好协会等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推荐，并获得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承认该企业为“友好企业”后，则由各该“友好企业”直接同中国各贸易公司联系，进行贸易商谈。友好贸易就是以这样的形式开始并逐年迅速地发展起来的。

“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的开始

“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之后，日本国内外形势进入了新阶段。围绕着日中关系所进行的友好与非友好的斗争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一九六一年一月，肯尼迪继艾森豪威尔为美国总统。四月，他任命有“日本通”之称的赖肖尔^①为驻日大使，策划重整因“反对安全条约斗争”而摇摇欲坠的“日美军事同盟”。美国采取的方针是，一方面利用所谓的肯尼迪—赖肖尔路线，吹捧“日本是亚洲的大国”，披着“和平”和“日美亲善”的伪装，开展所谓的“邀请外交”；另一方面则加强以日本为中心的“遏制中国”的核战略体制。

但是，在国民舆论的压力下，“如何解决中国问题”便不断地使政府及执政党内部发生动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虽然在一九六〇年的联合国大会上以四十二票对三十四票通过了美国的暂时搁置的提案，但弃权票多达二十二票，而且其中大部分是非洲国家的票，随时有可能转到反方面去；容许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大会上继续搁置下去的可能已经大大地动摇了。

肯尼迪总统于一九六一年六月邀请池田首相^②访问华盛顿。在池田离日之前，日中友好协会通过大平官房长官^③向他提出了公开质问信。质问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① 赖肖尔，一九一〇年出生于东京，美国哈佛大学毕业，曾任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司长助理、远东局长，哈佛大学远东语言文学系教授和燕京研究所所长，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六年任驻日大使，回国后任国务院亚洲太平洋问题咨询委员会主席和哈佛大学教授，著有《美国与日本》、《东亚：伟大的传统》、《东亚及其现代化》、《日本概况》等。——译者注。

② 池田勇人（1899—1965），广岛县人，京都大学毕业，曾任大藏省主计局长、事务次官、大藏大臣，一九六〇年组阁，任总理大臣。——译者注。

③ 大平正芳，一九一〇年出生于香川县，东京商业大学毕业，曾任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等。现为自民党干事长。——译者注。

“我们质问池田首相是否有意改正追随美国敌视中国政策的
态度；日本作为亚洲国家，是否坚持自己的中立立场，并在会谈中
要求肯尼迪总统同意：

“（1）美国应改变敌视中国的政策，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从台湾海域及中国的领土台湾撤除基地和撤回美军。

“（2）在今年秋季的联合国大会上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
谋活动，承认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的权利。

“（3）全面废除阻碍日中贸易的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巴黎统
筹委员会等非法的贸易限制。

“（4）废除以中国为主要假想敌国的‘新安全条约’。”

大平官房长官对协会代表说：“不管愿意与否，中国问题是不能
不提出来的问题。”并接受了质问信。

协会大量发行了《有两个中国吗？》的小册子，揭露“两个中国”
的阴谋，进一步把要求恢复邦交的舆论推向高涨。五月二十日晚，
反对安全条约国民会议在日比谷露天音乐堂主持召开了大会，出
席大会的人士有一万三千人。大会通过了“实现恢复日中邦交”、
“反对防止政治暴力行为法”等项决议。

可是，池田勇人首相通过一九六一年六月与肯尼迪会谈，却背
着一个“日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的大包袱回国。美国对日本经
济的干涉越来越露骨。由于美国大力推行“优先购买美国货”和
“优先使用美国船”的政策，迅速加剧了日本的经济危机，于是大垄
断企业中也出现了企图从日中贸易中寻求打开危机的动向。一九
六二年五月十一日，在政府主持召开的最高出口会议上，贸易、重
型机械、轻型机械、化学品、纤维品和有色金属六个部会向政府提出
了这样的要求：“要扩大与共产国家的贸易，就要促进缔结民间贸
易协定，把出口定期付款当作一般情况看待。”化学品部会还提出
了要求说：“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市场，应谋求对华贸易早日正常

化。”钢铁部会也要求“灵活运用定期付款的条件”。

就在这个时期，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决定再度访华。关于与中国方面商谈的基本内容，池田首相同意完全委托松村办理。在松村的随员中，特地加进了池田派的国会议员小川平二^①和池田首相的智囊、曾随松村第一次访华（一九五九年）的日本长期信用银行专务董事田林政吉。随员中还有松村派的古井喜实^②、藤井胜志^③、田川诚一^④三位议员和大久保任晴（高碓达之助的秘书）。松村一行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二日启程访华，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多次会谈，以“共同发表关于松村、周会谈备忘录”^⑤的方式铺设了“廖承志—高碓达之助贸易”的轨道，于九月二十五日归国。

遵循松村谦三所铺设的这条轨道，高碓达之助先生^⑥于十月

① 小川平二，一九一〇年出生于东京，东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众议院议员，曾任劳动大臣、内阁官房副长官、众议院大藏委员长、自民党副干事长和税制调查会长等职。——译者注

② 古井喜实，一九〇三年出生于鸟取县，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多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曾任内务省次官和厚生大臣等，对我国态度友好。——译者注

③ 藤井胜志，一九一五年出生于冈山县，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多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曾任大藏省和通产省政务次官、自民党政调会副会长等。——译者注

④ 田川诚一，一九一八年出生于神奈川县，庆应大学法律系毕业，多次当选众议院议员，曾任科学技术厅和厚生省政务次官、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副会长等。一九七六年脱离自民党，另组新党“新自由俱乐部”。对我国态度友好。——译者注

⑤ 田川诚一著《日中谈判秘话》详细叙述了几经流传的松村与周会谈的秘话，反映了当时日中间微妙的政治形势。另，《共同发表关于松村、周会谈备忘录》如下：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同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先生于十六日、十七日、十九日三天，进行了友好、坦率的会谈。

“中国方面重申坚持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并且认为这些原则继续有效。

“双方表示进一步促进和发展贸易的愿望。

“双方一致认为，应该采取渐进的和累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原注

⑥ 高碓达之助（1885—1964），大阪人，水产讲习所毕业，战后曾任经济企划厅长官、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农林大臣等，参加过万隆会议，积极从事日中贸易活动。——译者注

二十八日偕同自民党的竹山祐太郎、野田武夫、松本俊一以及全日本空运公司经理冈崎嘉平太^①等实业界的代表访问了中国。十一月九日，高碓达之助和廖承志签订了关于日中贸易的《备忘录》^②。

随同高碓一起访华的实业界的代表，根据上述廖—高碓的《备忘录》，决定了各个行业与中国贸易的计划。凡根据这个备忘录所进行的贸易，均采用廖承志、高碓两位先生的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也称为“L·T贸易”。它与以前的友好贸易相辅相成，承担起促进日中贸易的任务。“廖—高碓贸易”中成套设备的交易，一开始就包括使用定期付款方式，并包括需要政府承认的事项。因此，“廖—高碓贸易”的成功与否，也是测量能否向政府协定和邦交正常化前进的标志。

盼望中的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

日本的友好团体多年来盼望中国方面成立与日本进行友好交流的专门机构——“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以大力开展友好交流活

^① 冈崎嘉平太，一八九七年出生于冈山县，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池贝铁工、丸善石油等公司的经理，现为日中经济协会常任理事，长期从事日中贸易和日中友好活动。——译者注

^② 《备忘录》内容如下：

高碓达之助先生和廖承志先生根据一九六二年九月周恩来总理和松村谦三先生关于扩大日中贸易的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的、积累的方式，为进一步发展两国的民间贸易，交换备忘录如下：

(一) 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作为第一个五年贸易安排，要求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约为三千六百万英镑。

(二) 双方出口的主要商品如下：

中国方面出口商品：煤、铁砂、大豆、玉米、杂豆、盐、锡、其他商品；

日本方面出口商品：钢材(包括特殊钢材)、化学肥料、农药、农业机械和农具、成套设备、其他商品。

(三) 根据本备忘录所进行的各项交易，由有关该交易的日本方面当事人同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个别合同。

(四)至(十一)省略。——原注

动。当时中国以特定国家为对象，同已经建交的国家之间建立了友好协会的有：中苏友好协会、中印友好协会、中缅友好协会、中国印度尼西亚友好协会等。与未恢复邦交国家之间的民间交流，政治关系方面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承担，文化关系方面则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承担。日本方面了解这种情况，但仍然不断地向中国方面转达“要求早日建立中日友好协会”的希望。负责对日关系的廖承志等先生非常体谅这一诚恳的希望，鼓励日本方面说：“把友好活动积累下去，一定很快就能建立”。

“反对安全条约斗争”以后的日中关系，在经济交流方面，根据贸易三原则，打开了友好贸易和“廖—高碕贸易”的道路。但问题是在于能否克服美国的干涉，扩大友好的渠道。

那么，“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后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是怎样开展的呢？

日本于一九六〇年六月派出了第一次访华围棋代表团（团长濑越宪作、九段），第二年一九六一年又派出了第二次代表团（团长坂田荣男、九段）。同年六月迎来了第一次中国围棋代表团（团长是中国体育总会副主席李梦华）。从此，围棋交流几乎每年都进行，深受广大围棋爱好者的欢迎。

一九六一年四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比赛中，日本队和中国队的交锋，引起人们极大的注意，由于北京电台对日广播组织了特别节目，使得日本的听众急剧增加。另外，《人民中国》杂志在这个时期也增加了新的读者。

一九六一年八月，协会自创建以来首次采用代表制，召开了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从全国一万六千名会员、一百二十七个单位的各级组织中选出的二百七十七名代表，在“粉碎‘两个中国’的阴谋、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让友好的旗帜到处飘扬”等口号下，提出了把会员发展到三万人、将组织扩大一倍的方

针。

同年八月，协会派出了首次地方自治体首长友好代表团（团长是福冈县的鹤崎知事）。以后每年又继续派出了第二次、第三次这样的代表团。同年协会参加庆祝中国国庆节的代表团（团长黑田寿男^①），十月七日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在谈话时说：“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毛主席还亲笔写了鲁迅的“万家墨面没蒿莱”的诗，赠送给代表团。

同年十一月，在友好月活动最后高潮中举办的中国电影节期间，协会还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一起，邀请“中国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是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来日本访问，举行了热烈的欢迎活动。

但是，日本政府仍然与日中友好这一全民性的潮流背道而驰，大搞反华活动。在同年十二月联合国大会上，采取多数表决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合国代表权的形势更趋成熟，而日本政府却与美国等勾结在一起，充当了把中国代表权问题指定为需要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的重要事项的提案国之一，大肆进行阻挠破坏活动。协会总部发表了书面声明，对此进行了强烈的谴责。

另一方面，首创对中国实行定期付款的“廖—高碕贸易”，是一个有日本政府为背景的协定。美国政府对此也横加干涉进行破坏。早在一九六二年五月，日本政府主持的“最高出口会议”提出希望定期付款适用于日中贸易时，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在会见记者时就发表谈话说：“扩大日中贸易是令人不愉快的”。在“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备忘录签订后的十二月三日，在华盛顿召开的日

^① 黑田寿男，一八九九年出生于冈山县，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律师出身，前众议院议员，现为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会长，长期从事日中友好活动。——译者注

美贸易经济联合委员会上，肯尼迪总统亲自要求“日本积极协助遏制中国政策”。十二月十一日，副国务卿哈里曼再次发表谈话说，“对中国实行定期付款是令人不愉快的”，从而公然干涉内政。美国还向日本的钢铁业、化肥业施加了种种压力。

对此，促进日中贸易界于六月一日召开了由东西方贸易^①五团体共同主持的“突破经济危机、促进东西方贸易全国企业家大会”。大会发表了声明，抗议哈里曼的发言“干涉内政太甚”；同时还通过了迅速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缔结政府贸易协定、解散巴黎统筹委员会、实施定期付款等决议。此外，在“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备忘录签字后的十一月，在东京、大阪、福冈、名古屋举行了“打开日中关系、促进贸易全国企业家大会”，做出了“全面支持‘廖—高碕贸易’”、“排除外国对日中贸易的非法干涉”等的决议。

在这样的形势下，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宿谷荣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关西总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访问了中国，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签订了《关于扩大日中贸易的议定书》。

“廖—高碕贸易”在美国的干涉下归于失败、或者冲破干涉获得成功，则取决于政府批准不批准对中国首次出口成套设备的商业谈判——仓敷人造丝公司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总额七十三亿五千八百万日元），由进出口银行贷款分期偿付。这也是考验日本外交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前进一步、或者继续从属于美国的试金石。

第二年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团长平塚常次郎会见了周恩来总理，要求再次缔结一九五八年以来

^① 泛指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这里主要指日中贸易。——译者注

中断了的日中民间渔业协定。周总理回答说，“这需要看日本政府对‘廖一高碕贸易’的态度来考虑”。一般认为，关于我们协会等组织一直希望成立“中日友好协会”的要求，也存在相似的情况。

西欧各国利用长期的定期付款办法向中国销售维尼纶成套设备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日本方面如果不根据商业上同意五年以上长期定期付款办法的惯例，交易很快就会被西欧抢去。而自民党内的台湾帮、美国政府和蒋帮借口这是金额超过两千万美元的大宗交易，疯狂进行反对活动。但是，在日中友好和扩大日中贸易的舆论的压力下，日本政府终于不得不在八月二十日正式批准。

中国方面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于是期待中的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简称中日友好协会），由中国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等十九个团体发起，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在北京的政协礼堂召开了盛大的成立大会。以陈毅副总理为首的中国各界的许多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日本方面参加大会的有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以及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工会、青年、妇女、贸易、文化、艺术、科学、新闻、宗教等各方面的代表团。常驻北京的西园寺公一先生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大会首先由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致开幕词，接着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和会长廖承志致词。日本方面由石桥湛山、铃木一雄、宫崎世民和西园寺公一等人致贺词。接着宣布了中日友好协会的一百二十名理事和二十八名常任理事的名单，大会还公布了日本方面发来的一百二十多封贺电，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给日本的日中友好协会的感谢电（参看196页）。

《人民日报》十月五日发表了社论《中日友好的里程碑》，认为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是日中两国关系史中的一件大事，深信中日友好协会今后工作的开展，定将为促进两国友好运动的发展和加

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作出重大的贡献。

另外，在渔业协定中断了五年之后，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团长为日俄渔业公司常务董事江口次作）和中国渔业协会代表团（团长为中国渔业协会会长杨煜）于十一月九日签订了《关于东海、黄海的渔业协定》。这也是向邦交正常化和签订政府协定迈出的新的一步。

第四章 恢复日中邦交的实现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

(一) “中苏论战”公开化

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风暴中，“中苏论战”从一九六三年（昭和三十八年）开始公开化了。这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公开对苏联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六月十四日，协会为欢迎来访的中国外文出版社代表团一行十五人，在东京的九段会馆举行了有一千一百名读者参加的“庆祝《人民中国》创刊十周年大会”。此后，四十五天内，外文出版社代表团在全国各城市同读者进行了联欢。

《北京周报》日文版也从七月一日开始创刊。它驳斥苏联一贯利用塔斯社及其它机构进行单方面的反华宣传，使人们逐渐了解中国的立场和主张，逐渐把长期为人们所不知道的苏联许许多多大国主义的恶劣做法告诉了日本国民。

一九五九年（昭和三十四年）至一九六〇年，当日中两国人民隔海遥相呼应，进行反对美国的战争政策和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的斗争的时候，以赫鲁晓夫总理为头子的苏联领导集团却不断地进行叛卖活动。赫鲁晓夫总理为了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平共处”，于一九五九年九月访问了美国，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准备了三份见面礼。其一是废除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有关原子能的技术；其二是面对一九五九年

八月份发生的中印边界纠纷(由三月开始的西藏农奴主的叛乱引起的),间接支持印度反动派;其三是在台湾问题上,向中美双方强行兜售“两个中国”政策。关于最后的“两个中国”问题,是赫鲁晓夫总理在访美回国途中参加中国建国十周年国庆典礼时,向中国方面提出的。

赫鲁晓夫总理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家长”自居,在东欧也同样挥舞大国主义的指挥棒,但也和在中国一样,遭到阿尔巴尼亚的严厉拒绝。一九六〇年四月,中国共产党通过《列宁主义万岁》一文对苏联的这些行径进行了批判。赫鲁晓夫总理立即采取报复行动,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突然通知中国政府,要在一个月內撤走在中国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从而破坏了已经签订的几百个技术援助合同,另外还废除了多达二百五十七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正是中国遭受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期,有些水力发电站和重工业建设正进行一半,苏联就撤走了全部技术人员,甚至连图纸也带走了。苏联采取这些措施加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这是不难想象的。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力更生”的号召,咬紧牙关,战胜困难,丝毫没有向外国人透露这些情况,直到一九六三年“中苏论战”公开化之前,许多日本访华人士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出席一九六三年八月第九次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在大会上尖锐地揭露苏联同美国勾结并伙同英国于当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完全是个大骗局;指出这个条约对美国的核战争准备、核讹诈政策毫无约束力,实质上是维护超级大国用核垄断来统治世界的;并提出了全面禁止核武器的主张。协会方面有八百名会员参加了这次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揭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欺骗性。周恩来总理给大会发来了贺电,表

示中国坚决站在日本人民一边，支持全面禁止核武器。大会决议要采取反对美国核潜艇停泊日本港口等争取全面禁止核武器的各项行动。

同年十一月七日，以协会的全国组织为核心，六十三个中央团体采取统一行动，召开了“反对‘遏制中国’、要求立即实现恢复日中邦交全国集会”，一千名代表汇集在东京千代田公会堂，通过了以实现恢复邦交为中心的五项决议。当晚还举行了提灯游行。北京方面，由成立不久的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发来了热烈的兄弟般的贺电。十一月十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对这次集会给予高度的评价。

一九六四年的事件

第二年——一九六四年的日中关系，可以说是从一天之中所发生的两个历史性事件开始的。一月二十七日，中国宣布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给全世界、尤其是我国带来了很大的震动。同一天，毛主席在北京接见了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铃木一雄和理事西园寺公一等人，并发表了谈话。在这前一天——一月二十六日，日本人民在全国四十个地方动员了一百万人举行了反对美军基地的示威游行。毛主席在谈话中称赞这次示威游行是“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并指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一直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它是绝不会让美帝国主义长期骑在自己头上的。”

协会与其他友好团体共同倡导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恢复日中邦交的国民运动，松本会长等二十五名各界代表人士向国民发出了

号召。号召的要点有下列三项：（1）立即恢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扩大贸易、经济、文化的交流。（2）废除日台条约，结束同台湾的不正常关系。（3）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而努力。

为响应这一号召，在全国掀起了踊跃支持号召的签名运动。

这一年在日本举办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取得了巨大成果，东京（四月十日——三十日）的参观者达八十一万人，大阪（六月十三日——七月五日）达一百五十二万人。

四月十九日廖承志、松村谦三备忘录在北京签字，实现了第三次“廖—高碕贸易”、日中互换记者和互设贸易联络办事处。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孙平化等人于八月十三日来到日本。九月二十九日，日中双方互换记者。

同年十月十六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并于当天发表了长篇声明，明确表示：其目的是为了自卫；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的目的是为了打破大国的核垄断，消灭核武器（参阅 199 页）。

中国的核试验在我国引起了纷纷议论，不少人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抗议电。协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慎重的讨论，于二十七日发表声明，认为中国进行核试验的立场是可以理解的（参阅 201 页）。

佐藤内阁上台

一九六四年（昭和三十九年）十一月，池田内阁下台，佐藤荣作内阁继之上台。

一九六五年新年后不久，佐藤首相^①就匆忙去访问美国。一

^① 佐藤荣作（1901—1975），山口县人，岸信介之弟，东京大学毕业，曾任吉田内阁的官房长官、邮政大臣、建设大臣，池田内阁的通产大臣等，一九六四年组阁，至一九七二年共任八年首相，为战后最长的内阁。——译者注

月十三日同美国总统约翰逊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支持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诽谤中国威胁亚洲和平，露骨地推行加强美、日、韩、台军事同盟以“遏制中国”的战略。二月七日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升级决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佐藤政府已允许美国核潜艇在日本港口“停泊”，提供登陆艇船员等实际战斗人员，并允许美军使用包括冲绳在内的日本基地作为侵略越南的前线基地。同时还向美军供给凝固汽油弹等各种弹药以及化学毒气、喷气机燃料、卡车、吉普车、履带式挖土机、铁丝网、水泥、农药、医药、通讯器材、丛林用的防护鞋、伪装用的军服、砂袋等大量军需物资。

另一方面，佐藤内阁为了维护日台关系，以“吉田书简”^①为借口，阻挠日纺公司继仓敷人造丝公司之后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总额约一百亿日元）和日立造船公司首次卖给中国货轮，并把即将签订的合同搞垮；相反却贷给台湾一亿五千万美元。

此外，佐藤荣作和南朝鲜又在六月份签订了“日韩基本条约”^②，并于十一月在国会强行通过。

同年二月十日，在国会上揭露了防卫厅的“三矢研究”^③，引起了一场大争论。佐藤内阁上述一系列政策说明了这个“三矢研究”绝不单纯是纸上的作战计划。它是在美军指挥下，日美联合与朝鲜、中国、苏联交战的作战计划；是日本自卫队为牵制中国而进行

① 在一九六四年五月池田内阁时代，前首相吉田茂曾致函蒋介石，保证“今年内进出口银行不给日纺公司的维尼纶成套设备贷款”。——原注

② 日本与南朝鲜朴正熙集团之间所签订的这个条约，因遭到日朝两国人民的反对，从一九五一年十月开始预备性谈判到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生效，费时达十四年之久。——译者注

③ 又名“三矢作战计划”。一九六三年日本防卫厅和驻日美军共同制订的“日美共同作战体制”，以朝鲜和我国为主要作战目标，并制订了一系列战时法令。——译者注

台湾作战，并配合美军出兵北朝鲜、库页岛、千岛的计划。

六月二十六日，中国政府在“日韩基本条约”正式签字时发表了声明，表示绝对不能承认这个条约。另外，还针对日本国会强行通过该条约（十一月十六日），发表了中国政府声明和中国十四个人人民团体的共同声明。这些声明指出，这个条约的缔结过程“是佐藤内阁加快复活军国主义的严重步骤”，“是美帝国主义勾结日本反动派，在亚洲扩大侵略战争的严重步骤”，强烈谴责“日韩条约”是针对朝鲜、中国和亚洲各国的侵略性的军事条约。

（二） 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

五百名日本青年访华违反国家利益吗？

在与坚决反华的佐藤内阁的“遏制中国”政策进行斗争的同时，在一九六五年一年中，日本有一百八十五个团体、三千八百人访问了中国，并接待了中国的五十五个团体、三百九十七人的访日代表团。在这种友好交流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

对于佐藤、约翰逊联合声明中妄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和依靠美、日、韩、台军事同盟向朝鲜、中国、亚洲发动侵略战争的计划来说，日中两国青年的友好和团结是它们的最大障碍。

中日友好协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三个团体向协会发来邀请，希望派遣协会本身的青年代表团和通过协会组织，选拔北海道、东北^①、关东^②、东京、北陆^③、东海、关西^④、

① 指本州东北部青森、岩手、宫城、秋田、山形、福岛六县。——译者注

② 古代京都以东地方的泛称，一般指东京都和茨城、栃木、群马、埼玉、千叶、神奈川六县。——译者注

③ 指日本中部面临日本海的新泻、富山、石川、福井四县。——译者注

④ 一般指京都、大阪、滋贺、兵库、奈良、和歌山六个府县。——译者注

中国①、四国②、九州③等地方的各界青年组成访华代表团。这一邀请是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到达的。各个青年团体以及工会等民主团体的青年组织也同时收到了要求它们派遣代表团的邀请书。其总数达四十一个团体、五百人。

这次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中国准备邀请日本各界青年，由北京开始，在全国十五个城市组织音乐、戏剧、体育友好比赛，参观旅行，以及游览名胜古迹等丰富多采的活动，以加深同中国各界青年之间的友谊。我们获悉中国从六月中旬就在各地进行了具体的准备工作，尤其是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工艺美术学校的学生为纪念青年友好大联欢，准备了石膏像、纪念章和锦旗等。另外还准备发行一套五张的大联欢纪念邮票。文艺界加紧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业余体育爱好者也在努力练习，大家都在兴奋地期待着同日本朋友见面。另外，还传来消息说，为祝贺这次大联欢，中日友好协会的名誉会长郭沫若写了热情洋溢的诗篇，八十七岁的何香凝女士（廖承志之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也作画对大联欢表示祝贺；此外，歌唱大联欢的歌曲也写好了。

在中国举办的青年友好大联欢预定从八月二十一日开始，进行一个月。应邀的各个青年团体为了能如期到达，乃履行合法手续，向政府申请发给出国护照。外务省勉强给二十四四个团体二百八十一人签发了护照，八月十八日突然宣布签发护照到此截止，据说其理由是担心五百名青年访华会违反国家利益，有害治安。

被非法拒发护照的十五个团体共一百九十二名青年代表，连

① 指本州西南端地区，辖有鸟取、岛根、冈山、广岛、山口五个县。——译者注

② 构成日本列岛的四大岛中最小的岛，位于本州的西南，分香川、德岛、高知、爱媛四个县。——译者注

③ 位于日本列岛的西端，分福冈、佐贺、长崎、熊本、大分、宫崎、鹿儿岛、冲绳八个县。——译者注

日涌到外务省、法务省、首相官邸进行抗议，坚持要求发给护照。八月二十五日，请愿的代表团被外务省调来的一百五十名警察机动队^①所包围，并横遭殴打，不少人负了重伤或轻伤。八月二十六日晚，派出青年代表的各个团体，在九段会馆举行了“抗议政府拒发护照，阻挠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青年大会”。争取护照斗争进入了持久战，经过三个月大斗争的结果，全体获得了护照，出发时已经是十一月了。

毛主席接见日本青年

一九六五年度的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分别从八月和十一月开始，两批进行。日本青年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极为感动。大联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一批日本青年于八月二十三日乘专车到达北京站，受到两千名中国青年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欢迎。二十五日出席了有北京各界青年一万人参加的大会，二十六日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以后分为三路，继续进行有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的联欢旅行：第一路（东北），经沈阳、鞍山、北戴河、南京到上海。第二路（西北），经西安、延安、洛阳、无锡到上海。第三路（南方），经武汉、长沙、南昌、庐山、杭州到上海。

最后，三路在上海汇合，受到万名上海青年的欢迎，在中国度过了最后的令人激动的一周。九月十二日，在上海市长主持的晚宴上，从北京赶来的廖承志致词说：“我以两条理由提请大家干杯：第一，现在在座的有三百多名日本青年代表，但在东京还有一百九十人，只要他们能取得护照，我们随时准备欢迎；第二，这次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希望今后能举行更大规模的大

^① 日本警察的一种，专门用于有关所谓治安事件的大规模警备任务，特别是镇压群众运动。——译者注

联欢。现在让我们干杯！”他的讲话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十四日，在上海有名的南京路上，日中青年在十万上海市民的欢呼声中举行了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举着“日中青年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横幅标语前进。廖承志头上缠着书写“阻止美国核潜艇停泊日本港口”的头巾，和西园寺公一并肩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沿途十万人高呼“支持日本人民粉碎日韩条约的斗争！”等口号，声援游行队伍。

十五日下午七点开始，在上海市的文化广场举行了欢送大会。廖承志在会上讲话指出：“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举行，在中日两国人民生活中不是一件小事情，而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大联欢的成功，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胜利。中日友好事业要靠两国青年去继承、巩固和发展。这次大联欢是一个好的开始。让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我们的友好团结面前丧魂落魄吧！”

接着，上海市的青年代表和日本代表团的代表都讲了话。每当讲话结束，用日中两国语言高呼的“日中友好万岁！”等口号响彻云霄。

十一月出发的第二批代表也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受到和第一批同样热烈的欢迎。十一月十五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日本反对批准日韩条约的斗争的同时，用了半个版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日本访华青年争取护照的“八十天斗争纪实”，指出“中日两国青年和人民的友谊，是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的”。

协会于这年九月在东京召开了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会员人数已达五万人。中日友好协会首次派出的代表团四名代表（团长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暨南大学校长杨康华）来到日本，参加了三天的大会，会后对协会的地方组织进行了大约四周时间的友好访问，受到热烈的欢迎。

(三) “日共”堕落为反华集团与协会 改组为协会(正统)

第二次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遭到破坏

一九六六年春，“日本共产党”领导集团指令有关机关，抵制上映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的纪录影片《团结就是力量》和中国革命史诗剧影片《东方红》。随后，又指令全国各级机关，禁止订阅和普及中国发行的《北京周报》、《人民中国》和《中国画报》三种日文版杂志。此外还禁止机关报《赤旗》刊登北京电台对日广播的节目表。另一方面则向党内外大肆散布什么“毛泽东患了脑软化症”、“中共不是马列主义的党，已经变成了毛泽东一派的独裁工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发疯”等等造谣污蔑，煽动不友好的情绪。

苏联的赫鲁晓夫已经在一九六四年十月下台，但苏联领导集团依然继续执行超级大国主义的路线——即所谓“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中苏论战”公开化越来越明显，截至赫鲁晓夫被撤职为止，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九篇批判其路线错误的文章。

在中国国内，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一场在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下，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反对追随赫鲁晓夫走现代修正主义道路的领导人而开展的斗、批、改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日共”领导集团对于毛泽东主席所领导的对苏共领导集团错误的批判和在中国国内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尽污蔑和攻击之能事，他们极其害怕和阻挠破坏同中国的交流。

为此，他们首先拒绝一九六六年度的第二次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竭力阻挠中国的访日代表团入境。其方法，一方面散布中国代表团来日将要干涉内政；另一方面则秘密指示各团体内的“日

共”党员，从接待团体内部反对履行外务省要求的入境事务手续——填写保证书，保证（中国代表团）“在日本逗留期间不进行入境目的以外的干涉内政活动”。执行这些指示最忠实的是其干部百分之百为“共产党员”的民主青年同盟^①（以下略称“民青”）。

这年五月至六月期间，中国有两个青年代表团接到访日邀请。一个是日本青年团体协议会接待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文迟）。这个团于六月二十五日入境。另一个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钱大卫）是应“欢迎中国青年代表团实行委员会”邀请的。而这个委员会是由曾派代表参加第一次青年友好大联欢（民青也参加了）的主要团体组成的。由于民青秉承日共中央的旨意，顽固反对填写入境手续的保证书，致使钱大卫代表团在香港等待了五十天，仍未获得入境签证，不得已只好返回北京。社会党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简称“社青同”）发觉这件事，再次单独向钱大卫代表团发出了邀请电。这次很简单就入了境。

禁止原子弹氢弹日本协议会^②邀请的中国代表团的入境遭到拒绝，同样也是由于内部的“日共”党员进行阻挠破坏造成的。

关于第二次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日本于六月份收到了邀请书。“民青”于七月八日宣布绝拒参加。在七月十七日召开的日中友好协会第十一次常任理事会上，由“民青”选出的常任理事带头，一部分盲目追随“日共”中央领导集团的常任理事主张拒绝参加，但遭到绝大多数常任理事的反驳，会议决定组织代表团。“日共”

^① 其前身为一九二三年成立的日本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一九四六年改名日本青年共产同盟，一九五一年改称日本民主青年团，一九五六年改为现名，现为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译者注

^② 简称“原水协”，一九五六年成立，原为日本民主力量开展救济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者和禁止核武器的统一组织，每年举行有各国代表参加的世界大会，后来民社党、社会党和总评的势力分化出去，现为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译者注

干部会^①发出指示，要自下而上地来推翻协会的这个决定。在八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历时两天的日中友好协会第十二次常任理事会上，“日共”盲从派拼命要推翻派遣访华代表团的方针，但常任理事会以绝对多数粉碎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决心要促进青年友好大联欢。

尽管“日共”采取恶劣的手法进行阻挠，仍然推选出了六百七十名青年代表。他们申请发给护照，要求参加以十月一日国庆节活动为中心的第二次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日本政府在正常的状况下都不会发给护照的，而“日共”的反对则更加助长了它的反动气焰。佐藤内阁在九月二十日的内阁会议上做出了全面否定出国申请的决定。青年代表团虽然顽强地开展了要求发给护照的斗争，但由于“日共”的背叛行为，以致第二次青年大联欢终于未能实现。

同破坏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的行为作斗争

日中之间早就议定一九六六年秋季要在北九州市和名古屋市举行中国主办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一九六二年“议定书”及一九六四年“协议书”）。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该协会关西总部和日中贸易促进会三个团体，在日中友好协会及当地组织的协助下，从一九六五年就着手为此进行准备，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正式成立了“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全国协力会”（会长川濑一贯）。

但是，“日共”中央领导集团向这些贸易团体及举办地福岡、名古屋的协会县组织内的党员发出指示，说中国展览会可能会变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场所，因此对宣传和动员工作要消极怠工，特别是对现场发售纪念品，要强调“日本方面的自主性”，缩小其规模，

^① 日共宫本修正主义集团的政治局。——译者注

对毛泽东主席的著作等中国的出版物，要一概拒绝办理，等等。

八月十一日，中国展览团张子泉秘书长作为先遣队来到日本。他视察现场后，大为吃惊，已经临近开幕，却连一张宣传画、一份广告也没准备；不仅准备工作几乎没有进行，协力会事务局还要缩小现场发售纪念品的规模，不出售任何出版物；这完全是按“日共”的不友好方针行事。张子泉先生向全国协力会川濑会长提出要求，八月二十九日同协力会全国理事会举行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人了解到真实情况，连日本方面的协力会也为这种事态感到忧虑。于是召开紧急理事会，解除了照“日共”指示行事的事务局长等人的职务^①。

在北九州、名古屋也不得不采取同样的紧急措施，排除“日共”的阻挠和破坏。一些“日共”分子打着日中友好协会福冈县联合会的旗号，窃据中国展览会西日本协力会的职位，对一切宣传和动员准备都消极怠工。在展览会开幕前一周终于把这些人排除出去。

“日共”分子的这些阻挠和破坏，反而使广大希望日中友好的各界人士振奋起来。日本各界的三十二位著名人士发表了呼吁书《面临国内外危机，为促进日中友好再告国民书》（参阅 203 页），指出“我们运动内部产生了一种倾向，在各种借口下，极力阻碍友好交流的发展”，谴责这种倾向“使美日反动势力高兴，为他们的反华政策帮忙”。北九州会场在同“日共”反华分子及与其相呼应的右翼暴力团^②的激烈斗争中，于十月一日开幕。来自日本全国的各界代表和当地代表共五千人参加了开幕式，在二十一天的会期中，参观群众达一百五十五万八千五百一十七人，真是盛况空前。名古屋会场也是如此，在同“日共”反华分子及右翼暴力团的激烈斗争中，

① 以后于十月二十六日召开了紧急会员大会，认为日中贸易促进会已变为反华团体，没有存在的必要，决议将其解散。——原注

② 军国主义分子所组织、控制的流氓打手集团。——译者注

于十一月十九日开幕。截至十二月十一日闭幕为止，二十三天内共接待了二百一十六万九千三百六十五名观众，取得了巨大成功。

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的旗帜下前进

日中友好协会派出了代表团，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国庆节。在中国，以郭沫若先生为首的五十二名各界代表发表了声明，支持日本的三十二位人士的声明。十月十二日，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表了共同声明（参阅206页）。

在共同声明中，双方围绕日中关系的形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指出两国人民的安全和亚洲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中两国之间的关系；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中友好运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因而：

一、双方一致指出，日中友好交流一向是根据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相互支援的立场上进行的，并且今后也将如此；对日中友好交流的各种诬蔑和诽谤都是毫无根据的，都不过是为了从内部来破坏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

二、双方认为，目前日本国内形形色色的力量正在或明或暗地破坏日中友好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各界三十二位知名人士的声明以及五十二位中国各界人士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声明的发表，具有重要的意义。双方强调日中两国人民必须齐心协力，排除万难，使日中友好运动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展开，大踏步前进。

十月二十五日，日中友好协会以批准日中共同声明为中心议题，召开了第十三次常任理事会。受“日共”中央操纵的分子企图拒绝承认这个共同声明，顽固地阻挠和破坏会议的进行。表决的结果，共同声明以四十三票对十三票获得通过。但“日共”派不承认

这个表决，致使会场发生混乱，不可收拾。因此，除十三个反对派外，全体常任理事决定同“日共”派反华分子决裂，于次日十月二十六日树立起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下，发表了声明，表示要“恢复协会本来面目，把各界各阶层广大国民要求日中友好的愿望作为基础，以日中共同声明为支柱，大力发展友好运动。”并开始着手从全国组织中清除反华分子，进行改组工作。

中日友好协会立即打来电报，支持这些行动，并说：“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同打着‘友好’旗帜、反对友好的……分子断绝一切来往，彻底地撕破他们的假面具。”（参阅第210页）

我协会自创立以来，“日本共产党”对我协会和日中友好运动的发展，曾作过不少贡献。这在历史上应当给予正确的评价。但是应当说，自一九六六年以来，“日共”领导集团公开站到反华的立场上，对我协会和日中友好运动不断地进行破坏。这清楚地说明了“日本共产党”已经蜕化变质。

（四） 同来自四方面的破坏作斗争

善邻学生会馆事件等

一九六七年，史无前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势如暴风骤雨，继续向前发展。在美国、苏联、“日共”和日本反动势力四个方面的“反华大合唱”中，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毫不畏惧，在日中友好的道路上前进。

从日中友好运动中被清除出去的“日共”反华分子，从“日共”中央那里接受了“打着友好的旗帜，反对友好”的使命，在善邻学生会馆的旧事务所挂起“日中友好协会”的招牌，诬蔑、诽谤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假“日中友好运动”。善邻学生会馆是中国人

的学生宿舍,用于日中友好事业,所以宿舍里的中国学生对此提出抗议,要求他们从会馆滚出去,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他们却按照“日共”中央的指示,动员了大批的“民青”分子,反而袭击殴打中国学生,造成重伤、轻伤多人。这就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发生的“善邻学生会馆事件”。协会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团体的协助下,为使中国学生不致遭受“日共”的暴力袭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向善邻学生会馆布署了支援人员^①;同时,还针对“日共”利用其机关报等把这次事件污蔑为所谓的“中共的暴力事件”,发行了大量的《日本与中国》号外和小册子,广泛地诉诸舆论。

协会在“(正统)”的旗帜下,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召开了第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中日友好协会应协会的邀请,准备派代表团出席这次大会,但是佐藤内阁制造借口,说代表团内有“红卫兵”,不发签证,因而未能实现。

这年七月七日是“七·七芦沟桥事件”三十周年纪念日。协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等各界共同发起,组织了以日本各界八十五位人士为委员的纪念实行委员会,发表了八十五位人士联名的呼吁书,号召“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促进日中邦交正常化”,并在全国组织了纪念活动。以后每年都把“七·七”作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争取恢复日中邦交的纪念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组织纪念活动。

八月,佐藤内阁宣布佐藤首相将访问台湾的蒋介石和南越。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抗议不准出售天津科学仪器展品企业家大会”,八月二十九日召开“全国友好商社阻止佐藤访问台湾、南越动员大会”,并举行了汽车游行。九月七日,协会动员了大批会员和工作人员,在羽田机场举行了“阻止佐藤访台”

^① 最后“日共”从会馆当局拿了一笔钱,让伪“日中友好协会”迁出了善邻会馆。——原注

的静坐示威。参加静坐斗争的有黑田会长和宫崎理事长，以及身穿黑色法衣、年逾七旬的西川景文法师^①和大河内隆弘法师。次日（九月八日），由于右翼暴力团袭击惠比寿^②的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我协会的会员等都前去保卫。十月四日，我协会同许多团体一起，参加了“阻止佐藤首相访问南越、反对参加美帝的侵略战争、反对破坏国民生活、反对全面破坏日中关系和日中贸易、打倒佐藤内阁国民大会”。

十月，中国东方红杂技团应协会邀请来日演出。“日共”宫本反华集团同警察当局勾结，破坏在各地的演出，在北海道甚至发生了逮捕对此进行抗议的爱国华侨干部的事件。但是，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到十二月为止，杂技团在二十二个城市、四十五个会场举行了盛大的演出，向十万观众介绍了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中送来的中国传统的杂技艺术，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十一月十四日，佐藤首相为了伙同美国总统约翰逊加速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策划反华和侵略亚洲，访问了美国。当天，协会和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在羽田机场大楼共同举行了抗议集会。十月十七日台湾的蒋经国来到日本时，协会与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从事日中友好的有关团体在羽田机场共同召开了抗议集会。

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佐藤内阁动员了警察力量，突然对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及其关西总部等进行了非法搜查。佐藤内阁还指控协会的常任理事坂田辉昭和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总部的山本庄八是十一月十四日羽田抗议集会的指挥者，把他们逮捕，并搜查了他们的住宅。中国的中日友好协会和

① 西川景文(1893—1973)，宗教家；担任过日中友好宗教家恳话会会长、日中友好协会顾问。一九五五年前后，曾协助送还抗日战争中被日寇掳劫到日本去的华工死难者遗骨的工作。生前曾两次访问我国。——译者注

② 为东京涩谷区南端的工商业区和住宅区。——译者注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强烈谴责了佐藤内阁对日中友好团体的非法搜查。

协会和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及其关西总部同时受到这种镇压，说明了两团体在如此困难时期，在同一条战壕中同甘共苦，共同战斗，这是令人不能忘怀的。

暴风雨的时代

一九六八年(昭和四十三年)和一九六九年仍然是暴风雨的年代。

越南人民的抗美民族战争继续从胜利走向胜利。与此相呼应，一九六八年在日本国内，从一月份就开始掀起了反对美国企业号核航空母舰停泊佐世保、反对美军野战医院移驻王子^①等一系列反对美军基地的斗争。在美国国内，黑人也爆发了如火如荼的反抗压迫的斗争。

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夺取决定性胜利的阶段，各级革命委员会相继在全国成立，当一九六八年九月新疆和西藏两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除台湾省外，全国二十九个省一级的行政区都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共产党”的反华宣传同美国、苏联和日本国内反动势力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利用《赤旗》报恶毒咒骂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领导这一革命的毛泽东主席。

这一时期的日中友好运动势必要反抗来自这四个方面的破坏，同它们进行斗争。不少青年人对“日本共产党”的政策失掉信心，不断要求我协会代行阶级政党的职能。在反对美国核航空母舰停泊佐世保的示威游行，反对建立王子野战医院的示威游行，要

^① 东京北区的地名，侵越美军拟在这里建立野战医院，遭到日本人民的反对。——译者注

求撤除板付^①基地的斗争、反对在长沼^②设立导弹基地的斗争以及反对建立三里塚成田机场^③的斗争中，要求协会站在全国这些争取撤除美军基地斗争最前列的呼声极其强烈。事实上确有不少人高举协会的旗帜参加了示威游行。协会将一九六八年十月一日规定为“庆祝中国国庆节、加强日中两国人民团结、撤除美军基地的全国统一行动日”，在全国采取了一致行动。但是，由于“日共”的攻击，特别是工会内部的“日共”党员的破坏，很多地方协会的组织力量还很薄弱，能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的还不多。

这年五月，由于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在东京召开了纪念讲演会，接着全国各地也举行了纪念活动，为普及《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的其他著作而进行努力。

开展反对“日美安全条约”、要求撤除美国军事基地的政治行动，以及正确理解和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思想活动，如果不以国民希望日中友好的具体要求为基础，协会的活动和组织是很难渗透到国民当中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的。在这段困难的时期里，协会得到许多人的协助，在全国开展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如中国物产展览和图片展览活动就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把许多人所关心的中国物产——从蜂蜜、粉条、罐头等食品到工艺美术品作为展品，举办的展览活动有：小型的或是长期陈列在会员家庭里，或给每户常备一套，或是象富山卖药郎中^④那样，放

① 在福冈市，战后成为驻日美军的空军基地。——译者注

② 北海道夕张郡的一个城镇，日本自卫队拟在这里建立导弹基地，遭到当地人民的反对。——译者注

③ 一九七〇年，日本政府开始在千叶县成田市三里塚建立国际机场（新东京国际机场，通称成田机场），遭到人民的反对。——译者注

④ 富山县盛产中草药，一些以贩卖富山县成药为职业的行商，背着药箱在全国各地到处出售，故有富山卖药郎中之称。——译者注

在皮包里挨门串户出售；中型的是把商品和图片装进小汽车，运到街头、广场、小型公民馆和住宅区等场所，举办几天物产、图片展览；大型的则租用体育中心、市民会馆，在一周或两周时间内举办较大规模的物产展览和中国图片展览，有的还组织放映中国电影和演出中国歌舞（如齿轮座^①和松山芭蕾舞团），设立中医治疗服务站等。在这种大型活动中，如福冈县总部，得到县、市、报社、企业界等各界的广泛协助，每年简直象必行的仪式一样，在福冈体育中心举办福冈县中国展览。展览从第一天开始，参观者就超过了二万人，在十天左右的整个展览期间，前来参观的达数十万人。大、中、小型活动的共同特点是，同时举办中国图片展览，并给《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展览》、《中国革命史展览》、《日中关系史展览》等图片展览配备解说员，进行讲解。这种图片展览会会场往往就象一个中国问题讨论会的会场一样。不少人通过这样的展览会，正确地了解了中国，懂得了日中友好的必要性，因而加入了协会。另外，通过这种展览会，在普及《人民中国》、《中国画报》、《北京周报》和毛泽东著作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东京、大阪等大、中城市还出现了专门从事这种活动的集体，他们把中国物产和图片装入大卡车，携带睡袋和粮食，走村串镇，开展“中国展览、图片展览”活动。另外，同各个城市的百货公司订立合同，举办“现场出售中国物产，中国图片展览”也很活跃。通过这些大型、中型、小型的物产展览和图片展览活动，而接触到有关中国情况介绍的工人、农民、一般市民、青年、学生的数字可能要达数百万人之多。

此外，协会还发挥了自己的特点，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友好活动。中心的活动是派遣各界各阶层的访华团并请他们作访华报

^① 原为日本共产党（左派）领导下的进步剧团，多次来我国访问演出。一九七六年日共（左派）福田正义集团反华后，剧团部分成员发表声明，批判福田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退出了剧团。——译者注

告。除“日共”外，许多人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情况，回来以后积极开展报告活动。另外这一时期的中国故事影片，因处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审查之中，除《南征北战》（日译为《歼灭战》）、《地雷战》等之外，为数很少。因此，协会积极在各地组织日中友好演出活动，邀请访华归来的齿轮座演出大型戏剧，组织文工队演出，请著名艺人大谷竹山举办日中友好说书会，等等。其次，还在各地设立“中医治疗服务室”，大力介绍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巨大发展的中国针灸疗法。

再有，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力更生建造了万吨货轮“东风号”（一万三千四百八十八吨）。一九六八年四月，为庆贺这艘轮船作为第十一艘日本航线船出航日本，协会同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一道，在横滨、神户、大阪、门司等停泊港口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这一年又值中国船只航行日本航线四周年，协会与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及其关西总部合作，八月在关西的神户六甲山上，九月在东京的滨离宫，为欢迎靠岸停留的中国船员，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

佐藤内阁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的每次国会上都要提出修改出入境管理法 and 外国人学校法草案两个法案，妄图制订不仅压迫旅日华侨、而且使中国人无法进行访日活动的法律。对此，协会同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等日中关系团体配合，进行了反对这一阴谋的斗争。

一九六九年掀起了反对佐藤内阁复活军国主义政策的斗争。所有的大学都燃起了学生斗争的烈火。一月十八日，八千五百名警察机动队冲进了东京大学的校园。要求归还冲绳的斗争，继二月四日的反美大罢工之后，从二月九日起，以东京为目的地，开始了“要求归还冲绳大进军”，协会和协会各个县的总部都参加了这次大进军。三月二日，苏联军队侵犯中国边境，挑起了珍宝岛事件，

整个中国都举行了抗议示威。协会立即派代表向苏联大使馆抗议。在国会内，反对“出入境管理法”和“外国人学校法”等的斗争也非常激烈。协会于三月十五日召开常任理事会，讨论以上各方面的问题。但由于对协会总部的领导心怀不满的集团，对这次常任理事会发起了进攻，致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

围绕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干部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一分歧进一步扩大，致使中央总部的组织从一九六九年后半年起，陷入不正常状态，直到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召开“团结胜利的全国大会”为止，不正常状态持续了约两年的时间。在此关键时期，由于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协会应起的作用显著地下降了。

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佐藤首相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签署了《日美联合公报》。美日企图把“安全条约”扩大到整个亚洲地区，并以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来代替美国；这个《公报》就是确凿证明，国内外大为震动。尤其严重的是第四项，它表明日本要积极介入亚洲的紧张局势。其要点如下：（1）韩国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2）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对日本的安全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3）关于归还冲绳的时间（一九七二年），要根据越南形势再行协商……。

而且在第二年一九七〇年三月，由于美国的挑动，柬埔寨发生了朗诺的军事政变，美国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进一步升级了。

四月七日，中国的周恩来总理访问平壤，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发表了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公报指出：“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庇护下，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成了亚洲危险的侵略势力。”朝鲜方面在公报中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和

友好团结。

接着，四月十四日发表了《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七团体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共同声明》，十九日又发表了《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代表和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的会议公报》，其中都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已成为现实的危险，提出如何同它斗争的任务。另外，一九七〇年四月十五日，周总理在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团体的代表时指出：“在日本的垄断企业中，如果有支持佐藤的侵略路线，侵入台湾的，我们将不同这样的企业发生联系。贸易界中如果有被眼前利益所迷惑，欺骗日中两国人民，帮助垄断资本侵入台湾的，我们将废除同他们订立的合同。我们要严格区分敌我。我们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周总理在四月十九日同松村访华团的会谈中，进一步阐明中国方面不同具有以下四种情况的企业进行交易：

①帮助蒋帮反攻大陆，帮助朴正熙集团侵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厂商；

②在台湾和南朝鲜进行大量投资的厂商；

③为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老挝、柬埔寨提供武器弹药的企业；

④在日本的美日合资企业和美国的子公司。

当时广州交易会正好在开会期间，这四个条件也在这里宣布了。所有参加日中贸易的企业都用这四条进行自我审查，证明本企业不在此四条之例，或保证今后不违反这四条，才能参加日中贸易。

四月二十四日，中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引起了世界的注目。二十八日，在中国广州召开的有越南（包括南方和北方）、老挝、柬埔寨三国四方最高首脑出席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发表了联合声明；中国政府也发表了支持的声明。五月一日，西哈

努克亲王在北京宣布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五月二十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揭露美帝是纸老虎，正在进行垂死的挣扎。这个声明（被称为《五·二〇声明》）指出：“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强调“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五） 开展大规模的争取恢复 邦交的国民运动

“两个中国”谎言的破产

世界正朝着毛泽东主席的《五·二〇声明》所指引的方向发生巨大的动荡。美国从亚洲的败退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美国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台湾的蒋介石就是中国”这一历史谎言，全世界再也不允许它继续存在了。

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社会党第五次访华使节团（团长成田知巳）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一日同中日友好协会发表了共同声明，就恢复日中邦交运动阐明了以下四项原则：（1）反对美帝国主义以及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争取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同亚洲各国人民的反帝力量团结起来，推进这一运动。（2）反对一切敌视中国的政策，站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上，要求废除“日台条约”，并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日中关系的

政治三原则，立即实现恢复日中邦交。(3)站在真正的日中友好和政治经济不可分割的立场上，为扩大两国人民在友好运动、文化、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交流而积极开展活动。(4)广泛团结真正期望日中友好和恢复日中邦交的力量，组织联合战线。

社会党遵循这一方针，回国后立即着手准备成立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此外，十二月九日成立了除“日本共产党”以外的超党派的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①)。十三日，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委员代表腊山道雄^②等)也宣告成立。

一九七一年是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运动迅猛开展的一年。二月二十六日组成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协会也参加了这一组织，全国的都、道、府、县也分别成立了都、道、府、县国民会议。

另一方面，为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王晓云等率领)来到日本，掀起“王晓云旋风”，引起了巨大反响。中国乒乓球代表团不仅受到整个体育界的欢迎，财界、政界也纷纷要求与身为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的小晓云进行座谈。通过同财界首脑的接触，战后第一次实现了关西经济界访华团(团长佐伯勇^③、一九七一年九月)和东京经济人访华团(团长东海林武雄^④、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的访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利用这个机会，邀请了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国和尼日

① 藤山爱一郎，一八九七年出生于东京，大资本家藤山雷太的长子，庆应大学毕业，战前长期担任商工会议所会长，战后担任岸内阁的外务大臣以及池田内阁和佐藤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现为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名誉会长。——译者注

② 腊山道雄，一九二八年出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上智大学国际关系问题教授。——译者注

③ 佐伯勇，一九〇三年出生于爱媛县，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大阪商工会议所会长，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常任理事。——译者注

④ 东海林武雄，一九〇〇年出生于秋田县，早稻田大学政经系毕业，日本舢板快艇协会会长，经济同友会终身干事。——译者注

利亚等许多国家的乒乓球队访华，特别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完全出乎世界意料之外。

七月二日，公明党代表团（团长竹入义胜^①）同中日友好协会发表了联合声明，提出了公明党关于恢复日中邦交的五项主张，其要点是：（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3）“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4）美国应当从台湾地区撤除其武装力量。（5）必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联合国。

关于这五项主张，联合声明中说：“中国方面认为，公明党的这五项主张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表示赞赏和支持；并且认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接受上述主张并为此采取实际步骤，就可以结束中日两国的战争状态，恢复中日邦交，缔结和平条约。”

七月十五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美国总统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访问中国”的公告。它宣告了美国“遏制中国”政策的破产，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动。

公告发表后不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在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的讲话中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去的。”这句名言点出了国际形势巨大变化的本质。

“团结胜利的大会”和协会的发展

八月二十一日，曾在激烈动荡的日中关系中为日中友好作过巨大贡献的松村谦三逝世。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代表中国人民，为参加松村谦三的葬礼（八月二十六日）和出席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的“团结胜利的全国大会”，于八月二十五日来到日本。日

^① 竹入义胜，一九二六年出生于长野县，众议院议员，公明党委员长，多次访问我国。——译者注

中友好协会（正统）在反对军国主义、推动恢复日中邦交运动大联合的各项活动中，克服了一九六九年后半年以来的不团结和组织上的不正常状况，逐渐恢复了团结，最后召开了使组织正常化的全国大会。组织正常化以后，协会竭尽全力为开展大规模恢复邦交的国民运动而进行了奋斗。

十月二日，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代表团（团长为藤山爱一郎会长）在北京同中日友好协会签署了联合声明。这个声明根据国内外形势抓住以下三个问题：（1）双方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以武力为背景的强权政治和武装干涉的政策，注定要失败。……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及其军事设施必须从印度支那和远东其它地区撤走。”（2）中国方面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已成为对亚洲人民的现实威胁”。日本方面对此表示理解，认为“恢复日中邦交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是不可分的”。（3）关于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日本方面对佐藤内阁充当逆指定重要事项的联合提案国，“深表遗憾”；中国方面也指出，佐藤内阁会因此而使自己越来越孤立。另外，这个联合声明在有关恢复日中邦交的基本原则方面，继承了公明党与中日友好协会的联合声明的成果。

接着，十月十六日，日中友好协会（正统）访华代表团（团长黑田寿男）也同中日友好协会发表了联合声明。

该联合声明由四部分组成：

- （1）日本方面祝贺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表示钦佩。中国方面对日本友好协会（正统）为日中友好和恢复邦交所做的一贯努力表示赞赏，尤其对最近召开的团结胜利的大会表示祝贺，希望日中友好力量进一步加大大团结。
- （2）指出毛主席的“五·二〇”声明发表后，全世界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人民，“一个反对美帝、苏修的历史新时期已经开

始”；指出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是当前的共同战斗任务，并严厉批判“宫本修正主义集团为美日反动派效劳，积极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

- (3) 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和“台湾归属未定”等谬论，坚决反对美日反动派策划的“台湾独立”的阴谋，并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必须废除非法的日蒋条约（指“日台条约”——编辑委员会注）；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必须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所有机构的一切合法权利，坚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驱逐出去”。
- (4)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决不辜负日本人民的殷切期望，决心进一步深入各阶层去，广泛团结一切愿意和中国友好的力量”，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争取恢复邦交。中国方面对此表示坚决支持。

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权利和尼克松访华

十月二十五日已成为国际政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阿尔巴尼亚等二十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驱逐蒋帮”的决议案，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的绝对多数获得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在全世界的欢呼声中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联合国才开始改变它充当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统治世界的工具的局面，才逐渐发挥其正常的机能，反映占世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十一月二十日，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访华代表团同中日友

好协会发表了共同声明，其内容基本上继承了日中和中日两个友好协会的共同声明。

一九七二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二十余年来日中友好和恢复邦交运动最后决战的局面。友好力量相继访华，仅一月份日本就有九个代表团的一百二十五人接踵访问了中国。其中有象总评、中立工联代表团(团长为总评议长市川诚)那样把“春季斗争”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结合起来进行斗争的有力的工会代表团，也有从冲绳斗争中派出的冲绳县第一次友好访华团(团长为冲绳县工会协议会议长仲吉良新)，还有反映全国各都道府县高涨的恢复日中邦交运动的宫城、爱知、三重、福岛等县一级的工会访华团以及社会党七〇年会^①访华团、解放同盟^②访华团和协会的工会访华团等。

在这种形势下，国会议员岸信介一月就匆忙飞往台湾，鼓吹什么“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要由台湾一千五百万民众自己决定，使“台湾独立”的阴谋公开化了。这说明了“台湾帮”要作垂死的挣扎。笹川良一^③之类的右翼分子禀承这一旨意，频繁往来于日本与台湾之间，进行阴谋策划，公然推行台湾的国民党和“台独”分子的合作——即所谓“国台合作”。三月，右翼分子把宣传车开到惠比寿的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门前进行挑衅，叫嚷什么“台湾不是中国人的”。反动派的这种垂死挣扎还表现在自民党党纪委员会对藤山爱一郎的处分事件上。藤山曾于一九七一年十月以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的身份，率领超党派

① 为社会党中的左派派系组织。——译者注

② 全名为部落解放同盟，为日本争取解放“部落民”(又名“秽多”、“非人”，在社会上被歧视的所谓“贱民”)的全国组织。其前身为战前的全国水平社和战后的部落解放全国委员会。——译者注

③ 笹川良一，日本右翼头目之一，一八九九年出生于大阪，全国汽艇比赛会会长，日本船舶振兴会会长。——译者注

的议员联盟代表团(“日共”除外)访华,就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同中日友好协会签署了共同声明。自民党的“台湾帮”竟把此事当作违反党纪,给藤山以停职处分(缓期执行)。这件事被人们看作是“政治丑剧”,成为社会上的笑柄。

一月和二月,“尼克松访华和日中复交问题”在社会上成了轰动一时的话题,国会因中国问题而动荡不定。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二十八日发表中美上海公报后回国。在这一周期间,卫星转播的电视对这个历史转折的场面大放特放,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它说明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余年所捏造的神话破产了,这给日本国民的印象尤其深刻。国民感到无比气愤的是,二十多年来认真谋求的日中邦交正常化未能实现,都因日本政府一贯奉行卑躬屈膝的对美从属政策,而现在美国却搞了“越顶外交”,抢到日本的前面去了。

抓住了“复交三原则”

二月二十五日,在协会中央总部的主持下,在东京丰岛公会堂召开了“立即废除日台条约、实现恢复日中邦交中央集会”。三月一日,社会党、公明党、总评、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五团体,在日比谷公会堂主持召开了实现恢复日中邦交国民大会,有二千人参加。四月十一日,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藤山会长,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的委员长以及工会、日中贸易团体、日中友好团体的代表和西园寺公一等各界知名人士共二十三人,把共同欢迎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作为当前的目标,组成了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联络会议。

四月十三日,民社党访华代表团(团长为春日一幸^①委员长)

^① 春日一幸,一九一〇年出生于岐阜县,名古屋邮政讲习所毕业,曾任春日乐器制造公司经理、民社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民社党书记长等。——译者注

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表了联合声明。联合声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进行了谴责,同时把一九七〇年度社会党、一九七一年度公明党以及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等各个代表团分别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之间签署的联合声明,归纳成为三项原则。这就是后来中国方面所说的“复交三原则”。其内容是: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等荒谬的主张。
- (2)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归还中国。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论和策划“台湾独立”的阴谋。
- (3) “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五月十一日,全国旅日爱国华侨的代表聚集一起,排成长长的队列,高举反对“出入境法草案”的标语牌,在东京都内的繁华大街上举行了示威游行。这个罪恶的法案是妄图扼杀国际民间交流,剥夺旅日华侨的基本人权的法案。这是为了反对这个法案每年都举行的示威游行的最后一次,可以说是给佐藤内阁的送葬曲。在汹涌澎湃的日中友好交流的高潮中,佐藤内阁的末日终于到来。政界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他们纷纷访华。三月下旬三木武夫^①继藤山爱一郎之后访问中国,同周总理就复交问题进行了商谈。五月中旬,社会党活动家访华团和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访华。五月下旬,古井喜实访华。七月份佐佐木更

^① 三木武夫,前总理大臣,国会议员。一九〇七年出生于德岛县,明治大学毕业,一九三七年以后一直当选为国会议员,战后组织国民协同党,任委员长,一九四七年任片山内阁邮政大臣,在历届自民党内阁中担任过运输大臣、国务大臣、经济企划厅长官、通产大臣、外务大臣、环境厅长官、副总理等。——译者注

三①一行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一行分别访问了中国。

另一方面，群众团体方面认为七、八月份是日中邦交的恢复能否实现的决战时期。协会和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把七月七日（芦沟桥事件三十五周年纪念日）到八月十五日（日本战败二十七周年）作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恢复日中邦交月，集中开展了活动。六月十七日，佐藤荣作在自民党众、参两院议员全体会议上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佐藤内阁在四面楚歌中下台。正当自民党内部围绕着下届总裁的人选而争吵不休的时候，防卫厅又宣布欢迎台湾蒋帮的军舰到日本港口停泊。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和工会等对此发起了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并发表声明，在现场展开了抗议行动。

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已长期没有首席代表，只有留守人员级的年轻的代表。一般认为这意味着对佐藤内阁的反华政策的抗议。但在佐藤首相下台之后不久，长期离任的肖向前以首席代表的身份于七月三日来日赴任。

“八·二〇”中央集会和政府代表团访华

七月五日，田中角荣当选为自民党总裁。他在当晚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恢复日中邦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七月七日，田中内阁成立。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新首相说：“关于外交，要尽快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在激烈动荡的世界形势下，要大力推进和平外交。”

七月十日，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孙平化团长率领的上海舞剧团一行二百〇八人来到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来日本的最大型舞剧团。演出的节目有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红

① 佐佐木更三，社会党左派，国会议员。一九〇〇年出生于宫城县，日本大学毕业，曾任社会党总务局长、副委员长、委员长。——译者注

色娘子军》等，在全国各地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这个舞剧团来日本演出，同时也是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伟大历史剧的序幕。

七月十四日，三木和中曾根两位现职大臣出席观看了东京日比谷日生剧场的第一天正式演出。这样的事是前所未有的。在演出的休息时间，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同孙平化团长和肖向前首席代表进行了会谈。十七日，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①同孙平化团长举行了会谈。次日十八日，社会党委员长成田知己、自民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②分别同孙平化团长会谈。七月二十日，在藤山爱一郎的主持下，举行了欢迎肖向前、孙平化两位先生的招待会。大平外相、三木国务相、中曾根通产相三位大臣和自民党的三个主要干部桥本干事长、铃木总务会长、樱内政调会长以及自民党的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应邀出席了招待会。这可以看作是实现邦交正常化的预先接洽。

七月二十一日，佐佐木更三从北京归来，立即向田中首相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口信。七月二十三日，孙平化和肖向前两位先生一起同大平外相举行了会谈。

七月二十五日，公明党竹入委员长飞往北京，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多次会谈；八月三日由北京返回日本，向田中首相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的口信。八月八日，三井、三和、住友财团的负责人会见了肖向前和孙平化两位先生。

另外，八月十一日，大平外相在大仓饭店会见孙平化和肖向前两位先生，转达了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于是紧接着在次日（十二日），中国外交部长姬鹏飞受权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① 河野谦三，一九〇一年出生于神奈川县，早稻田大学毕业，国会议员，日本体育协会副会长、日本田径赛联盟会长，前参议院议长。——译者注

② 小坂善太郎，一九一二年出生于长野县，东京商业大学毕业，众议院议员，战后历任劳动大臣、国家公安委员长、经济企划厅长官以及自民党的政调会长、外交调查会长、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和财务委员长等。——译者注

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同日，经济团体联合会^①会长植村甲午郎^②、富士财团的今里广记^③和岩佐凯实^④、日本商工会议所^⑤会长永野重雄^⑥等日本经济界代表性的人物会见了肖向前和孙平化。十三日，古井喜实设宴招待孙平化和肖向前，大平外相也出席作陪。十四日，二千四百人应邀参加了中国上海舞剧团的告别宴会，三木国务相、中曾根通产相、河野议长等出席了这次宴会。十五日，即孙平化回国的前一天，田中首相会见了孙平化、肖向前，表示希望访华获得丰硕成果。

八月十六日，中国上海舞剧团战后首次通过东京—上海间的直通航线，分乘日本航空和全日本空运两家公司的飞机回国。

另一方面，协会同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一起，把七月至八月作为恢复日中邦交月，大规模地开展了宣传活动。在这个基础上，协会邀集了全国六千名代表，于八月二十日在东京日比谷露天音乐堂举行了中央集会，要求田中首相在复交三原则的指导下迅速访华，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九月十二日，古井喜实、田川诚一、松本俊一等人访华，会见了周恩来总理。九月十四日，自由民主党访华团（团长为自民党日中

^① 简称“经团联”，一九四七年成立，日本垄断资本集团的重要组织，成员为全国各行业的联合团体和大企业，有“财界总司令部”之称，现任会长为土光敏夫。——译者注

^② 植村甲午郎，一八九四年出生于东京，东京大学法律系毕业，曾任“经团联”会长、日本广播会会长，航空审议会委员长等。——译者注

^③ 今里广记，一九〇七年出生于长崎县，日本精工董事长，海外石油开发经理，“经团联”常任理事。——译者注

^④ 岩佐凯实，一九〇六年出生于东京，富士银行董事长、亚洲民间投资公司董事长，“经团联”副会长。——译者注

^⑤ 为日本垄断资本控制中小企业的组织。——译者注

^⑥ 永野重雄，一九〇〇年出生于广岛县，新日本制铁公司董事长。——译者注

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副团长为该协议会副会长江崎真澄^①和塚田十一郎^②一行二十三人，乘专机前往北京，同周恩来总理、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举行了会谈，二十日下午乘专机回国。在上述一切均准备妥当的基础上，日中两国政府于九月二十一日同时发表关于田中首相访华的公告。二十五日，日本政府代表团乘专机到达新中国的首都。

① 江崎真澄，一九一五年出生于爱知县，日本大学毕业，众议员，自民党顾问，曾任防卫厅长官、自治大臣、国家治安委员长、北海道开发厅长官以及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国民运动本部长等。——译者注

② 塚田十一郎，一九〇四年出生于新泻县，东京商业大学毕业，曾任邮政大臣、行政管理厅长官和新泻县知事等。——译者注

第五章 邦交恢复后的形势和友好运动的新阶段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

(一) “新篇章”的开始

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在日本各界强烈要求的推动下，田中首相一行于九月二十五日到达北京，二十九日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后回国；在这期间同中国政府首脑进行了紧张的会谈。如前章所述，田中首相访华并不是突然进行的，在这之前，邦交正常化的各种前提条件已通过各条民间渠道酝酿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会谈虽然没有通过正式外交途径进行准备，但实质上可以说事前已经作好充分准备。在这次会谈中，中国方面没有提出任何一项使日本方面感到为难的新要求。但田中首相在宴会上的讲话中有一点使北京的会谈发生了新的问题。田中首相一行于二十五日到达北京后，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他们。继周总理致祝酒词后，田中首相也在宴会上致了祝酒词。首相在致词时一方面谈到过去几十年日中关系中“不幸的过程”，同时又说：“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中国方面对于这种表达方式曾有所议论，认为在希望结束目前这种不正常的日中关系时，日本方面用“麻烦”这词来表达，恐怕很难说明对过去的侵略有真正的反省。不过，结果还是以“表达”上的不确切而了事，在日中联合声明的前

言中采用了更明确的语言,所谓“麻烦”的问题,并没有进一步构成政治问题。但这种因表达方式而构成问题本身,就表明了这次邦交正常化在日中关系史上具有何等的意义。

这样,尽管日本方面的首脑直到最后在认识上还有一些出入,但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终于在九月二十九日和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从而结束了长期存在于两国政府之间的不正常状态。日本各界人士欢呼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完全支持联合声明中所提出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各项原则。中国人民当然全面支持中国政府的行动。九月三十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的社论,表示了中国人民的祝贺,同时还作出如下的评价: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参阅 216 页)

协会自成立以来就一直为这一天的到来而努力奋斗。协会中央总部代表全国的会员,立即发表了声明(参阅 215 页),肯定这次胜利“是日中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多年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同时还向国民表示决心:“要继续揭露一切阻挠日中友好的阴谋,进一步加强同各阶层国民的联系,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团结而奋斗。”接着中央总部以及全国的组织,同广大的友好力量合作,共同召开了庆祝日中复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大会。北从北海道南至冲绳,都隆重、热烈地举行了这样的大会。

联合声明所表明原则

联合声明包括前言和九项双方一致同意的条款。日中恢复邦交通过签署这个联合声明的形式而实现了。这个联合声明表明了日中恢复邦交完全不同于其他不存在战争状态的国家之间建立外交关系,它还进一步阐明将来作为维护和发展两国长期睦邻友好关系基础的各项重要原则。

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论述日中联合声明所具有的意义，只谈一谈在联合声明双方同意的事项中不可忽视的三点：

第一、联合声明明确地指出：日中恢复邦交就是“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日本方面还在这个声明中谈到：“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就表明了结束日中战争状态的，决不是一九五二年和蒋政权缔结的“日台条约”，而是开始于一九七二年九月签定的“日中联合声明”。而且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在正文第五项里明确记载着中国政府宣布“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第二、联合声明的前言里，明确记载着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并且在这种“重申”的基础上，在正文的第二项里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第三项里，中国方面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方面则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复交三原则”除了上述两项原则外，还指出“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日本方面避开在联合声明中明文记载这一点，而由大平外相在九月二十九日对声明作补充的记者招待会上阐明“日本政府的见解”，指出“日华和平条约^①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这样，日本政府就完全接受和确认了“复交三原则”。

第三、在日中联合声明正文的第六项和第七项里，双方还进一步确认了可以称之为保证日中两国间持久睦邻友好关系的指导思想：其一是，承认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政治基础。也就是说，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

^① 即日蒋条约。——译者注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及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第六项）其二是，“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第七项）这是进一步对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作的补充。这一“不谋求霸权、反对霸权”的原则，后来成为一九七五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争论焦点，但是在提出这一原则的当时，日本方面是把对过去侵略行为的反省作为前提的，中国方面则是表明了“坚决不当超级大国”的决心和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警惕。

这样，通过联合声明的第六项和第七项，双方表示的态度不仅要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而且要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联合声明的第八项还进一步表明了双方“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并在第九项中明确记载着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联合声明的这些内容确实表明：日中恢复邦交不仅结束了两国长期不正常的状态，而且为世世代代的友好开始书写历史的新篇章。

新形势的特点

复交以来，日中关系确实是揭开了“新篇章”。当然，这并不是说日中两国在复交以后再也不会重大的政治上和外交上的分歧，也不是说日中联合声明的精神已经深入日本国内每个角落。拿日中联合声明中所保证的四项政府间具体业务协定的谈判来说，航空协定在复交后费了一年半的时间才达成协议；渔业协定虽然于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在北京进行了谈判，六月基本上取得一致

的意见，八月十五日签了字，但正式生效还要到一九七六年。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尽管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已开始预备性谈判，但围绕着写进“反对霸权”的问题，双方发生了重大的分歧意见，使得这项谈判又成为悬案而留待一九七五年下半年解决^①。更重要的是，尽管日本政府在日中联合声明里表明要“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因而宣布“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正象后面将要谈到的那样，政府与执政党中极力要同所谓“中华民国”搞友好的政治集团，于一九七三年三月以“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的名义蠢动起来。这个集团不论对日中航空协定还是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一直施加压力，妄图加以否定。在日中复交后，始终还存在着这种与日中联合声明背道而驰的动向，有时甚至还掀起一股令人不可忽视的逆流。对此，我们决不可掉以轻心。不过从整体来看，日中复交以来，不论在政府间的关系上还是在民间的友好交流上，都开创了日中关系的新局面。

日本方面基本上停止了长期推行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双方政府首脑不再发表指责对方政府的言论，双方都积极地促进日中经济交流，对民间团体的来往也都采取促进的态度，这些是复交以来约三年期间日中两国政府间关系的特点。日本政府遵照日中联合声明的保证，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关闭了驻台“大使馆”，也关闭了台湾方面在东京的“大使馆”。一九七三年一、二月，日本与中国分别在北京、东京建立了大使馆。以后日本政府停止了同蒋帮“外交上”的接触。这些行动对东南亚各国也产生了影响，一九七三年六月，亚洲太平洋理事会(ASPAC)无限期地推延下届部长级会议的召开。后来这个组织就分崩离析了。亚洲太平洋理事

^①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由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自民党内部右派势力的阻挠，至今仍未签订。——译者注

会是一九六六年由南朝鲜倡议，纠集了日本、台湾、南朝鲜、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泰国、南越等，作为一个反共色彩浓厚的地区性集团而成立的。现在以日中恢复邦交为转折点，这个组织事实上是解体了。这也表明了佐藤内阁时代以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兄弟为中心所策划的日朴蒋同盟彻底破产了。此外，一九七三年三月开始的日中航空协定预备谈判，在处理“日台航线”的问题上碰到障碍时，大平外相于一九七四年一月亲自访问了中国，寻求打开僵局的道路。这些行动都表明了日本方面的态度还是愿意遵守联合声明的。

不用说，在日中复交时，促进日中经济交流的要求曾经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以后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一九七三年以来，双方经济界的来往出现了飞跃的发展。一九七三年一年中就订立了十一项由日本出口成套设备的合同。以这种活动为背景，一九七三年夏天开始了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谈判，不到一个月期间就大体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进行了草签，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正式签定了协定。这个协定规定在关税、海关手续和货物通过上，双方互相给予最惠国的待遇，扫除了长期以来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所实行的关税歧视。另外，一九七四年还在大阪、东京举办了日本方面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年在北京举办了日本农林水产技术展览会，在天津举办了日本印刷机器、包装机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了电子计算测量仪器展览会。接着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日，在北京举办了日本贸易振兴会^①主办的“日本工业技术展览会”。日中贸易量的扩大，虽然由于受到日本经济萧条和物价高涨的影响，一九七四年没有得到所预想的发展，但自一九七三年以

^① 为日本半官方的对外贸易组织，主要从事国外市场调查、商品的宣传和举办展览会等活动。——译者注

来,由于中国原油进口量稳步增长等原因,日中贸易发展的前途是光明的。

在开展以上活动的同时,复交后更为重要的活动是,在文化、学术、体育、市民、工农团体等一切领域内,迅速地发展了日中之间的民间来往,其中还创造了如缔结友好城市和“青年之船”等一系列新的交流形式。日中友好的趋势,正在日本的各界、各阶层中不断扩展。关于这一点,准备另节叙述。

(二) 友好运动的新阶段

“任重道远”

日中关系揭开了新的一章,协会怎样看待这种形势,并怎样提出新阶段的友好运动的方针来呢?当然,长期展望恢复邦交后的形势,从而提出新的方针,那是需要一定的过程的。因为复交前、后的日中关系,虽然明显地有着划时期的区别,但直到目前还顽固地推行反华政策的国内各种势力,究竟将会如何改变其做法,还需要继续观察事情的发展。另外,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访问中国以来,美国的遏制中国的政策虽然开始崩溃,而且这曾经是促使日本政府决心恢复日中邦交的一个原因,但是在日中邦交恢复的时候,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还继续进行着侵略战争,日本还被它利用作后方基地,亚洲的形势还没有缓和。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中,制定日中友好运动新方针的初步工作,是从一九七二年十月开始而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三年五月召开的一九七三年度代表大会的。这次代表大会,以提出了复交后的新运动方针,而成为我们协会一次具有划时期意义的大会。

着手准备一九七三年度代表大会的前夕,我们协会应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于一九七二年十月向中国派遣了复交后第一个由

十人组成的协会代表团(团长为宫崎世民理事长)。同一时期,中日友好协会还邀请了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以及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团等。十月二十三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宴会,欢迎他们。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在宴会上首先代表中国方面讲话,接着日本方面的藤山爱一郎、宫崎世民、宫川寅雄、^①冈崎嘉平太和木村一三等也先后讲了话。

廖承志会长当天的讲话,同上述《人民日报》社论都正确地指出了复交后日中关系的特点(参阅 219—221 页)。廖承志会长首先指出:日中恢复邦交“在两国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必将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廖承志会长就复交后的日中关系和日中友好的任务,强调指出下列三点:

第一:“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会更加频繁,交流将会更加丰富多彩。‘任重道远’。”这就是说,日中关系的特点,不是因为政府间的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就一切都通过政府来进行。新阶段最显著的特点是,人民之间的来往和交流将飞速地得到发展,友好团体和友好运动承担着组织与促进这些来往和交流的艰巨任务。

第二:新的形势无疑是有利于两国人民的。但是“同时还应该看到,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今后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障碍,极少数人仍在明里暗里进行破坏和捣乱”。以后的事实发展证实了这一点是正确的。

第三:即使有任何“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障碍”,“但是,中日两

^① 宫川寅雄,一九〇八年出生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毕业,美术评论家,和光大学教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副理事长,著有《冈仓天心》、《会津八一》、《近代美术及其思想》等。——译者注

国睦邻关系的发展，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在这次访问中国的过程中，协会代表团同中日友好协会的干部举行了六次座谈会，就日中复交的意义和复交后日中友好运动的设想交换了意见。其中，在全面评价日中复交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上，双方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廖承志会长还指出：“在当前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两国人民的来往以及中日友好协会和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的交流，要做的工作将会越来越多。”确定了中日友好协会今后要更加强同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的合作。协会代表团同中日友好协会还就一九七三年度的人事与文化的交流进行了协商，在一九七三年要迅速扩大中日两方人士互访的范围这一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协会在代表团回国后的十一月十五日，召开了常任理事会，就当前活动进行了讨论，向全国的会员发出了以下三点号召：(1)要改变旧的认识并统一对新形势的认识，以适应新形势；(2)要把一切期望日中友好及亲华的人们大力组织起来；(3)为了能够适应新的形势，要开展广泛、深入、细致的工作。

这次常任理事会，还决定一九七三年四月在东京召开恢复邦交后的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立即着手筹备。

一九七三年度全国代表大会的成果

协会一九七三年度的全国代表大会，于四月二十一日在东京召开，历时三天。这是协会在复交后的新形势下所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以中央总部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就着手准备大会的报告和提交大会讨论的运动方针，并把有关资料发给全国各地的组织，以推动全国范围的讨论。在协会悠久的历史中，这次大会可谓是一次准备最周全的大会。大会在第一天迎来了以廖承志会长为首的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的参加，这更增添了大会的热烈友好

气氛。

一九七三年度的大会最大的成果，是在大会所通过的运动方针中，肯定了日中恢复邦交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复交后友好运动的大方向统一了思想。运动方针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1)“日中关系的新篇章”；(2)“协会的性质和任务”；(3)“当前活动的重点”。

在展望复交后日中关系的第一部分里，肯定了日中关系由于日中复交而揭开了“新篇章”，但同时认为：“两个国家之间还遗留着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在世界各种矛盾急剧扩大的形势下，必须警惕国内外的各种反华势力的阴谋活动会变得更加狡猾和复杂。”运动方针一方面提醒大家注意“越南停战后，美国仍在印度支那进行侵略和干涉”，“在日本本土和冲绳正在改编和加强海空军基地”；另一方面谴责了苏联政府“不仅把大批军队部署在中苏边境，对中国施加压力，而且在亚洲广大地区组织反华包围圈，甚至企图拉拢日本反动派”。方针提醒国民注意“苏联政府采取了比老帝国主义更加阴险、露骨的反华态度”。

接着在“协会的性质和任务”部分，明确指出协会“是包括最广泛的各界各阶层、推进日中友好的群众团体”。在“当前活动的重点”部分，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开展运动的两项可以称之为带根本性的方针：一项是“不断广泛地听取和集中各界各阶层对友好的希望和要求”；另一项是“继续同一切阻挠破坏友好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

这些原则当然不完全是新提出来的，而是始终贯穿在二十多年友好运动的历史中。但在国内外反华的阴谋活动非常猖獗的时期中，实际情况是，协会的活动却侧重于同阻挠破坏友好运动的言行作斗争。一旦日中恢复了邦交这一新形势来临后，日本各界人士希望日中友好的要求“象决堤的洪水”，势不可挡。因此，运动首

先必须引导这些希望和要求，组织力量，为国民服务；并要与此相结合，继续同阻挠和破坏友好的言行作斗争。

“当前活动的重点”部分还号召会员注意下面问题：“我们必须更加广泛、深入、细致地开展运动。要经常注意改善两国的国家关系，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积极地利用日本政府友好的一面，坚决反对其非友好的一面。我们支持日中联合声明，要求日本政府严格地遵守联合声明的精神，尽到其职责。”

“当前活动的重点”部分，根据上述基本方针，号召全体会员开展下列具体活动：（1）敦促日本政府遵守日中联合声明，促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2）加强了解和宣传中国的活动；（3）推动各种交流；（4）加强和扩大组织；（5）加强同各个组织及各种运动之间的合作；（6）加强财政工作。

一九七三年度的全国代表大会，在确定复交后运动方向的同时，还为协会的章程增写了前言，使其更加适应于复交后的形势。章程前言的开头明确地写着：“我们协会是超越思想信仰、政党和政治派别，集中各界、各阶层一切希望日中友好人们的意志而进行活动的群众团体。”章程的前言还肯定了日中复交使两国的关系“揭开了新篇章”，并保证：“本协会为迎接这个新阶段，要更高地举起日中友好的旗帜，反对阻挠和破坏友好的行为，为世代代长远的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团结而奋斗！”

（三） 广泛发展的友好交流

日本列岛上的友好热潮

复交后日中关系的新形势最集中地表现在双方各界广泛进行的各种交流上，其势如洪水奔流，迅速获得了发展和扩大。它在数量上是复交前的几倍、几十倍，而且改变了复交前那种以日本方面

访华为主、中国方面很少访日的状况。此外，一方面增加了经济界各种行业的交流，另一方面不断地互相举办重要的展览会。体育界的交流也接连不断。肩负日本未来的青年采取了“青年之船”、“青少年之船”的新形式访问中国，扩大了同肩负中国未来重任的青年进行交流的机会。这种交流在日本方面绝大部分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的。复交后仅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进行的民间交流和文化交流，整理起来就足以写成一本书。这里想主要谈一谈本协会所从事的活动，以表达这些新型活动的气氛。

复交后友好来往的开幕锣鼓，是由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敲响的。这个代表团是应日本各界的共同邀请访日（四月十六日——五月十八日）的。对该团的邀请信虽然是在复交前的一九七二年四月，由各友好团体、贸易团体、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等的负责人共二十二名联合发出的，但这次访问是以中国人民庆祝恢复邦交的使节来日本而实现的。这个由五十五人组成的代表团，以廖承志会长为团长，包括了各方面的代表人士。来日以后，为了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以副团长为中心，分成三个分团，访问了北陆方面、北海道、东北、九州和冲绳。总团以东京、大阪为中心，加深了同各界的联系。代表团在一个月期间访问了三十八个都道府县，在日本列岛掀起了友好的热潮。在接待该团的活动过程中，协会不仅派遣了干部和事务局人员参加了中央的欢迎委员会，而且在代表团所访问的各个地区，协会也同新朋友合作，担负了接待工作。从协会组织同关心日中友好的新朋友加强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代表团的访日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结成友好城市

在复交后的活动中，很多地方自治体参加了进来，成为交流活动的新的承担者。其中极其重要的活动是日本的五个城市同中国

的上海、天津、西安结为友好城市。协会很早就重视这个要求。协会总部于一九七三年五月组织和派遣了自治体首长访华代表团（团长是岩手县知事千田正）。接着在六月京都、大阪、神户三市市长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协会的大阪府总部、京都府总部、兵库县总部的代表也随同前往，协助这次访问获得圆满成功。当时京都市市长去西安，大阪市市长去上海，神户市市长去天津，分别受到各市的革命委员会的热烈欢迎，神户、天津两市首先发表了结成友好城市的宣言。同年十一月，横滨市长飞鸟田一雄^①也访问了上海，三十日在上海发表了横滨、上海二市结成友好城市的宣言。接着奈良市访华代表团（团长是市长键田忠三郎^②）于一九七四年一月访问中国，二月一日发表了同西安市结成友好城市的宣言。大阪市访华代表团（团长是市长大岛靖^③）也于四月访问了上海，发表了大阪、上海结成友好城市的宣言。五月十日，京都市友好访华代表团（团长是市长船桥求己^④）访问西安，发表了京都、西安结成友好城市的宣言。

这些友好城市的结合，除了西安同奈良、京都是因为具有悠久的历史交流的历史外，上海、天津同横滨、神户、大阪都是贸易港口，具有共同性，有着相互协助的一面。而且，为了不致使友好城市仅仅停留于市政当局的互相交流，神户市还邀请了天津市的排球队，大阪邀请了上海市杂技团，这样，就使友好城市的交流逐渐向整个市民交流的方向发展。本协会组织也根据这个发展方向，不断地给予合作。

① 飞鸟田一雄，一九一五年出生于神奈川县，明治大学毕业，横滨市长、社会党副委员长、全国革新市长会会长。一九七七年底任社会党委员长。——译者注

② 键田忠三郎，一九二二年出生于奈良县，拓植大学毕业。——译者注

③ 大岛靖，一九一五年出生于和歌山县，东京大学毕业，曾任劳动省劳动统计调查部长、劳动基准局长等。——译者注

④ 船桥求己，一九一一年出生于冈山县，京都大学毕业。——译者注

“青年之船”、“友好之翼”

在开展自治体交流的过程中，新开创并取得成果的，是以“青年之船”、“青少年之船”的形式，使大批人员访问了中国。采取这种形式虽然只能访问具有船只入港条件的上海、天津（最多包括北京），但其特点是一只船能使几百人访华，而且每人平均所花的费用比较少。另外，船只的往返虽然要比飞机多费些时间，但可以利用这个期间进行学习和青年相互了解。最初创造这种经验的是一九七三年兵库县和三重县派出的“青年之船”。一九七四年又组织了“福冈县青少年之船”、“九州青年之船”、“和歌山青年之船”。这些访华船只都是由市长或知事亲自担任团长，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的各县总部积极进行协助。一九七五年除了组织“富山县青年之船”、“东海、四国青年之船”、“北九州市青年之船”外，还组织了“东北、信越^①农民之船”。一九七五年又进一步发扬这种“青年之船”的特点，开展了象仙台市的“青年之翼”，以及兵库县、大阪市等的“友好之翼”这种包租班机形式的集体访华的尝试。其中很多是组织大批青年访华，使新一代了解中国，促进同中国青年的互相了解，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此外，间隔了八年之久，由二十二人组成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于一九七四年一月来日本访问，加深了同日本各界青年的交流。一九七五年又有两个中国青年代表团来日本访问。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日本访问中国的各界青年团体代表团达十几个。一九七五年初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巴桑女士）来日访问，妇女之间的交流活动也活跃地开展起来。

中国展览会的巨大成果

在邦交恢复以前，中国的表演团体经常因受到阻碍而停止来

^① 指长野县和新泻县一带。——译者注

日本访问演出。但一九七四年以后又开始活跃起来。首先访日的是上海杂技团(团长林德明等六十七人)。他们应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七月四日来日本,八月二十二日回国,在八个城市进行了三十八天的演出,给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另外,中国少年武术代表团(团长魏明等四十一人)和中国中央乐团(团长林丽韞等八十七人)都是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分别于同年九月和十月来到日本。中央乐团除了在十三个城市演奏外,还通过电视给六千万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九七三年以来,日中双方举办了各种文化、学术方面的展览会。特别是一九七四年在大阪、东京隆重地举行了由中国主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在大阪观众二百六十多万人,东京一百三十八万多人,共计约四百万人。这是复交后显示日本各界关心中国的晴雨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是由日中友好馆、重工业馆、轻工业馆、农业馆、工艺美术馆和文化馆等组成的现代中国综合展览会,展出了中国制造的产品,其规模之大也远远超过历次中国展览会。日本方面在大阪、东京分别组织了包括财界首脑在内的协力会,担任宣传、动员和接待工作。大阪的协力会会长是商工会议所会长佐伯勇,东京的会长是日本商工会议所会长永野重雄。协会也十分重视这次展览会,早在一九七三年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第三届常任理事会上(八月三日),就决定把全国分为东西两个地区,同各友好团体和民主团体共同协作,在大阪和东京开展动员工作。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在大阪和东京建立了友好团体的协力会,与经济界组织的协力会共同努力。这个友好团体的协力会还在关西、关东很多县组织了以县为单位的协力会。另外还以大阪、东京为中心,组织了市、区一级的协力会。这些由友好团体组成的协力会,不仅承担宣传和动员工作,而且还在展览会场组织观众同中国工

作人员进行座谈，从而帮助观众进一步了解中国。展览会获得巨大的成功，是与这些友好组织的努力分不开的。

以上是复交以来民间交流的一些特点。此外，还极其活跃地开展了各种体育交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同体育团体合作，做了很多的工作。本协会也协助体育恳谈会，组织体育界代表访华，并邀请了中国少年游泳代表团访日。协会还努力按阶层来组织访华代表团，派遣了医学、教职员、渔业、中小企业、妇女、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等各阶层的代表团访问中国。从一九七三年全国代表大会至一九七四年五月全国代表大会的一年期间，协会参与邀请和接待的中国代表团共二十九个、四百二十二名；协会派遣或推荐的访华团共三十四个，达五百五十八人。双方往来的人员超过了一千人。以这种交流为基础，协会制定了发挥各阶层的特殊性来开展友好运动的方针，除了在条件具备的县设立青年部和妇女部外，还在全国按医务人员、教职员、农民等不同的阶层，建立维护他们利益的组织。

尽管自协会成立以来，我们的运动就不是作为特定阶级的运动来开展的，但是应该说，复交以后的运动才名副其实地开始朝着包括各界各阶层、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特殊性的方向前进。

（四） 同政治任务相结合

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仍在活动

如上所述，复交后的日中友好运动，创造了以前办不到的新型交流形式，结识了以前未能接触到的新朋友。但是与此同时，就是在友好热潮以全民规模高涨的时候，对顽固坚持反华阴谋活动的警惕性也一直没有放松。

一九七三年三月，自国民党内的亲台派议员拼凑了约一百六十

名众、参议员，组成了所谓的“日华关系恳谈会”。协会在复交后首先对这种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提出了警告。这个恳谈会由国会议员滩尾弘吉^①担任会长，由后来的“青岚会”^②的骨干藤尾正行、玉置和郎、中川一郎等国会议员担任代理会长和发起人。它的章程中规定：“本恳谈会是以继承和发展同中华民国政府^③之间所存在的传统的友好亲善关系为目的。”（第二条）这与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日中联合声明是背道而驰的，是妄图继续承认所谓的“中华民国”这个伪政权。在与中国签订了日中联合声明的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公然进行这样的活动，意味着执政党本身对于向联合声明挑衅的行为放任不管。而且，他们还以这个“日台恳谈会”为基础，由自民党的三十多名国会议员于七月成立了法西斯行动队的组织“青岚会”。这个反动组织否定田中内阁所取得的日中复交的成果，阻挠和破坏正在进行的缔结日中航空协定的谈判。协会在全国发动了促进缔结日中航空协定的运动，同时还通过《日本与中国》，对“日台恳谈会”和“青岚会”进行了揭露。

在“日台恳谈会”和“青岚会”拼命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中，《产经新闻》在新闻界公然打出了“两个中国”的旗号。这家报纸一直让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中国驱逐出境的特派记者柴田穗等人大肆攻击文化大革命；从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又开始连载题为《蒋介石秘录——日中关系八十年的证言》的长篇文章。这篇连载是由佐藤内阁时代成立的所谓“日华协力委员

① 滩尾弘吉，一九〇九年出生于广岛县，东京大学毕业，自民党内的亲台分子，国会议员，曾任县知事、内务省次官、文部大臣、厚生大臣及自民党的总务会长等。

——译者注

② 一九七三年七月成立，由自民党内“鹰派”少壮国会议员所组成的反动组织，反对日中友好。其主要成员还有渡边美智雄、石原慎太郎、中山正晖等人。——译者注

③ 指在台湾的蒋帮集团。——译者注

会”^①(会长石井光次郎^②)从中协助,并受到台北方面的全面支持,连原稿也是在台北写成的。不用说,其目的是在于宣传蒋帮才是现代中国正统的政权这一骗人的鬼话。一九七五年五月蒋介石一死,自民党的佐藤荣作、岸信介、滩尾弘吉等国会议员大批涌向台北去参加蒋介石的葬礼,一时甚至还出现了选派党代表参加葬礼的动向。一九七五年六月以来,亲台集团与蒋经国集团进一步勾结,接受了台湾方面赠送的重一吨半、高十五英尺的“孔子塑像”,并宣布了要把它安放在“汤岛圣堂”^③的计划。在这个“建立孔子塑像”的计划上联名作为发起人的,政界有岸信介、滩尾弘吉、福田赳夫等国会议员,新闻界有产经新闻鹿内董事长和内外新闻社经理长谷川才次^④等人,财界有经济团体联合会顾问堀越楨三^⑤、鹿岛建设公司董事长鹿岛守之助^⑥等人。这一切都暴露了他们搞“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是何等的顽固。对于这一系列策划“两个中国”的阴谋,协会总部每次都发起了抗议运动,同时还通过《日本与中国》,大力进行了推动舆论的工作。

要求缔结航空协定的斗争

日中邦交恢复使两国在各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起来。因此,开辟联结两国首都的定期航线,无可非议地是一项紧急而必要的

① 一九五七年四月成立的反共反华团体,通过所谓“民间代表”与蒋帮进行所谓的经济、文化交流,每年在东京和台北集会,一七七二年底停止了活动。——译者注

② 石井光次郎,一八八九年出生于福冈县,自民党内右派,担任过副总理、众议院议长、自民党干事长及日本体育协会会长等。——译者注

③ 位于东京文京区,是江户时代建立的孔庙。——译者注

④ 长谷川才次,一九一一年出生于青森县,东京大学毕业,曾任时事通讯社董事代表。——译者注

⑤ 堀越楨三,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兵库县,东京大学毕业,证券交易审议会长,曾任日本银行理事、经济安定本部副长官,“日台交流协会”会长等。——译者注

⑥ 鹿岛守之助,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兵库县,东京大学毕业,法学博士,前参议院议员,曾任拓殖大学教授、国务大臣。——译者注

任务。据说田中首相等访问中国时，双方首脑就一致同意把航空协定定为政府间具体事务协定的第一项。

尽管有过这样一致的意见，但田中内阁在长达十个月的时间竟为一种幻想所迷住，认为可以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来的日台航线，而把东京、北京之间的航线作为另外一条航线来开辟。一九七三年三月，日本政府的代表为谈判航空协定来到了北京，但这个代表团在怎样改变原日台航线性质的问题上，没有提出任何方针，就企图把新航空协定的谈判纳入轨道。

这说明日本政府是怎样随心所欲地解释日中联合声明中所达成的协议。当时人们都理解一向在通航的日台航线^①是根据日本把蒋帮当作“中华民国”来承认时所签定的协定而开辟的航线，印在“中华航空机”上的“青天白日旗”不是单纯的商业标记，而是表示国旗。甚至还承认了中华航空机不仅在台北、东京之间，而且可经过东京飞往北美的“以远权”。另外，飞往台北的日本航空机，也不单纯是民间公司的飞机。企图原封不动地保留这一切来新开辟东京、北京之间的航线——这种想法显然是与“两个中国”的阴谋一脉相通的，是违背日中联合声明的。对此，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于三月十日接见了日本记者，明确地指出：不改变日台航线，日中航空协定的谈判是不会进展的。日本政府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大平外相访问中国之前，一直没有积极采取打开局面的对策。

对于航空协定谈判的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日中友好力量发

^① 关于日台航线，自国民党内的亲台势力自一九七四年以来就同台湾方面进行谈判。一九七五年七月九日，正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难于进展时，日本方面的“交流协会”与台湾的“亚东协会”作为民间的协议，在台北签订了重开日台航线的协定。这个协定本身虽然没有把台湾当作一个国家来承认，但是，三木内阁一方面进行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同时又通过亲台派秘密地进行日台航线的谈判；而且在此期间，宫泽外相于七月一日发表了国会答辩，修正一九七四年四月大平外相的谈话，向蒋经国集团献媚，这是背叛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行为，正引起人们的重视。——原注

动了复交后的首次群众运动，要求日本政府立即缔结航空协定。协会一九七三年度代表大会的特别决议之一，就是决定要促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及航空协定等各项具体业务协定。九月十三日，协会主持召开了“各界人士要求早日缔结日中航空等项协定大会”。接着，九月底至十月上旬，在全国举行了纪念恢复邦交一周年的集会和招待会，呼吁一定要促进航空协定的缔结。在此前后，各地的地方议会也都作出了要求立即缔结航空协定的决议。尤其是富山县，县下面的三十六个地方议会中，有三十二个议会在复交一周年前通过了促进缔结航空协定的决议。大平外相于一九七四年一月访问中国，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这虽然是签定航空协定的一个转折点，但当时国民自下而上的运动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大平外相访问中国后，田中内阁于一月十七日以“外务、运输两省提案”的形式，拟定了修改日台航线的草案。但是这个草案一发表，就遭到了“日台恳谈会”和“青岚会”的激烈反对，他们把矛头对准了田中、大平的外交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协会倡议召开“立即签订航空协定、彻底贯彻日中联合声明三·三〇中央集会”，要求各友好团体踊跃参加，并成立了执行委员会。以劳动人民为中心，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五百人参加了集会。在集会上所做的主要报告，把矛头都对准了“青岚会”及其后面的势力，而没有指向田中内阁。这里体现了复交后友好运动的一个方向。这样，国民所强烈要求缔结的日中航空协定，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拖延，但四月二十日终于在北京正式签了字。同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庆祝日中恢复邦交二周年之际，从东京和北京分别飞出了日本航空公司和中国民航的首航班机。

波澜壮阔的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运动

由于一度成为悬案的日中航空协定达成了协议，谈判剩下的

两项具体业务协定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条件，应当说更加具备了。关于渔业协定，由于民间协定到一九七四年六月期满，因而一九七四年四月中旬在北京开始重新谈判。但日本政府拒绝承认民间协定所承认的中国的“军事警戒海域”；另外还以所谓“公海自由”为理由，反对中国方面所强调的保护东海、黄海资源等项意见，因而使谈判于六月二十日中断^①。另一方面，于一九七四年七月开始的关于海运协定的谈判，于七月底也曾一度中断，但十月二十一日又在北京恢复了谈判，十一月二日在北京进行草签，十一月十三日在东京正式签了字。

日本的日中友好力量的共同愿望是，不等具体业务协定缔结完毕，要提前尽快地开始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一九七四年八月，公明党的竹入委员长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有藤山爱一郎会长和胜间田清一^②团长等人）分别访问了中国，向中国方面表达了在具体业务协定缔结完毕之前就应该进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愿望。中国方面也表示赞同这一意见。特别是邓小平副总理于十月三日会见为庆祝中国国庆节而访华的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代表团（团长黑田寿男）、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团长中岛健藏）时指出：“不管怎样说，我认为和平友好条约是最重要的”，“如钓鱼岛（尖阁列岛）问题，可以暂时搁起来”。这表明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保证日中两国世代友好的条约更甚于个别遗留下来的领土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为签订海运协定于十一月来日本时，主要就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以及和平友好条

^① 以后又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重开了渔业协定谈判，到六月二十一日，日方实质上表示尊重“军事警戒线”，双方达成协议，八月十五日签字。——原注

^② 胜间田清一，一九〇九年出生于静冈县，京都大学毕业，社会党国会议员，担任过社会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等。——译者注

约等问题，同日本东乡外务次官^①进行了商谈。双方把这次会谈看作是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第一次预备会谈，并一致同意继续进行这种会谈。

可是，第一次预备会谈后不久，十一月二十六日田中内阁辞职，十二月九日成立了以三木武夫为首的内阁。由于三木内阁的成立，作为田中内阁核心的田中、大平派失掉了主流派的地位，福田、中曾根、三木这三派取得了主流派的地位，可以称之为岸、佐藤时代直系的福田就任了副总理。此外，在自民党的领导机关里，同台湾帮及南朝鲜帮有密切联系的椎名^②当上了副总裁，“日台恳谈会”会长滩尾弘吉担任了总务会长，在福田派内部以鹰派著称的松野赖三^③担任了政调会长。尽管三木首相本人曾在复交前夕访问中国并表示过对邦交正常化的热情，但从执政党领导机关的组成看，清楚地表明了亲台、亲南朝鲜势力卷土重来，而三木首相就是带着这种“脚镣”，在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施政演说中（十二月十四日）表示：“希望促进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新内阁的领导下，一月十六日由东乡外务次官和驻日大使陈楚再次开始了第二次预备谈判。据说这次会谈就以下两点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即将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是保障两国将来走友好道路的向前看的条约；条约的内容以日中联合声明为基础。可是在接着进行的二月十四日第三次预备谈判中，当中国方面主张应该把日中联合声明第七项不谋求霸权、不允许霸权这一条款写进条约草案时，日本方面立即表

① 东乡文彦，一九一五年出生于鹿儿岛县，东京大学毕业后入外务省，曾任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驻纽约总领事、美国局长和内阁官房审议官等。——译者注

② 椎名悦三郎，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岩手县，日本侵华期间，曾在岸信介手下担任过伪满洲国的产业部矿工司长等。战后历任内阁官房长官、通产大臣、外务大臣以及自民党的政调会长、总务会长和副总裁等。——译者注

③ 松野赖三，一九一七年出生于熊本县，庆应大学毕业，战后历任劳动大臣、农林大臣、防卫厅长官以及自民党政调会长等。——译者注

示反对。从此以后，围绕着霸权条款的问题，谈判不断地遇到障碍，一直到六月底，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协会一九七三年度代表大会所提出的当前活动的第一个重点是“敦促遵守日中联合声明，促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活动”。一九七四年五月召开的年度代表大会决定的运动方针，又再次把这项政治任务作为首要的“活动重点”。于是在航空协定达成协议和上述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及各在野党开始对政府进行敦促活动的同时，协会总部与前年担任欢迎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起人的二十位各界人士协商，于十月十五日由大内兵卫^①、藤山爱一郎等二十位著名人士发表《告国民书》。同时，各友好团体支持二十位先生的呼吁书，成立了国民联合筹备会发起人会，作为全国开展运动的核心组织，并以此组织为中心，征集全国著名人士的支持签名。此外还在各阶层召开了促进缔结条约的集会和地方集会；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建立以促进缔结条约为目的的县民联合组织或市民联合组织的活动。截至一九七五年一月底止，各界著名人士的签名已达二千人。当时恰好是田中内阁的末期，在野党和工会都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内政问题上，所以协会的全国组织事实上就站在运动的前列，积极发挥作用。

由于上述原因，原定由各团体于十一月联合召开的中央集会未能如期举行。十二月八日，协会中央总部主持在东京召开了中央集会。出席这次集会的有来自全国的协会会员以及各界各阶层的代表约二千三百人，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在这次集会之前，先后召开了青年、妇女、文化、医疗、日中贸易有关人士等各阶层的集会。从十月份开始，《日本与中国》报道了各界著名人士支持大内、

^① 大内兵卫，一八八八年出生于兵库县，东京大学毕业，经济学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法政大学校长，著有《日本财政论》、《财政学大纲》、《经济学散步》等。——译者注

藤山等二十人的呼吁书的决心，并在十月二十一日发行了题为《答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十二问》的特刊，其发行量比平时多一倍，以后又印成小册子，普及到全国。

三木内阁上台后，日本政府在第三次预备谈判中（二月十四日）对霸权条款进行无理阻挠以来，谈判陷入了严重的僵局，民间促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运动不得不担负起更加艰巨的任务。这个时期的特点之一是，三木内阁表面上装出希望谈判能得到妥协解决的姿态，但实际上却顽固地拒绝把日中联合声明中已经取得一致意见的霸权条款写进条约中去。另一个特点是，自一九七五年二月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进入正式谈判以后，苏联政府开始公然表示反对，逼迫日本政府在日中友好或日苏亲近之间作出选择。二月四日以后，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访问了自民党副总裁椎名悦三郎等人，竟提出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会给日苏关系带来不良影响。此后，苏联的宣传机构又宣传中国所主张的反对霸权，完全是敌视苏联的，是要日本和苏联对立的。而且日本外交界和新闻界的大部分人接受了苏联的这种观点。新闻界由《产经新闻》和《朝日新闻》领头提出“不要卷入中苏对立”的口号，对“霸权条款”提出异议，对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泼冷水。另外在野党的“日共”宫本集团也叫嚷反对“霸权条款”^①。六月十七日，苏联政府发表了所谓《对日本政府的声明》，再次攻击“霸权条款”是“极端敌

^① 自和平友好条约进入正式谈判的阶段以来，“日本共产党”宫本集团自我暴露了它是最反对霸权条款的另一股势力。他们在四月二十五日的《赤旗》报上发表了他们的“基本见解”，接着又在五月二十七日的《赤旗》报上发表了未署名的长篇论文《论关于和平友好条约的霸权问题》，攻击中国关于霸权条款的立场。他们反对的论点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要反对霸权，首先必须要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亚洲的侵略和对日本的统治，但中国的主张并非如此。第二、中国所主张的“反霸权”是集中反对苏联，并要求日本赞同中国的对苏政策。第三、中国共产党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歌颂文化大革命”、“唯武装斗争论”强加给日本的民主运动，这才是“道道地地的大国主义的霸权主义”。

视苏联的条款”，对日本的外交进行更加赤裸裸的干涉。对于日本政府和苏联的这些活动，中国方面一贯主张和平友好条约中的规定不许从日中联合声明中倒退，要求把联合声明第七项规定全文写进和平友好条约的正文。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不能退让的一条界线。

不消说，“反对霸权”这一口号，对多年来深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亚洲人民来说是极其自然的要求。只有理解和尊重这一要求，日本才能向第三世界各国的政府和人民伸出友谊之手。但是，日本政府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踏上同亚洲、同中国友好的道路呢？！日中复交以来，特别是一九七五年印度支那形势取得了进展以来，从整体来看，围绕日中关系的亚洲形势一直在前进，并没有后退。尽管如此，要使日本政府严格遵守日中联合声明，要加深日中两国人民之间真正的了解和团结，还有很多必须逐个加以解决的问题。

《赤旗》报在这里提出的观点，都不是为了“论争”，而是诽谤。第一、中国一贯援助印度支那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并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说中国不同美国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作斗争，那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第二、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中，中国认为苏联的霸权主义比美国的霸权主义更加危险，这是对全世界人民的忠告；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根本不是要把日本拉进反苏同盟。第三、中国共产党批判过“日共”对毛泽东思想及文化大革命的诽谤，但决没有利用权力进行过干涉；批判修正主义与“大国霸权主义”是毫不相干的两回事。宫本集团对反对霸权条款所持的这种态度，再一次暴露了他们已经完全堕落为反华的修正主义。——原注

结束语——“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回顾日中友好运动二十五年的历史，什么是最令人心情激动的事情呢？不是别的，那就是不知有多少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在日中友好这个共同的目标下团结起来，不断地扩大友好范围，同阻挠和破坏友好的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二十五年前，当运动刚刚开始时，谁都知道有无数阻挠日中关系改善的障碍；不论是日中友好还是日中贸易，谁都知道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来自阻挠和破坏势力的沉重压迫。那时日本还处于美国军队占领下，美军把日本看成是“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

尽管如此，由一个小小的组织所发起的友好运动，从一开始就没有停止过前进的步伐。它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发起的攻击，不断地扩大友好运动的影响。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从精神上鼓舞这些“掘井人”呢？第一是在日本国民中深深地扎根的、要求同中国友好的真挚感情。这种感情出自日本国民因未能阻止过去的侵华战争而产生的反省，并进一步在历史和地理上加深日中两国人民不可分离的内心联系。其次是新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国民真诚友好的呼吁所激发出来的感动和共鸣。不论是当我们的运动尚处于幼年时期，还是在日本政府顽固地否认新中国存在的时期，这种友好的呼吁始终没有间断过，深深地感动了日本国民的心灵。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中友好运动从它开始的那一天起，就是日本国民自发和自主的运动，同时也是日中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特别是从一九五三年援助旅华日侨归国，把严密的“遏制政策”打开了缺口以来，乃使参加运动的人们愈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当我们在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和开展运动的时候，我们选择了根据各阶层国民的要求而开展运动的道路。也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友好运动一开始就提出了促进贸易发展的问題。同时还积极地进行援助旅华日侨回国、探亲以及悼念在战争期间牺牲的中国人、送还遗骨等项工作。另外还以各个支部为单位，组织了放映中国电影、介绍中国情况的讲座和学习中国語等等活动。之后，又在全国各地组织中国物产展览。协会在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时，始终强调要满足国民多种多样要求的运动方针。而且把这一方针正确地同阻挠友好的势力进行斗争结合起来。这也是在二十五年友好运动史中一贯的原则。

我们协会历来有意识地贯彻这一原则。促进贸易的运动和其它领域里的运动，也充分地运用了这个原则。促进贸易的专业团体——初期的日中贸易促进会议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在开展促进贸易的协助工作时，不断地同阻挠友好和贸易的行为作斗争。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组织文化和体育交流活动时，也把反对和揭露“两个中国”的阴谋作为促进交流的原则。尽管由于团体成员的特点不同，开展运动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但整个日中友好运动始终是一方面促进相互了解和友好交流，另一方面同妨碍友好的势力作斗争，而且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又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

当然，复交前的友好运动不能不把很多精力放在同妨碍友好行为作斗争上，所以不可避免地会把很多希望日中友好、但又不接近友好运动的人放在一边。所以在复交后，提出的运动的重大任务之一是同“新朋友”进行接触和合作。但是，那些认为复交后同妨碍友好的势力进行斗争没有必要了，友好运动的“团体组织”不需要了，等等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现在，连“反对霸权”这一在日中联合声明中公开保证过的原则，也不能顺利地写进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而且苏联公然对这个问题进行干涉，“日共”宫本集团也

拼命反对；而且在政界和财界依然存在着残余的亲台势力。鉴于这些事实，显然同阻挠和破坏势力作斗争仍然是友好运动的一项巨大任务。

日中恢复邦交具有历史性意义。但是复交后，在日本国内外仍然不断出现阻挠和破坏日中友好的阴谋活动。这就表明日本国民的友好运动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加以巩固和发展。当然，友好运动的存在不仅是因为存在着阻挠和破坏友好势力；从根本上说，还由于日中友好是亚洲和平和两国繁荣的关键，是日本国民的强烈要求；所以才需要有这个运动。而且在近代一直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理解还非常有限；友好的气氛虽很浓厚，但理解还很薄弱。而日本政府是不会为我们来弥补这个缺陷的。即使在邦交恢复以后，教科书里出现的中国形象，同复交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又在不断前进；彼此的社会制度又有很大差别。如果不能了解前进中的中国的特点和成果，那就可能产生新的隔阂。为了突破这些障碍，只有不断地加强民间的友好运动，世世代代的友好才能得到保证。

日中恢复邦交时，制定了中日联合声明这一极其重要的两国的共同纲领。可是，这个共同纲领如果听凭政府去安排，实际上是不能成为共同纲领来发挥其作用的。从最近两年半以来的事实看，我们是深有体会的。就在写这部《日中友好运动史》时，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还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当然，即使再花费些时间，和平友好条约终久是会缔结的。但是，要保证贯彻这个条约的精神，还必须有待日本国民的觉悟和理解。所以，日中友好运动还将在这方面发挥很大的作用。确实是“任重道远”！

根据这种对形势的认识，自一九七五年二月的常任理事会以来，协会的各级组织开展了“大学习运动”，进行总结、自我批评和

学习。这个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对照日中复交后的新形势，正视本协会组织发展上明显落后的现实，并把协会进一步发展成为适应新形势要求的组织。因此，我们在运动中号召，全体会员重新认识扩大组织的重要性，同时对于协会内部存在的妨碍扩大组织的问题，特别是不适应复交后形势的政策和作风，要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一九七五年五月的全国理事会上就确认了这次运动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正在继续开展大学习运动，争取组织能获得飞跃的发展。

通过二十五年的亲身体会，我们对日中友好运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由衷的高兴。同时也认识到取得的成果虽然巨大，但仍然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我们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要向下一个四分之一世纪迈出新步伐。

第二部分

二十五年友好的回忆

第一批春燕

——回忆访问新中国的日子

帆足计

“有朋自远方来”

二十三年前，即新中国诞生两年多以后的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年）五月，我和高良富女士、宫腰喜助先生一行是战后第一批访问新中国的日本国民。

在那年的前一年年底，“莫斯科世界经济会议”给石桥湛山、村田省藏、北村德太郎、帆足计等人发出邀请书。此外，我们征求了加纳久朗、高崎达之助、鲇川义介、和田博雄等长辈们的同意参加，创建了“世界经济恳谈会”，由我担任干事。对“经团联”方面的牵制，则委托给川濑一贯先生。就这样进行了筹备工作。但当时正处在美军占领之下，又正值朝鲜战争期间，煞费苦心才好容易抵制了外务省的刁难。于是高良女士捷足先登，飞往巴黎，而宫腰君和我则途经丹麦和芬兰，前往莫斯科，那时已是初春四月了。

雷任民先生早已在莫斯科。在他的敦促下，我们三人经乌兰巴托，于五月中旬抵达北京。

前来欢迎的有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冀朝鼎博士。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温暖的话，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旋。

第二天就进入了准备贸易谈判的日程。高良女士作为女性，主要是以和平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当时召开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

会议的筹备会。我一向在“经团联”工作，所以任贸易代表；当时是改进党^①党员的宫腰君为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代表，我们共同负责贸易协定的准备工作。对方担当筹备工作的是冀朝鼎博士和倪慰庭先生。中国方面负责接待我们的干部是肖向前、孙平化两位先生。我们的秘书是中尾和夫君。

当时由于有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和巴黎统筹委员会片面阻挠这一情况，所以决定从平等互利的立场出发，把贸易品种分为甲乙丙三类，进出口商品分别按其重要程度，规定为互相对等的比率。不过，为了满足日本方面代表的迫切要求，中国方面同意给以若干的伸缩性，结果签订了进出口总额为六千万英镑的第一次日中贸易协定。

对新生的新中国难忘的印象

之后，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参观，尤其难忘的是在长江乘轮船溯江而上，访问沙市，参观了荆江分洪的水利工程。中国向来认为治水就是治理天下，新中国把最初的建设重点放在水利上，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仅是革命后两年多时间，据说已经构筑的堤坝就可以环绕地球数周。

在那里看到了三十万人——七万解放军和二十三万民工——团结一致，满怀着希望与喜悦的心情，投身于水利事业的情景。工地上锣鼓喧天，胡琴声悠扬，简直象一片节日的景象。当时在东北已经开始使用机械，而长江两岸还未看到有卡车。他们每人一个筐、一把锹，说这是“肉搏战”也好，“人海战术”也好，但这一惊人的情景简直就象“蚁群在战斗”。由于酷暑，他们戴着柳条编的帽子，帽檐上写着“努力生产”、“抗美援朝”、“努力学习”、“消灭细菌”等

^① 一九五二年旧国民民主党改称为改进党，一九五五年合并入现在的自民党。——译者注

口号，这一切都好似象征着当时中国青年的意气风发的精神。

尤其使人深受感动的是，当时接触到解放军的作风。在长江上游沙市附近的一个工地上，我们访问了三十万劳动大军的总指挥唐天际将军。在一个山丘上的帐篷前，坐着一个脸孔被太阳晒得黝黑的人，我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或者是一个提茶倒水的人，而他却跟我打招呼说：“我叫唐天际。你们是日本来的贵宾吧？”经过一番谈话之后，知道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将军。但是他的寒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他的谦虚的态度赢得了我的好感。

从他的谈话中了解，解放军中没有元帅，不发勋章，也没有什么大将、中将，团长、师长统统称作干部。在工地照管士兵的队长也称作班长、连长。他们关心士兵的生活，问士兵是否拉肚子、感冒，住的吃的也完全和士兵一样。也有年轻的女兵，穿着黄褐色的裙子和白衬衣，肤色健康光润，短头发，戴着军帽，真是英姿飒爽。她们主要是从事教育、卫生、文化方面的工作。

解放军是毛泽东主席亲自缔造的朴素、勇敢、纪律严明的军队。他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人民服务，受到人民的热爱。他们不仅搞军事，而且协助农民播种、收割以及进行教育、卫生和文化工作。丝毫没有和人民群众对立的坏作风。

当时革命胜利仅仅两年多，曾经闻名一时的旧中国的妓女、流浪儿以及乱七八糟的麻将牌声统统都没有了，甚至连苍蝇也看不见了。一直到遥远的上游长沙附近，我亲眼看到夜不闭户的情景，使我深受感动。不过我回国之后许多人听我谈起这些事，都表示很难相信，弄得我不知怎么解释好。那时还看了很多戏，如其中的《王贵与李香香》以及电影《白毛女》，都打动着我的心弦。临回来时，要求把《白毛女》送给了我们。令人高兴的是，后来松山夫妇^①

① 即日本著名的芭蕾舞家松山树子和清水正夫。——译者注

亲自把它改编成芭蕾舞剧。此外，在参观“朝鲜战争中美国细菌战展览会”的那天晚上，看到装在密封器中遍身带鼠疫菌和霍乱菌的昆虫，至今仍难忘记当时象被恶梦魔住似的可怕的情景。

谁也不能阻挡春天的来临

还记得在临回国的时候，我曾给北京饭店写过一句诗：“谁也不能阻挡春天的来临！”过去我们三个人曾经战战兢兢地从独木桥上渡过的溪谷，今天已“有如黄河之水”，滚滚流入和平的大海。我感到“春天确实即将来临！”忆往昔，真是感慨万分！道路不是自然存在的。记得廖承志先生讲过的一句话：路“是由很多人走出来的”。回想起过去共同合作过的先辈以及很多有名和无名的和平朋友，确实不能不使人为之感慨！

特别是当时的“日中友好协会”，早在新中国政府成立的前夕就已经筹备就绪，伊藤武雄、宫崎世民、岛田政雄、长谷川敏三等各位先生的活动尤为突出。到我出国的时候，令人担心的是：小泽正元先生因从事日中友好运动而遭到驻日美军的起诉，正在大阪的牢窗边呻吟；“日中贸易促进会”的铃木一雄君正在贫困中坚持恶战苦斗；石江宗明君留在“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里担任事务局长，正在进行拼死的奋斗。

看来周恩来总理是把这些事情都放在心上的。他曾经说过：“新朋友固然很重要，但我们不能忘掉老朋友！”听了这些话，实在令人高兴，我感到我们也应有广阔的胸怀，我们不能忘记老朋友，对新朋友更要亲切地关怀。

我希望能把许许多多的朋友都团结起来，希望我们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广泛地在本国国民群众中深深地扎根。我正是怀着这样的愿望，谈一点当时的回忆。

（作者是前众议院议员）

回忆日侨归国问题的谈判

岛津忠承

序幕——北京的广播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一日，从北京广播里了解到中国关于旅华日侨归国问题的方针。第二天，日本红十字会赶快给中国红十字会发出了电报。日中友好协会、在华日本人的家属团体以及国会有关方面也一个接一个地给中国红十字会发了电报。最后指定三个团体组成代表团去中国协商。这三个团体除了有日中友好协会、和平联络会外，日本红十字会也荣幸地参加了进来。三团体的人们要我担任代表团的团长。

我想在回忆三团体代表团的往事之前，先谈谈日本红十字会在这之前的辛苦工作。

战后七年的焦急心情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战争结束。从第二天开始，日本红十字会就着手送还俘虏和被扣留者，以及调查去向不明的人的情况等战争善后处理工作。

从日本红十字会本身来说，它曾向中国的东北、华北地方派出过三百三十三名救护班人员（主要是女护士）。现在战争结束了，调查这些人的下落和解决他们的归国问题，就成了日本红十字会应当直接负责的问题。此外，它还收到了大批国内的家属希望帮助寻人和有关协助归国问题的请求。

当时日本红十字会曾通过日内瓦的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委托它帮助进行寻人的工作，但没有结果。一九四八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战后第一次红十字会的国际会议，当时由于日本正处在被占领之下，我以占领军总司令部观察员的技术顾问的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但当时的中国红十字会还处在旧中国时代，所以没有取得成果。

一九五〇年在蒙的卡罗^①召开国际红十字会协会理事会时，确定日本红十字会派正式代表出席，我怀着很大的期望来到了摩纳哥。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于一九四九年成立。红十字会的原则是一国一会，而且规定参加国的势力范围必须达到其国土的一半以上，因此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立即取消了中国旧政府系统的红十字会，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为中国唯一的红十字会。我到摩纳哥一看，中国红十字会派遣的以会长李德全为团长(团员有伍云甫、纪锋等先生)的代表团果然已出席了这次会议。我正等待着有一个谈话的机会，恰巧在一次只有首席代表出席的午餐会上，我偶然地和李德全女士在同一张桌子上对面而坐。李女士英语很好。我们的谈话从寒暄到聊家常，当我请求她了解一下三百三十三名日本红十字会救护班人员的下落时，李女士对我说：“我第一次听到这件事。这虽是旧政府时代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我回去后马上进行调查。我愿意按您的希望去努力。”

一九五二年夏，红十字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召开国际会议。中国红十字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根据会议主席的提议，一致通过关于促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离散家属团聚的决议。这使我产生了希望。后来，在那年的十二月一日听到北京电台的广播，我感到这一下终于能找到头绪了。

^① 摩纳哥的城市。——译者注

难忘的旅程

话再说回来。三团体代表团出发之前，为了统一思想，曾多次会聚在日本红十字会开会。几乎每次会议都要开到深夜，有时甚至是通宵达旦。

三个团体的代表共十三人，终于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出发了。日中友好协会派了内山完造先生、岩村三千夫先生和加岛敏雄先生参加了代表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在这以前我曾多次出国，通过国境有时是在飞机中，有时是在火车中睡觉的时候。然而这次于一月二十七日从香港到罗湖，然后过铁桥，朝中国国境深圳走去时，留下的印象是令人难忘的。内山先生他们一齐对我说：“团长在前面走！”当我领先往前走时，对面有位人民解放军的年青战士，他用流利的英语说：“把护照拿出来看看！”我们拿出了护照，并报了自己的名字，他看后就说：“请吧！”从那里向右边拐，沿着两侧有铁丝网的铁路走不多远，迎面来了两位穿人民服的中国人，其中有个人用流利的日语问道：“是代表团的贵宾吗？”我说了自己的名字后，他说：“我们是从北京来迎接你们的。”这个人就是吴学文先生。另一位是广东红十字会的人。

到达深圳车站，那里有很漂亮的建筑物。经过简单的护照检查之后，便招待我们到广东饭馆吃午饭。当天我们乘火车到广州。然后又乘火车到汉口，在那里等了六小时，乘船渡过长江后，就请我们到一家很大的旅馆休息。因为日本人喜欢洗澡，又领我们洗了澡。然后搭晚上的火车，在火车上过了几天几宿，于一月三十一日晚十一时到达北京，在北京车站迎接我们的有红十字会的伍云甫先生和纪锋先生，另外还有从维也纳来到北京的西园寺公一先生。后来，我们就住在北京饭店等待谈判。

在北京的日子

当时李德全会长有病，中国通知我们由廖承志先生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与我们谈判。可是谈判一直迟迟没有开始。我们认为可以暂不开全体会议，先表达一下日本方面的心情，于是决定由岩村三千夫先生当联络部长，请他进行预备性谈判。

谈判的内容首先是经费问题。我们希望中国方面承担归国人员从住地到港口的费用。中国方面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一要求。上船以后的费用当然由日本方面负担。

谈判期间参观了天坛、万寿山、故宫博物院、模范农村和动物园等。我当时兼任结核预防会的会长，把一部十六毫米的影片《结核的生态》送给了李德全会长，因此又领我参观了北京的结核疗养所和结核研究所等单位，受到了各种款待。

谈判中最大的焦点是关于主管归国船的乘船代表问题。中国方面认为，从国际法上说，与日本政府仍然是处于战争状态，因此不能想象会有日本政府官员乘坐的船只进入中国的港口。我们希望日本就这个问题来电指示。当时在日本红十字会内设有三团体联络事务局，宫崎世民先生在那里坐镇。他接到电报后立即向政府交涉。交涉的情况，通过日本广播协会的新闻广播全部传到了北京。日本政府认为，内阁会议已经决定由政府职员乘船担当乘船代表，因此不能同意中国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下了应由三团体代表任乘船代表的决断，这个意见得到三团体的一致同意。于是我们决定回国后再向日本政府很好地解释，以取得谅解。于是签订了归国问题的公报。

在北京的四十天期间，吴学文先生搬进了饭店，和我们住在一起，一日三餐陪我们一起吃饭，非常细心周到地照料我们，甚至注意到我们对中国菜会不会吃腻了，把饭菜做得清淡些。

因为第一批归国船是在那年三月发出的，双方都认为三万人的归国八月份就可以结束。我们提议，归国问题于八月一结束，就邀请李德全会长和其他各位先生到日本访问，中国方面欣然表示同意。但实际做起来却存在着种种的问题，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才把李德全会长一行人请到了日本。每想到这就是日中友好交流的开始，真有无数的感慨！

从那时起到一九七二年九月日中恢复邦交，协会的各位先生确实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前年春天，廖承志先生作为复交后第一个使节团团长来到日本时，我在一次早餐会上终于见到了他。当我谈到曾如何盼望着这个日中能够恢复邦交、可以愉快欢迎他访日的日子时，廖承志先生说，我们彼此都把头发盼稀了、盼白了。我们俩都大笑起来。确实是这样，一九五三年谈判日侨归国问题时，我是五十岁，现在已经七十二岁了。

（作者是结核预防会会长、前日本红十字会会长）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 日本代表团访华始末

宫崎世民

令人感慨的崭新的十年

一九五九年秋，中国给“争取恢复日中邦交、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执行委员会”寄来了参加第十届国庆节的邀请信。以往的国庆节，都是由我们协会等两三个友好团体分别派遣庆祝代表团赴中国。而这一年，除我们协会外，中国方面还指名邀请了日本的几个团体，并要求把这些团体的代表集中组成一个三十人的代表团。因此，执行委员会接到邀请信后，立即召开了有关团体的会议，着手组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国庆节的日本代表团。在我的记忆中，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有：片山哲先生等七、八名社会党国会议员，私营铁路工会总联合会委员长本多正登先生等几位工人代表，经济界的小畑忠良先生和村山佐太郎先生，文化界的白石凡^①先生（朝日新闻记者）和田畑忍先生（同志社大学教授），另外还有山川菊荣^②女士和前川杜美江女士等妇女代表。日中友好协会推选我为这个团的一名成员。团的干部，推选了片山先生为团长，本多、小畑、白石三位先生为副团长。接近片山先生的加藤信一先生

① 白石凡，一八九八年出生于山口县，京都大学毕业，评论家，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常任理事，亚非作家会议日本委员会委员，曾多次来我国访问。——译者注

② 山川菊荣，一八九〇年出生于东京，女子英语学塾毕业，妇女活动家。——译者注

(会计师)是担任团的秘书长或是片山团长的秘书,我已记不清了。

一九五九年,是世界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年。

国庆节前夕,很多国家的元首或领导人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尤其是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胡志明主席,他那令人感到十分亲切的容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苏联的赫鲁晓夫总书记也出席了宴会并讲了话。后来我才知道,就在这一年,他单方面撕毁了和中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并捧着这个礼物到美国访问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他正是在散布了这种美苏调和的“戴维营精神”回国之后不久而来到中国的。他在宴会席上讲话的内容,由于语言的关系,当时我虽然不懂,但至今我还记得,他讲话时的神情一反他平常那种独特的嚣张气焰,而有点萎靡不振的样子。

这次是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的国庆节。对新中国来说,建国以来的十年,的确是多灾多难的岁月。建国后不久的朝鲜战争、美帝国主义蛮横的遏制政策、一九五九年开始的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撤销全部工业技术援助等,给新中国造成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解放了的六亿人民团结一致,一面与这些困难作斗争,同时艰苦奋斗,使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政治、思想领域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打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基本上改造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普及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获得了成效。

记得中国有一位干部极其感慨地低声跟我说:“十年前,在几亿中国人民中,恐怕没有几个人会预想到今天中国的样子啊!”

发表共同声明的经过

有一天,代表团在住宿的北京饭店召开了一次会议。据报告人说,团长、副团长等人和周总理举行了会谈,代表团打算以这次会谈的内容为基础,和中国的有关团体发表共同声明。我感到非

常吃惊。因为代表团从日本出发之前，只举行了一次完全是形式的代表团组成仪式（只是大家见见面）；当时还根据某些人的提议，特别商定到中国去不搞共同声明。不仅如此，另外还有这样一段经过：当时我认为这样做不够妥当，因此就拉住一位副团长，向他提出建议说，即使我们这方不提议搞共同声明，但中国方面可能提出建议，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很难拒绝；但我们这个代表团是来自各种不同岗位的人，彼此之间的思想也很不了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不好办了，所以希望旅途中尽量多开些会，以作万一的准备。可是那位副团长只是含含糊糊地不做明确的回答，以后我的建议也就完全被忽视了。

这些姑且不说了。代表团会议同意了团长、副团长的提议，并同意由团长、副团长等人负责和中国方面协商关于共同声明的内容。

同中国方面第一轮会谈结束后，代表团召开了会议。据报告人说：日本方面首先提出了草案，其中有一项内容，希望中国方面能向日本派出象宋庆龄女士那样在日本有影响的人物，以声援日本人民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但中国方面对此表示不能赞同；接着提议就中国方面的草案进行讨论。但日本方面又担心中国方面会不会把难以接受的方案强加给自己，因此表现出有些畏缩。于是一位副团长就问坐在旁边的廖承志先生说，假如取消共同声明，恐怕不大好吧！廖承志先生回答说：那样的话，你们要负完全责任。我听了这段经过后，认为这样做是不妥当的。因此我建议说，尽管是以中国方面的方案为基础进行讨论，中国方面也不会把他们的方案原封不动地强加给我们；日本方面如有意见，可以毫无顾虑地提出来；在目前情况下，取消共同声明是不合适的，应当以中国方案为基础继续进行讨论。当时恰好关于日中渔业的民间协定已经失效，在东海、黄海上进行捕鱼作业的渔船遇险紧急避难问

题无法解决。因此我和村山佐太郎先生（日中渔业协议会常务委员）进行了商量，建议在与中国方面接触的基础上，把争取解决紧急避难的条款写进这个共同声明。在经过若干说明之后，代表团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以后在日中双方的会谈中很容易地达成了协议。于是共同声明顺利地签了字。这个共同声明打开了日中双方的渔船紧急避难的途径。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回国以后，有些人却说未与“我们当地人”商量就作出这样的决定，真是岂有此理，喋喋不休地对我进行攻击。

打开对话的窗口

那个时期，我们的友好运动是在我国政府推行反华政策下开展的，现在想起来确实是充满了困难。当时既没有象现在这样不断从中国派来的各种代表团或访日团体，也很少有电影等宣传资料，至于象体育、文艺之类的团体访问日本就更少了。我们的日常活动几乎全是依靠文件或口头来进行宣传的。记得有的活动家曾感叹地说：“这简直就象没有锄头、镐而用双手种地一样。”而且，偶尔从中国传来了重要的消息，那也是依靠其他团体或某个个人的途径。我们协会只不过是依赖别人转来的第二手材料。我想无论如何也要改变这种状况，因此要求与对外文化协会商谈一下。会谈时中国方面有阳翰笙、杨春松几位先生出席，日本方面正值协会的常任理事长谷川敏三因内山完造副会长逝世而呆在北京，于是就请他和我两人共同出席了会谈。当时我那么毫无顾忌地谈了许多话，现在想起来还感到要捏一把冷汗。特别是因为那年的协会代表大会（第九次）决定要由协会向中国派出渔业工人代表团，为执行这一决定，我在这次会谈中提出了这项建议。可是，对方是对外文化协会，对提出渔业问题肯定会感到很突然。阳翰笙先生显得有点迷惑不解的样子。我未等他回答就抢先说：“过去日本有

各种工人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唯独渔业工人还没有访问过中国。不仅如此，以西^①拖网渔业工人在作业时，由于侵犯了贵国的领海或禁区等原因，严重的往往被贵国扣上间谍行为的罪名，加以逮捕或扣押。贵国是工人阶级的国家，把邻国的工人当作罪犯进行逮捕，这恐怕不一定是出于本意。假如把这些工人作为朋友来接待，让他们了解贵国的情况和政策，加深友好，那么今后把他们当作罪犯进行逮捕并扣押的事件就会逐渐减少了。”阳翰笙先生体谅了我的意思，他猛地站起来说：“你说的很坦率，你的话我明白了。”

毛主席的接见

因为共同声明的问题，代表团在北京好几天没有安排正式日程就过去了。在此期间，松村谦三先生一行人，携同几位记者从日本来到北京。代表团员中有人希望早日离开北京，因此一部分人去了天津。我们留下来的人，包括片山团长在内，有一天晚上正在看剧时，接到紧急通知，幸运地获得受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毛主席和我握了手，仅仅交谈了一两句话，但这是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后的一次了。回来时，天下着小雨，毛主席站在正门的台阶上，打着伞一直看着我们上了车。毛主席的样子，我至今也难以忘怀。

别要我唱歌

在中国逗留的日程接近结束时，代表团分为两组，包括团长在内的老人组出发到西南去旅行。我那时虽然还不算是老人，但也参加了这个组。从西安到重庆，从重庆乘小轮船顺长江而下，途经有名的三峡。船一到三峡，我们一连好几个小时被那壮丽的景色

① 参看第40页。——译者注

迷住了。可是过了三峡，长江的水流就缓慢起来，旅途也渐渐地感到无聊了。为了排遣寂寞，在船上举行了文艺演出会。同行的金苏城和白土吾夫^①二位先生来到我的船仓里说，代表团成员都参加演出会，谁都必须唱个歌。我说，对不起，别叫我唱了吧！两位先生不答应。于是我说，硬要我唱，我就跳长江。两位先生对我的“威胁”吃了一惊，跟我解释说，因为你唱歌唱得好，才请你参加演出会的呀。船在江中顺流而下，我们在船上举行的文艺演出确实非常愉快。

也许是这件事被传开了吧，打那以后，令我高兴的是，在酒会等场合再没有人硬要我唱歌了。以上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我的记忆也可能有错误的地方，这一点希望能原谅。

〔作者是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理事长〕

^① 白土吾夫现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译者注

回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和 “备忘录贸易”——怀念松村、 高碕先生

冈崎嘉平太

我的长期梦想

我在学生时期，曾和许多中国留学生交往过，知道了中国和亚洲国家的许多情况，了解到除了日本以外，亚洲的国家和民族都已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剧烈的痛苦中挣扎着。在这样的亚洲，日本以唯一的独立国家而傲视亚洲各国。我担心日本这样下去是不能保持长久繁荣的，将来总有一天要被邻国所抛弃。我越来越感到日本必须改变态度，要和亚洲各国、特别是要和中国携手合作，帮助亚洲各国独立，提高他们被摧残的文化，消除他们的贫困。

可是从那时开始，日本所走的道路却完全与此背道而驰，终于发生了满洲事变^①、日中事变^②和“大东亚战争”，到一九四五年战败后，才不得被迫扭转方向。不过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样的结局反而使得与中国的合作容易了，有利于日本民族的发展。但是，不久中国成了共产主义国家，我感到这样一来与中国的合作就困难了，于是再度产生了悲观情绪，对我长期梦寐以求的日中合作也感到绝望了。可是又一想，还未对中国进行研究就感到绝望，这不是男子汉应有的气概；能不能合作，应当在经过证实之后才能下结论。经过这样思考之后，说起来也奇怪，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有

① 即“九一八事变”。——译者注

② 即“七七事变”。——译者注

了。在我受到风见章先生的知遇，并得到他教诲的期间，他劝我组织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于是我决心以此为立足点来对中国进行研究。一九五四年我作为发起人之一，建立了协会，并请村田省藏先生为会长，这样就逐渐增多了和新中国人士接触的机会。后来村田会长逝世，第二任会长是山本熊一先生。但由于在协会管理工作方面意见不一致，我离开了协会。在短暂的探索的过程中，遇到了松村谦三先生，使我又重新走上了研究中国的道路。有一次松村先生跟我说，研究中国必须要随时与中国人交谈，应当能够经常到中国去，并要我提出一点办法来。当时以商社为中心的友好贸易还刚刚开始，仅靠这种贸易很不方便。因此，我想把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密切，并认为应当缔结长期协定的制造商和销售公司组织起来，和中国方面缔结基本合同，把它们的贸易事务委托给商社，这样，和中国往来的机会就会自然增多起来。这样的想法终于导致缔结了后面将要谈到的备忘录贸易协定。

松村访华，打开了备忘录贸易的渠道

一九六二年六月末，我向池田总理提出了一项建议。这项建议的主要内容是成套设备问题。成套设备不仅仅是出口的重要问题，要安装成套设备，我国的很多技术人员就要到中国去，长期和中国技术人员在同一个车间里一起劳动，这必然会有利于改善因我国多年侵略而使对方受到损害的对日感情。我重点想的是这个问题，因此无论如何要使它成功。

向中国方面出口成套设备，当时不能使用进出口银行的分期偿还贷款的办法，但同年三月间，我在报上看到佐藤（荣作）通产相（不久改为福田一^①先生）声明的报道，说如果有第三国保证付款，

^① 福田一，一九〇二年出生于福井县，东京大学毕业，担任过通产大臣、自治大臣、国家公安委员长、法务大臣等。——译者注

也可以批准按分期付款的办法对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我感到取得第三国的保证是困难的,但如果仅就保证付款来说,由人来保证也未尝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方面请廖承志先生、日本方面请松村谦三先生来保证,就完全可以了。我把这个想法写进了建议里。但我想如果把上边的想法事先告诉松村先生,也许会遭到他的拒绝,所以没有跟他说。七月末,黑金^①官房长官对记者发表了谈话,说在日中贸易问题上有一个冈崎的设想方案。这一来,我就不能不对松村先生说了,因此在某一天去拜访他时,讲了关于保证的事。一向和颜悦色的松村先生,这次却一反常态,严厉地斥责我说:“冈崎,那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冈崎,你也知道,我搞了五十年政治,五十年一次也没有和营利的发生过关系。怎么能把我和这种营利的事拉上关系呢?绝对不能同意!”他的斥责使我大吃一惊。但是我还是衷心地敬佩他,感到松村先生确实了不起。我说:“可是,要不请您帮忙,出口成套设备就办不成啊!”他回答说:“不!那是另外的问题。”结果那天就这么不欢而散了。尽管说是不欢而散,但在我的心中还是象吹过一阵清风似地感到十分畅快。(关于保证问题,是这样解决的,即在签订具体的业务协定时,对进口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出具一件不能取消保证按期付款的信用状。)

此后不久,黑金先生来通知说,愿意按我的那个方案办。九月,松村先生决定访华,并同意带着这个方案去和周总商量谈。九月十九日,松村先生和周总理之间确定:要铺设一条政治路线,即日本与中国尽管政治制度不同,但可以用积累的方式来促进日中关系正常化,至于具体的业务协定交给高碓达之助和冈崎嘉平太去办,希望能和他们达成协议。

^① 黑金美泰,一九一〇年出生于山形县,东京大学毕业,国会议员,曾任仙台国税局长,内阁官房长官及自民党的资源能源对策委员长等。——译者注

“天真烂漫”的高碕先生

以后就是派访华团缔结贸易协定的问题。在由高碕先生当团长的问题上，看来池田总理身边的人是有意见的。他们再次派人来要我当团长，我问是什么原因，他们说：“高碕先生是个天真烂漫的人，不知道他会干什么。”我当然是坚决推辞，结果还是决定高碕先生为团长，于十一月访问了中国。十一月九日在周总理出席的会议上，高碕先生与廖承志先生缔结了日中备忘录贸易协定，于是取他们两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而称为“L·T贸易”方式的贸易就这么开始了。

我对战后日本人拘谨死板的思想方法一直有些不满，所以很希望能拜见一下为一部分人所担心的高碕先生“天真烂漫”的神采，但遗憾的是未能亲自拜见过。在访问中国的旅行中，我始终是在高碕先生身边，他那灵活的思维、豁达的谈话、明快的判断，使我深为钦佩，肃然起敬。继松村先生之后，又得到高碕先生的知遇，至今仍感到幸福和难忘。

廖—高碕贸易协定的期限是五年。协定到期时，中国方面鉴于佐藤内阁的反华态度，拒绝签订长期协定。一九六八年以后改变了方式，即每年通过政治会谈，订立每一年的贸易协定，其名称也改为备忘录贸易协定(M·T贸易)，一直继续到一九七三年。

高碕先生在缔结廖—高碕协定的第二年即一九六三年二月去世。松村先生也在宣布尼克松总统访华不久的一九七一年八月逝世了。

我亲自受到这两位伟人直接的教诲和感化，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幸福。对此我深深感谢。

(作者是日中经济协会顾问)

中日友协的成立

西园寺公一

到北京去

一九五七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我们不屈不挠地抵制了以苏联为首的欧洲派，第一次成功地把世界和平大会搬到亚洲来召开。我为协商这次科伦坡大会问题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方面提议说：为了加强日中友好的交流，希望日本派联络员常驻北京。这个建议对于即将日益发展的日中友好交流确实是个好主意。我想热心于从事日中友好的日本同志也一定会为之高兴的。

“什么样的人合适呢？”我这么问道。

“我们考虑有三个条件。”廖承志先生以中国方面代表的身份回答说：“第一、为人公正；第二、国际知识丰富；第三、能和日本左、右领导阶层对话。”

这三个条件确实是很具有中国特色的条件，而且是很高的条件。

我认为这是件大事，答应先回一趟东京，与同志们商量之后，找出合适的人选再派到北京来。可是，说起来也真是自作自受，二十几个革新组织和团体反复商量的结果，最后竟确定派我去。这决不是因为我符合这三个条件，那样严格的条件我一条也不具备。但是结果还是我自找麻烦，第二年——一九五八年一月末，我携带全家移居于北京。

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

从这时开始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归国，在这十二年又七个多月的漫长的岁月里，受到了中国的关怀和照顾。在这期间，我虽有数不尽的事情可以回忆，但正值今年召开庆祝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成立二十五周年大会之际，最使我难忘的还是一九六三年在北京成立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的情景。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四周年之后的十月四日，政协礼堂（政治协商会议礼堂）高朋满坐，一齐来祝贺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的成立。这确是一次盛会，参加的日本人士竟达五百人之多；主席团对面的红色横幅上用金色书写的“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至今还历历在目。

当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楚图南会长代表参加筹备建立中日友好协会的十九个团体，宣布郭沫若先生为中日友协的名誉会长、廖承志先生为会长时，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与会者一致高兴地认为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主席团中还有陈毅副总理和石桥湛山先生。他们总是那样愉快开朗，但现在都已经成为故人了。我衷心祝愿他们二位以及松本治一郎先生、内山完造先生和高崎达之助先生等各界各阶层为日中友好作出宝贵贡献的许多已故的朋友们瞑福。

日中两国人民开创了成立中日友协的道路

成立中日友好协会的道路当然不是平坦的。一九五八年我们一家移居北京时，正是日中友好运动上升发展的时期，二月签订了钢铁协定，三月签订了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四月举办了大规模的日本商品展览会。在这之前情况是顺利的。可是以后由于岸内阁推行反华政策，贸易协定遭到了践踏，进一步又在长崎制造“国旗事件”，于是日中关系终于处于最坏的局面，友好贸易中断了，各种

友好交流立即减少了，回想我当时住在北京，真是如坐针毡。

情况随着反对安全条约的斗争而好转。安全条约是践踏日本的条约，是要把日本当作“遏制中国”的据点的条约。日本人民反对这个条约的斗争高涨起来，中国人民就给予高度的评价，这是毫不奇怪的。为了支持日本人民的斗争，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的大会。可是偏偏不凑巧，我参加在西非召开的亚非团结会议回来后，传染了疟疾，又并发了肺炎，住进了北京的医院。当我在医院中听到百万人大会的消息时，怎么也躺不住了，于是向医院方面强烈要求，好容易才获准外出二小时，记得当时我是由两个人搀扶着登上天安门的。

我在天安门上看到日中两国人民共同斗争的气氛是如此之热烈，我不由得再一次痛感到日中友好绝不是一个笼络感情的“沙龙”，日中友好只有朝着一个目标，然后再向更高的目标前进，并以同心同德和共同行动为支柱，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大会就是日中友好新发展的一个开端，我认为它是与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直接相联系的。值此日中友好运动正以反对霸权主义和争取立即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广大群众中掀起滔天巨浪，并开始为日中友好的历史书写新篇章时，我尤其不能不再次想起上述情景。

中国展览会在与三种反华势力斗争中胜利展出

川濑一贯

“日共”修正主义的阻挠破坏

根据一九六三年与一九六四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日本方面三团体之间签订的关于举办展览会的议定书，商定轮流在日本和中国每年举办一次展览会，并决定第四次展览会在日本举办。这就是一九六六年在北九州市（十月一日开幕，十月二十一日闭幕）和名古屋市（十一月十九日开幕，十二月十一日闭幕）举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贸易展览会。

这一年由于举办展览会，与三种反华势力的斗争达到了顶点。这三种反华势力是，日本政府中的一部分反华分子、“日共”修正主义以及反动的右翼分子。

一九六六年五月，我受委托担任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全国协力会的会长。这个协力会一成立就开展了配备日本方面协助和承担工作的人员、编制预算、准备募款活动、申请中国方面展览团人员的入境签证以及接待准备、警卫体制、宣传动员和会场布置等为使中国展览会获得成功和胜利结束的业务活动。

八月十一日，以张子泉先生为团长的先遣人员来到日本，十三日去北九州。

八月二十七日，张子泉、王兆元两先生到东京，要求商谈问题。

八月二十九日，张、王两先生和全国协力会的理事在麴町的钻

石饭店举行座谈会。张先生在会上发表了以下爆炸性的讲话：

“在举办这次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的时候，为使这次展览会取得成功，日本各方面的朋友诚心诚意地给予了协助。对此我表示感谢。但是另一方面，有人不愿意中国展览会取得成功，有人企图阻挠破坏它的工作开展，而且在全国协力会的事务局中就有这样的人。这些人正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阻挠破坏：一、破坏现场出售工作，阻挠多卖出售物品；二、阻挠破坏出售书籍；三、对宣传、动员和募捐活动消极怠工，阻挠中央和地方有关业务工作的开展。把这三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我不能信任日中贸易促进会控制下的事务局。在这种情况下，是停止展览会的举办，还是把这些阻挠破坏的人清除出去，二者必择其一。对此，我希望协力会的各位理事先生经过讨论做出结论。”

那天，我担任协力会理事会的主席，感到大为震惊。于是理事会暂时休会，同正副会长以及其他主要干部们到另外的房间里进行了镇重的讨论，并检查了这一类阻挠破坏事实。结果决定让中国方面感到不满意的人退出理事会事务局，并委托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萩原专务理事等人组成新的事务局。接着理事会复会，报告了以上意见，请会议讨论。一部分人大吵大闹，气势汹汹地要我们说明理由。我反驳他们说：“中国展览团是日本方面请来的客人，客人不满意的事，我们不能强加于他们。重要的是日中关系的将来。”在表决提案时，我们的意见得到大部分理事的赞成。

会后我立即前往中国方面的宿舍——小石川的川口公寓，张子泉先生、王兆元先生以及廖承志办事处的孙平化先生、吴曙东先生都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理事会决定的结果。他们听了我的情况介绍，立即打开啤酒为日中友好干了杯。

以后，“日共”修正主义仍继续进行阻挠破坏，但依靠重新改组的协力会会员的团结力量，不断地排除了他们的干扰破坏。

九月三十日，肖向前团长一行来到日本。在北九州市举办的展览会于十月一日开幕。截至十月二十一日闭幕为止，观众突破了一百五十万人。日中友好的气氛在整个九州地方高涨起来。

政府和入境管理当局的挑衅

展览会在顺利地进行着，但从另外方面又出现了第二个阻挠破坏者。这就是法务省的入境管理局。

按照惯例，中国来访人员的滞留延期手续，一向是由接待团体——协力会代办申请手续就可以解决。而这次法务省却要求本人亲自到法务省出面当作绝对条件。这是极端的挑衅行为。我三次往返于东京与九州之间，为得到法务省入境管理局的谅解而来回奔走。我曾多次出面到法务省入境管理局，一再恳求按过去惯例，用代办申请的方式来解决，可是入境管理局副局长坚决不答应。这时中国展览团成员的滞留期限就要到期，他们的态度也逐渐强硬起来。因为正好北九州市的展览会就要结束，按原计划应立即把展品运往名古屋市，因此他们强硬地提出，如果不批准延期，展品就不运往名古屋市，展览会停止举办，回国。

那样一来，日中关系必然恶化。入境管理局副局长顽固地说：“我是法律的守卫者，不能歪曲法律。”我紧逼地问道：“你能负日中关系恶化的政治责任吗？上级若有另外的指示也不行吗？”他说：“不能负责任。上级若有命令，那没办法。”幸好我和法务大臣是老相识，向他提出了申诉，这样才按惯例的手续获得了批准。

我立即飞往九州的展览会现场，然而下关入境管理局长借口法务省的指示尚未下达，拖延办理手续。中国展览团团长肖向前定了个时限说，十月十六日下午三点之前批准书仍不送到，就撤回中国。九州展览会总务部长进先生多次往返于北九州市和下关市之间进行联系，我也多次从展览会给东京法务省入境管理局副局长

去电话，弄得我拿电话机的手腕子都酸痛了。下午将近三点钟了，进先生才拿着批准书回来，送到肖向前团长的房间里。

这不单纯是入境管理的手续问题，它反映了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就带有反华思想。

右翼分子的袭击与警察队的帮凶助恶

十月二十一日，北九州中国展览会胜利闭幕之后，展览团向名古屋的吹上会场转移。十一月十九日，一切准备就绪，名古屋的中国展览会举行了开幕式。

开幕的第二天——十一月二十日下午十时左右，二十一名防共挺身队^①员分乘宣传车，一边叫喊着“粉碎中共展览会！”一边在会场周围来回逛荡，另外还散发了五万张传单，并将发烟筒投入会场。

十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一名防共挺身队员又乘着宣传车，一边嚎叫着“粉碎中共展览会！”一边在会场周围示威游行。协力会为加强会场的警卫，决定从东京、大阪动员一千名友好商社职工，并给各地发出了动员指示。

十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四十分左右，在热田神宫^②开完全国大会的“全国爱国者团体会议”^③的右翼分子，分乘十多辆宣传卡车前来示威游行。他们在车上摆着许多带金属枪头的旗杆和竹枪，用扬声器嚷叫着什么“粉碎中共展览会”等口号。他们来到会场前，一齐跳下卡车，在会场前到处乱嚷乱闹。展览会方面的事务

① 右翼法西斯组织，一九五五年五月成立，总部设在东京，机关报《梁山泊》。——译者注

② 在名古屋市热田区，是日本主要的神社之一，祭祀的主神是热田大神。——译者注

③ 是日本右翼法西斯团体的协商联合组织，对各个右翼团体有很大影响，一九五九年三月成立，总部设在京都。——译者注

局工作人员们排好队伍，站在会场前的马路上，准备对方暴力入侵会场就加以制止。青年们催促我下“进攻”令，但我忍住了。本来应该警卫会场的数百名警察机动队，却列队背向暴徒、面向我们站着，一个佩带警部^①肩章、好象是指挥官的家伙大声地喊叫说：“抵抗警察队的，立即逮捕！”警察队竟然不保护受害者，而要保护加害者。严重的是右翼暴徒冲进了我们事务局工作人员的队伍，而且破坏了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一辆大轿车，殴打并用竹枪乱刺制止暴行的金谷君和田幸君，致使他们身负重伤，经十日治疗才获痊愈。警察队看到这些情况，对右翼分子的暴行却根本不加制止。

同日六点五十分左右，行动同志会^②的宣传车再次出现在会场的入口附近。我方的警卫人员包围了他们。对此，警察的一个小队竟挤进我方警卫人员中间，企图救出被包围的右翼分子，并殴打了当时偶然在场的中国展览团的黄、叶、张三位先生。我方事务局人员看到这些情况，十分愤慨，当场把机动队的负责人千种警察署警备课真野课长拉进事务室进行质问。机动队为救出真野，闯进会场，和事务局人员处于剑拔弩张状态。中国方面当即发表了以下抗议声明：“必须严惩罪犯；要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不许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右翼分子的袭击，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日本方面协力会会员的团结，而且协力会的冷静对待大大争取了舆论的同情和加深了日中友好的气氛。结果，截至十二月十一日展览会闭幕为止，观众达二百一十六万人，现场出售商品额达二亿七千万日元。

对于展览会期间发生的“日本共产党”修正主义集团的阻挠破坏、法务省入境管理局一部分有关人的阻挠破坏以及右翼分子的袭击，我们勇敢地进行了斗争；我们与无数友好人士一起，解决了

① 是日本警察官的一种级别。——译者注

② 是右翼法西斯组织。——译者注

困难，清除了阻挠破坏分子，打退了右翼分子的袭击，保卫了展览会的展出，而且成功地使日中友好气氛在整个日本日益高涨起来。这两个地方的展览会，动员观众共三百六十六万人，现场出售商品额达四亿二千万日元，获得巨大的成功而圆满结束。

十二月二十日，在钻石饭店举行的告别酒会上，肖向前团长握着我的手说：“帮了我们很大的忙。感谢你！”我也紧紧回握肖向前先生的手说：“是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团结一致、进行斗争的结果。”

今后让我们齐心协力，在日中友好的大路上阔步前进！

（作者是东工物产股份公司经理、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副会长）

我们协会史上的一幕剧

——一九六六年的情况

黑田寿男

向反华蜕变的“日共”

在包括我们协会活动的日中友好运动的全部历史中，一九六六年是发生划时期重大事件的一年。因为和我个人也有关系，所以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

这一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条”等文件）。

在我国，佐藤政府根据日美安全条约，协助美帝的侵越战争，加强敌视中国的政策，对两国人民的交流也不断地进行公开的阻挠破坏。尽管两国人民热情充沛，但日中友好运动的环境确实是极其艰巨的。就在这样的时期，又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配合来自外部的压力，我们运动的内部出现了新的破坏者。

这一年的年初，在围绕反对侵越战争的国际统一行动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严厉地批评了“日本共产党”，认为它对苏联领导集团的评价是修正主义的。“日共”借此机会，急剧地改变了对中国的政策，提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反华的路线，而且企图把两党关系的断绝，不恰当地扩大到迫使党外各种民间团体也断绝与中国的文化交流、经济贸易以及人事往来等关系，妄图全面断绝日中之间的交流。如对日中青年大联欢和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北九州、名古屋）的阻挠，对学术交流和对中国研究的破坏等等，简直不胜枚举。

这一时期干扰和破坏活动的特点，是由钻进各个友好组织中的一部分“日共”分子从内部来进行破坏。当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罪恶企图是不会成功的。就拿前一篇文章中所讲到的展览会来说，在两个城市里都取得了预想不到的巨大的成功，胜利地闭了幕。

但是为了抵制和克服这些一面戴着友好的假面具、一面在组织内部从事的阴谋破坏活动，就不得不浪费许多精力与时间，以致这期间的运动也难免出现一些混乱。当时的各个友好组织都一齐经历了这种不愉快的体验。

这种不愉快的体验，使我国各界各阶层的日中友好人士逐渐地认识到，在进行日中交流时把“日共”反华分子当作伙伴是不利的、不便的，不，是不可能的！因而逐渐形成一种趋势，认为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在日中友好运动的共同行动中包括“日共”分子的做法，代之以没有“日共”反华分子参加的新的广泛的共同行动。在这样的气氛中，各个友好组织（包括我们日中友好协会）的有关人员和友好人士之间经多次协商后，发表了三十二位各界各阶层人士的声明——《面临国内外危机，为促进日中友好，再告国民书》。

三十二人声明和五十二人声明

这个声明叙述了日中友好的重要性、友好运动的发展以及中国人民的热情支持；指出巩固与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是对越南人民斗争的支持和对亚洲的和平与解放的贡献；另一方面还指出，由于美帝及其追随者的破坏和压迫，使得日中友好运动的形势更加严酷；同时我们运动的内部最近产生一种极力阻挠日中友好交流发展的倾向，而这只会有助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反华政策；声明表示决心和信心说，为了日中友好和交流的发展，必须排除运动内部产生的障碍；不论任何人的阻挡，日中友好运动——这个巨大的历史潮流必将愈益发展。最后

在结束时指出：“在中国建国十七周年的前夕，我们——这个声明的签名者，向最广泛的国民群众和各界各阶层的一切爱国人士发出呼吁，让我们满怀信心地来进一步推进日中友好的伟大事业！”（参阅 203 页）这个声明，在日中友好运动的历史中，体现了一个划时期的重要行动的开端。

九月二十六日发表了这个声明。不久之后，我们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七周年国庆节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当时，我们向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人转述了上述声明和它的发表经过。中国方面立即对此作出响应，十月五日，郭沫若、廖承志等中国各界人士五十二人联名发表了声明《支持日本各界知名人士关于促进中日友好的声明》。

在这个声明中，五十二位先生代表中国各界人士和各个群众团体，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支持三十二人声明，指出三十二人声明是对敌视日中友好的反动势力的迎头痛击，是对希望日中友好的日本人民的巨大鼓舞；企图破坏日中友好关系的美帝、佐藤政府、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其新老追随者的任何阴谋活动，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声明呼吁我们为把日中两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中结下的战斗友谊推向新的高潮而共同努力。

日中友协（正统）在前进

在上述声明发表后，我们仍继续留在北京。一周之后，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连我共十人）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廖承志先生等十人）发表了共同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双方认为日中友好交流是根据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相互支援的立场上进行的；指出在目前日本国内形形色色的势力正在或明或暗地破坏日中友好运动的情况下，三十二位日本各界知名人士的声明以及五十二位中国各界人士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声明

的发表，具有重要的意义；强调日中两国人民必须齐心协力，排除万难，使日中友好运动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展开，大踏步前进。（参阅 206—209 页）

我们代表团带着这个共同声明回国，于十月二十五日召开常任理事会，要求批准这个声明，结果以绝对多数通过了。拒绝承认的只是少数“日共”系统的理事。从此以后，“日共”系统的分子退出了我们的协会。

三十二位人士“提倡没有‘日共’系统反华分子参加的广泛的日中友好共同行动”，具有划时期的意义。通过以后的实践，这个方针今天已经确定下来了。

与此同时，这个方针在各个日中友好组织中也同样确定下来。我们协会表现得最为典型。

这种状态在今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常识了。“我们协会是超越思想信仰、政党和政治派别，在希望日中友好这一点上团结起来的群众团体”。协会会员要求坚持协会本来的性质和任务，促进广泛的友好运动；而“日共”这个政党的野心和欲望则是企图把它变为自己的私有物，对它进行机械的统治。我们协会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状况，是同这种艰苦奋斗的过程结合在一起的。

在上述常任理事会以后，我们协会在正式名称之后附上“（正统）”这个形容词。“日共”反华分子直到今天还继续采取阴险卑劣的手段——一面猖狂地进行反华宣传，一面又打着“日中友好协会”的招牌。我们和他们的斗争，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日中友好运动也和其他领域的许多运动一样，经历过这样的状况：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内部矛盾，这种矛盾日益激化，而造成运动的混乱与停滞，但很快就获得解决，又走上新阶段的发展道路。这些都是当时各个时期的客观实际的反映。一九六六年的状况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内部矛盾最好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但有时也会转化为敌我矛盾。一九六六年的情况就是“日共”官本领导集团不能认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反而对它进行指责和中伤，最后把打开两党关系的希望寄托在走资派的复活上。所以“日共”系统的反华分子的干扰和破坏活动，早已超出内部矛盾的范围了。

〔作者是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会长〕

第三部分

日中友好运动资料

日中友好运动重要文献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成立宗旨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日本与中国是亚洲的邻邦，长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相互之间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当两国的关系建立在友好和合作的基础上时，在两国人民的生活中，和平、繁荣和幸福就得到了保证；当两国的关系没有建立在这种基础上时，两国人民的生活就遭到了破坏。到了近代，中国人民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长期遭到的不幸，应当说是最为严重的。而且十分明显，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仅破坏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也破坏了日本人民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日本军国主义被打倒了。去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在中国成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两国的关系应当全面地加以改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两国人民的和平、繁荣和幸福为基础，使两国的关系焕然一新；并且深信现在已处于有可能焕然一新的一个转折时期。我们应当现在就建立两国人民的正当的相互关系。因为只有这样，两国的安全与和平才能得到保证，重建日本的和平经济才能得到保证，日本人民的繁荣和幸福才能得到保证，从而才可能给予中国人民的繁荣与幸福以无限的保证。我们深信，这是我们可以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唯一的条件。

要做到这一点，两国人民、特别是日本方面必须要付出热情和

努力。过去给两国人民带来不幸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统治阶级灌输给我们的对中国的错误的观点。我们要付出最大的努力来肃清这种关于中国的错误的观点。为了建立两国的正确的关系，我们希望全中国人民能给予我们最大的援助，同时热烈地希望早日缔结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同盟国的对日和约。

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国内形势，可以预料将会给我们的运动带来大大小小的各种困难。我们必须勇敢地克服这些困难，顽强地斗争到底。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于去年十月十日成立了筹备会，一年来广泛地向各阶层人士发出了呼吁，征集发起人，努力准备组织支部的工作，并为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尽了自己的努力。现在我们深感到正式成立协会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要在这里阐明成立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的宗旨。

我们保证要在下述的纲领的指导下，竭尽全力实现本协会的目的：

一、本协会要深刻反省日本国民中存在的关于中国的错误观点，并努力予以纠正；

二、本协会为建立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合作，努力从事两国的文化交流；

三、本协会为了有助于日中两国的经济建设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努力促进日中贸易；

四、本协会以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为基础，谋求相互的安全与和平，从而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于成立大会上 通过的工作方针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一、友好运动的原则

我们的友好运动是中国与日本两国国民的友好运动。其含意是：它是全民规模的友好运动，是不通过彼此国家机构的人民友好运动。我们希望将来能通过两国的国家机构来促进两国的友好关系，但目前的实际情况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开展的友好运动，是不依赖于国家或政府的自发的国民运动。

它决不是偏向于一党一派、在少数国民的小范围内活动的运动。凡是对日本过去所犯下的帝国主义侵略罪行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在相互尊重与平等的立场上赞成两国人民应该紧密合作的人们，不问其阶级、职业以及政治信仰如何，各界各阶层的人士都可以成为本会的会员。另外，我们当作友好对象的中国，是广大的中国人民大众，并不局限于特定的政党和政治派别。

二、纠正关于中国的错误观点

为争取两国人民的真正的友好以及进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其前提是要纠正在我国国民中间依然大量存在的对中国的错误观点。基于军国主义优越感的轻视蔑视中国的观点，乃至来源于旧支那学的认为中国停滞不前的思想，是当前理解现代中国的主要障碍。我们应当普及新中国的正确报道，通过这些报道来对上述观点进行批判。应当从这一角度出发，同现有的研究中国的机构紧密合作，向研究工作者提供资料，大量出版有关中国的书刊，在

将来还要开设中国图书馆。在协会在整个文化活动中，应当把这些工作当作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另外，现在还有相当多的日本人侨居中国，他们的起居生活正受到其家属的关注。协会正协助这些侨居中国的日本人与其家属通信，积极配合已经着手解决的所谓“在华日本人遣返问题”的工作。而通过这种通信活动，通过个人生活的渠道，正有助于把中国的实际情况传达给我国国民，有助于沟通彼此的思想。

三、文化交流活动

日本中国友好活动当然拥有广泛的活动领域。而协会在其中所从事的活动领域，重点应放在广泛的文化活动上。友好的前提是在于互相了解真实的情况，应把各种出版工作、解决翻译权问题、版画与照片等的交换以及科学技术的交流等作为经常性的工作来进行。最近在电影、戏剧、美术和音乐等领域，正产生许多取材于中国和中国人的优秀的作品。这些文化活动由于协会参与筹划，提供材料，与协会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将会进一步获得发展；尤其是中国的音乐、歌曲和秧歌等作品将进入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

四、宣传和促进同中国的贸易

两国人民不仅希望文化交流和合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正成为十分紧急的任务。尤其是战后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使国民懂得，没有同中国的全面的经济交流，独立自主地重建日本是不可能的；促进与中国的贸易，已成为全体国民的要求和愿望。因此，我们应当与一切政党、经济团体及劳工团体合作，加强与中国贸易的舆论宣传工作，实现两国的全面经济交流。

五、与旅日华侨的合作

要争取两国人民的合作，首先必须促进与旅日华侨的友好。关于改善旅日华侨经济上与政治上所遭受的不适当待遇的必要性，要唤起全体国民的关心，首先要从身边迈开友好的第一步。在这一点上，我们协会从筹备会时代就已经争取了全体旅日华侨的组织华侨总会的积极参加，因此今后要求全国各个支部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共同来求得问题的解决。花冈事件与木曾谷事件等不单纯是协会的问题，必须看作是全体国民应对此表示遗憾的问题来对待。

六、与和平运动的联系

日本中国友好运动无疑是国际亲善运动的一部分，它与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在基本性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要扩大与中国的友好，也必须尽可能地与世界的各种形式的和平运动相结合；在成立了保卫和平组织的地区和工作单位，应当帮助那里的和平爱好者熟悉中国的问题，加深对中国的理解。日中友好运动往往给人一种印象，好象它只是一种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的人们的运动。这是日中友好运动发展的一个障碍。要打破这种印象，真正达到运动的目的，特别需要加强与一般的国际亲善运动及和平运动的联系。

七、运动的各种形式

我们的友好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怎样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活动形式来。加强机关报、支部小报等文字宣传活动，无疑是必要的；根据筹备会时代的经验，举行讲演与演剧或合唱相结合的集会曾获得成功；另外，以知识分子和群众组织的干部为对象，召开日

中友好会议曾发生很大的影响；与旅日华侨举办各种座谈会均取得了有意义的成果；把最近陆续收到的新中国的照片带进各个工作现场，很有利于对中国的理解；培养合唱团和灌制合唱的唱片等也是今后的一项任务；此外，从举办语言讲习会到教授中国烹调等都有必要予以注意；与中国通信的运动，如以工作单位为基础，肯定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总的来说，不要拘泥于大的集会，生动活泼地举行各种小型的集会，应当作为经常活动的原则。

八、组织工作的方针

友好活动的国内对象，无疑地必须包括实业界、劳工界、青年、妇女等各个社会阶层，但特别需要加强对有组织的工人与青年的工作。当前在现代工业中劳动的工人关心与中国的贸易，并对中国工人的状况和活动表示尊敬。与各个工会结合，掀起日中友好的热潮，当前应当作为重点来加以推进。其次，青年学生对中国的关心正逐年增强，与青年的结合能否成功，可以说已成为各个支部发展的关键。还应当利用交换两国小学生的作品等形式，来推进少年儿童的友好运动。

我们的友好运动不局限于一党一派。这一根本性的原则，在从事支部的组织工作时，应当给予最大的重视。根据章程，拥有十名以上会员的地方即可建立班或支部；这些组织必须向一切希望日中友好的人们开放。对于对现在的中国政治经济抱有怀疑和批评的人，重要的是应当在协会内形成可以公开发表这种怀疑和批评的自由的气氛；仅由思想相同的人们来建立支部，这是完全错误的。

另外，会员并不以一定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程度作为条件，所以支部的组织原则要力求大众化。对于积极赞同友好活动的人士，均应吸收成为会员。支部还必须重视通过各种方式与尚未加入本协会的人士联系。

只有这样，协会才能组织起数百万群众来。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于成立大会上通过的章程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名称与目的

第一条 本会名称为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总部设于东京。

第二条 本会的目的是，加深日本中国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与友好，谋求文化交流，为两国繁荣与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活 动

第三条 本会为达到上述目的，进行以下活动：

- 一、 研究与介绍中国的情况与文化；
- 二、 向中国介绍日本的情况与文化；
- 三、 交换友好使节；
- 四、 举办文化事业；
- 五、 促进日中贸易；
- 六、 其他必要的活动。

会 员

第四条 凡赞成本会的目的、缴纳会费的个人或团体均可作为会员。个人会员分普通与特别两种。但六个月以上不缴纳会费时，则失去会员的资格。

机 构

第五条 本会设立以下机构：

一、代表大会 为本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每年召开一次，根据必要可召开临时代表大会。

二、理事会 为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处理本会在本届代表大会与下届代表大会之间的重要业务工作的机构，每年召开四次以上。

三、常任理事会 为根据理事会的决定，处理本会业务工作的机构，每月召开一次以上。常任理事会内设事务局，处理日常业务工作。

四、评议委员会 就本会经办的业务工作发表意见。

干 部

第六条 本会设以下干部：

一、 会长一名、副会长若干名

会长代表本会总理会务；副会长协助会长，会长因故不在时代理会长；会长与副会长由代表大会决定。

二、 理事长一名、常任理事若干名、理事若干名

理事在代表大会上由会员中选出；理事长及常任理事在理事会上由理事中选出。

三、 评议员若干名

根据理事会的推荐，由会长委任；理事会可根据需要，召开评议员会，征求意见。

四、 会计监查若干名

由代表大会选出，监督检查本会的会计。

第七条 理事可以在理事会上补充或增添，但要获得下届代表大会的批准。

第八条 本会可设顾问。顾问由代表大会推荐、会长委任，在重要事项上回答会长的谘询。

第九条 本会干部的任期为本届代表大会至下届代表大会期间。

地方组织

第十条 工厂、事务所、官厅、学校、研究所以及市、区、町、村等，拥有会员十名以上均可成立支部。同一个都、道、府、县、郡、市、区、町、村拥有支部两个以上，可建立支部联合会。有关支部及支部联合会的章程另定。

会计

第十一条 本会的经费依靠入会金、会费、事业收入及捐款供给。

第十二条 入会金及会费规定如下：

- 一、普通会员，入会金十日元，会费每月缴十日元。
- 二、特别会员，会费交一股（每月一百日元）以上。

附则

第十三条 本章程的修订需经代表大会决议。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于成立大会上通过的 中央总部干部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

九月三十日成立大会上遴选干部的结果，会长暂缺，选出副会长四人，并选出理事及会计监查。十月十六日第一次理事会上选

出理事长及三十名常任理事。名单如下：

副会长

丰岛与志雄(作家)

原彪(日本社会党)

平野义太郎(中国研究所所长)

林炳淞(旅日华侨总会会长)

理事长

○内山完造(吴山贸易公司经理)

理事(有“○”号的为常任理事)

○厚木高子(民主妇女协议会干事)

○赤津益造(中国研究家)

○安岛彬(中国研究全国学生联合会委员长)

○池田幸子(中国研究家)

伊藤贵麿(作家)

○伊藤武雄(地方调查机关全国协议会会长)

石河京市(横滨市长)

今中次麿(九州大学教授)

○岩村三千夫(中国研究所理事)

于恩洋(旅日华侨总会副会长)

○幼方直吉(中国研究所理事)

太田薰(全国硫铵工会联盟会长)

绪方孝男(八幡制铁所工会主席)

大泽诚一(大泽土建承包公司经理)

○小泽正元(评论家)

○细谷松太(新产业别工会中央执行委员)

○鹿地亘(作家)

荫山寿(全日本海员组合长)

- 神近市子(妇女时报社)
- 甘文芳(华侨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黄廷富(旅日华侨总会前会长)
吴修竹(华侨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
- 小松清(评论家)
菊川孝夫(参议院议员)
菊地三郎(中国研究家)
- 黄秀凤(华侨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
- 胜间田清一(众议院议员)
黑田寿男(众议院议员)
- 西园寺公一(参议院议员)
佐藤安政(全国官厅职员工会委员长)
- 崔士彦(留日同学会委员)
志贺健次郎(众议院议员)
- 涩谷定辅(中日贸易促进会总务局长)
岛上善五郎(总评事务局长)
岛田政雄(中国研究家)
白川威海(新东海新闻社长)
谢南光(贸易商)
铃木义男(众议院议员)
- 田中稔男(日本社会党)
- 立野信之(作家)
泷田实(全国纤维产业工会同盟会长)
- 只松祐治(日本社会党劳动部)
高山义三(京都市长)
- 柘植秀臣(民主主义科学家协会干事长)
户叶武(日本社会党外交委员)

- 德永利雄(日本自治团体工会总联合会委员长)
- 南条玉一(全日本造船工会委员长)
- 新居格(评论家)
- 花塚正吉(埼玉工农恳谈会议长)
- 羽仁说子(评论家)
- 藤森成吉(作家)
- 细川嘉六(参议院议员)
- 帆足计(日产协参事)
- 堀真琴(参议院议员)
- 本间喜一(爱知大学校长)
- 益田哲夫(全日本汽车工业工会执行委员长)
- 松泽兼人(众议院议员)
- 水田三喜男(众议院议员)
- 箕浦多一(日产汽车公司经理)
- 宫本通治(东洋码头公司经理)
- 宫崎世民(评论家)
- 三岛一(历史学家)
- 武藤武雄(日本煤矿工会执行委员长)
- 山花秀雄(全国化学工业工会同盟会长)
- 吉野信一郎(吉野批发庄经理)
- 吉田资治(产别会议议长)
- 林凤鸣(山形华侨联合会会长)
- 林以文(东京华侨联合会会长)
- 刘明电(华侨民主促进会顾问)
- 刘启盛(旅日华侨总会副会长)
- 刘永鑫(东京华侨联合会副会长)
- 和田博雄(参议院议员)

和田次郎(全日本金属工会执行委员长)

会计监查

上中龙男(东邦海运常务董事)

西野邦三郎(八州光学会长)

吕漱石(大安工业公司经理)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成立大会致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的电文

(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

东京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

由我国十九个人民团体发起组成的“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今天在北京隆重地举行了成立大会。

大会向贵会并通过贵会向为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日本人民，致以兄弟般的崇高的敬意！

中日两国人民是兄弟。中国人民将始终不渝地同日本人民站在一起，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经济交流、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而斗争。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要求的，它一定会获得中日两国人民的广泛支持。

祝贵会的事业取得不断的胜利和发展！

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和团结万岁！

北京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成立大会

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

《人民日报》社论 中日友好的里程碑

(一九六三年十月五日)

十月四日，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这是中日两国关系史中的一件大事，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里程碑。中国人民热烈地祝贺中日友好协会的成立。我们深信：中日友好协会工作的开展，定将为促进中日两国友好运动的发展、中日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增强，作出重大的贡献。

中国和日本是隔海相望的紧邻，两国有着悠久的友好历史。尽管由于近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中日两国关系曾经有过一个不愉快的过去，然而从二千多年的中日两国关系史的长河来看，友好睦邻毕竟是主流。从辽远的年代起，两国之间就开始了频繁的文化和经济交流。有着历史传统的中日两国友好关系，可以说是根深叶茂，渊远流长。

中日两国友好相处，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着传统友谊的我们两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共同努力，克服了重重困难，大大加强了我们之间的友谊。十多年来，由于日本人民的真诚渴望，由于日本各界朋友的热心推动，中日友好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十三年前成立的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已从小到大，发展为目前拥有几百个地方支部和好几万名会员的强大组织。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日本人民斗争的发展，在日本，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已成为不可遏止的强大呼声。凡是不利于中日友好的事情，在日本人民中是通不过的。同样，中国人民对正在为争取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日本人民，也怀有深厚

的友情，并坚决支持日本人民的爱国正义斗争。在反对美帝国主义这个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我们把英勇的日本人民看作亲密的战友。

中日友好事业，是在同反对中日友好的各种恶势力不断搏斗中向前发展的。今天，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象魔鬼怕火一样地惧怕和憎恶中日友好。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来离间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竭力阻挠和破坏中日友好的发展。然而，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中日友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洪流。在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中日友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的。任何反动派，不管它来自哪里，不管它使用什么手段，要想阻挠和破坏中日友好，都是枉费心机，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同一切怀恨中日友好的人的愿望相反，近年来，中日两国人民的交往、文化和经济的交流，有了巨大的发展。目前，由日中友好协会发起的“日中友好月”运动，正在日本各地热烈地开展着。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文化等各界、各人民团体派出了总计数百人的代表到中国来访问，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欢度国庆节。在这些日本朋友当中，有以热心日中友好事业著名的、曾任日本首相的石桥湛山，有率领第七次日中友协代表团来访的日中友协理事长宫崎世民，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日中友好使者。日本工业展览会也在今天开幕。这些事实生动地说明，中日友好运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中日两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共同斗争中的战斗友谊的不断增进，对于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在中日友协成立的时候，让我们祝中日友好象长江一样绵远流长，象富士山一样同天地辉映！

中国政府关于进行原子弹试验的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十五时,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这是中国人民在加强国防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的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护自己,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保卫世界和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共同职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美国的核威胁,中国不能坐视不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之的。

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如果这个主张能够实现,中国本来用不着发展核武器。但是,我们的这个主张遭到美帝国主义的顽强抵抗。中国政府早已指出:一九六三年七月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一个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骗局;这个条约企图巩固三个核大国的垄断地位,而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它不仅没有减少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胁,反而加重了这种威胁。美国政府当时就毫不隐讳地声明,签订这个条约,决不意味着美国不进行地下核试验,不使用、生产、储存、输出和扩散核武器。一年多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年多来,美国没有停止过在它已经进行的核试验的基础上生产各种核武器。美国还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进行了几十次地下核试验,使它生产的核武器更趋完备。美国的核潜艇进驻日本,直接威胁着日本人民、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美国正在通过所谓多边核力量把核武器扩散到西德复仇主义者手中,威

胁迫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美国的潜艇，携带着装有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出没在台湾海峡、北部湾、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处威胁着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一切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各国人民。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由于美国暂时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的假象，就认为它对世界人民的核讹诈和核威胁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泽东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弹是纸老虎。过去我们这样看，现在我们仍然这样看。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中国政府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相信人民。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国的命运决定于中国人民，世界的命运决定于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决定于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美国发动核战争的威胁。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深信，各国人民依靠自己的斗争，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中国掌握了核武器，对于斗争中的各国革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是一个巨大的贡献。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既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也不会犯投降主义的错误。中国人民是可以信赖的。

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懂得，核武器越是为美帝国主义及其合伙者所垄断，核战争的危險就越大。他们有，你们没有，他们神气得很。一旦反对他们的人也有了，他们就不那么神气

了，核讹诈和核威胁的政策就不那么灵了，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长了。我们衷心希望，核战争将永远不会发生。我们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坚持斗争，核战争是可以防止的。

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作为第一步，各国首脑会议应当达成协议，即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和很快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承担义务，保证不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武器区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如果已经拥有大量核武器的国家连保证不使用核武器这一点也做不到，怎么能够指望还没有核武器的国家相信它们的和平诚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

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尽一切努力，争取通过国际协商，促进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崇高目标的实现。在这一天没有到来之前，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强国防，保卫祖国，保卫世界和平。

我们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关于中国进行 原子弹试验的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中国在十月十六日十五时进行了一次核试验。同时中国政府发表了声明，说明中国进行核试验是被迫的、不得已的措施；指出核武器是人类制造的，人类一定会消灭核武器；并从这一立场出发，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

的问题。

围绕着这次试验，日本国内出现了种种意见，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面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这一新的局面，我们从我们协会进一步加深日中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开展广泛的交流，增进日中友好，早日实现恢复邦交的立场出发，以当前存在的俨然的事实为基础，考虑了这个问题。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长期侵略过中国。战后我国历届内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不但无意反省过去，反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和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集团加强勾结，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一贯阻挠恢复邦交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不仅如此，在我国还设立了二百多个以中国为目标的美军军事基地；现在，载有原子弹的F105D战斗轰炸机连日在我国上空进行针对中国的轰炸训练。

我国的领土冲绳，在美国的直接占领下，已成为进攻中国的强大的核基地。现在又强行要求让美国的核潜艇停泊日本的港口。

这些事实是美国正把我国当作最大的核基地，进行“遏制中国”和核威胁的最清楚不过的证明。

即使在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缔结以后，正如印度支那半岛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实所表明的那样，由于美国推行战争政策，核战争的危机正在增大，对中国的核威胁正日益增强。

中国政府在其声明中说：“中国政府完全理解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试验的善良愿望”，但作为自卫上不得已的措施，中国才进行了核试验。我们面对上述事实，充分理解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支持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以及当前首先缔结不使用核武器协定而立即召开世界首脑会议的建议。中国政府的声明已经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恢复中

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已成为世界的舆论。

在这种新的局面下，我们认为，当前必须把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作为我国乃至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最紧迫的任务。我们协会今后要全力以赴地推进争取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国民运动。

现在还有一种动向，就是恶意地利用中国核试验，乘机破坏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挑拨日中关系，并妄图使我国实行核武装和修改宪法。对此，我们要严加警惕，坚决发起一个与之对抗的运动；同时要更加大力地推进废除日台条约，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以及恢复日中邦交的争取三千万人签名的运动，为争取日中友好和实现恢复邦交，和国民一起向前迈进。

三十二人声明——面临国内外危机， 为促进日中友好，再告国民书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在战后的日本，对于一切认真思考问题的真正爱国人士来说，推进日中友好交流、增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它也反映了我国绝大多数国民的共同愿望。广大国民决不愿重走日本军国主义曾经走过的从侵略到灭亡的老路。正因为如此，争取日中友好和恢复邦交的国民运动，才不断地战胜了各种困难和阻挠，取得了辉煌的进展。前年二月，一部分各界代表人士发表了《争取恢复日中邦交呼吁书》，受到了国民的广泛支持。现在，对于我国的一切民主爱国力量及其运动来说，这一运动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战斗堡垒。

在解放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的中国人民，尽管日本军国主义曾

经对中国人民犯下过罪行，但仍为争取建立在新的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日中友好交流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团结，一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满足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愿望。而日中两国人民争取友好团结的努力，对亚洲的和平和亚洲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正起着巨大的作用。

当前亚洲局势十分紧张。由于越南人民英勇忘我的斗争，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处境日益困难。为了摆脱困境，美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地继续选择了扩大战争的道路。有着广阔国土和七亿多人民的中国，坚决站在越南人民一边，表示准备采取中越两国人民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决心与美帝国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决不后退一步。

随着这种形势的发展，我们争取日中友好交流和两国人民的团结的运动，正面临一个空前紧急而重要的关头。广大的日本人民如果能维护和扩大日中友好的阵地，那肯定不只限于维护日中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一定会成为对越南人民的巨大支援，为亚洲的和平与解放作出重要的贡献。

日中友好运动的环境今后将会更加严酷。一味追随美国政府的势力，必然会加强对友好交流运动的阻挠和压迫；在各种各样伪装下的“两个中国”的阴谋，也会进一步加紧进行。

与此同时，当前要进一步推进日中友好交流运动，还必须克服日本的运动内部出现的障碍。最近我们运动内部产生了一种倾向，在各种借口下，极力阻碍友好交流的发展。这种倾向只能使美日反动势力高兴，为他们的反华政策帮忙。

日中友好运动已经具备了足以战胜任何压力的力量，已经积累了足以战胜任何阴谋的经验。这一国民运动必将日益扩大、深入和发展。任何人妄加阻挠都是徒劳的。这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巨大的历史潮流。

在中国建国十七周年的前夕，我们——这个声明的签名者，向最广泛的国民群众和各界各阶层一切爱国人士发出呼吁，让我们满怀信心地来进一步推进日中友好的伟大事业！

岩井章(总评事务局长)
伊藤武雄(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
海野晋吉(律师)
太田薰(前总评议长)
大谷莹润(前参议院议员)
大内兵卫(原法政大学校长)
兼田富太郎(总评副议长)
龟井胜一郎(评论家)
河崎夏(母亲联络会会长)
木村伊兵卫(摄影家)
黑田寿男(日本社会党顾问)
金子二郎(大阪外国语大学校长)
小林义雄(专修大学教授)
小林雄一(日本记者会议议长)
佐佐木更三(日本社会党委员长)
坂本德松(亚非团结委员会理事长)
白石凡(亚非作家会议日本协议会委员长)
末川博(立命馆大学校长)
杉村春子(文学座)
千田是也(俳优座)
高野实(全国金属产业工会副委员长)
田中寿美子(日本社会党参议院议员)
土岐善麿(艺术院会员)
中岛健藏(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

原彪(日本社会党顾问)
堀井利胜(总评议长)
深尾须磨子(诗人)
牧野内武人(律师)
松冈洋子(评论家)
宫崎世民(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
三岛一(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
久布白落实(基督教妇女矫风会常务理事)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代表团和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的共同声明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为了衷心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国庆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访问了中国。

为了进一步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代表团同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

双方一致表示全面支持日本各界三十二位知名人士的声明和中国五十二位各界人士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声明,并且在这两个声明的基础上详细地讨论了当前的国际形势。

美帝国主义仍然继续推行以中国为主要目标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破坏各国人民的安全与和平,特别是威胁和侵犯着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主权和独立,正因如此,它遭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并且日益被全世界人民所包围。目前,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是在越南。英雄的越南人民所进行的坚决的抗美救国斗争把敌人打得连气都喘不过来,使美帝国主义日益陷于困境。但是,美

帝国主义一方面企图把侵略战争的火焰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和中国，另一方面正在玩弄欺骗性的“和谈”阴谋。越南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绝不允许这种阴谋得逞。

中国人民下定决心，不惜承担任何民族牺牲，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在日本，支援越南人民的运动也已经在全国掀起。越南人民的斗争，不但是为了争取越南人民的独立，而且也是中日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的共同斗争。双方表示确信，越南人民进行的正义斗争必将取得胜利，美帝国主义进行的非正义的战争必定遭到失败。

双方还强烈谴责日本佐藤政府为了协助美帝国主义进行侵越战争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并且表示坚决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在这种形势下，双方重新看到了世界地图上的中日两国的位置，再次回顾了二千年来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愤怒地想起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认为两国人民的安全和亚洲和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因而确认必须世代维护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尤其在目前形势下发展中日友好运动和反对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了。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对美帝国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派是最沉重的打击，保证中国绝不象以苏联领导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那样堕落下去。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的成员在访问期间，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努力通过同红卫兵的座谈会及其他一切机会掌握这方面的真实情况。结果，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表示深切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为了保证革命沿着正确道路前进，在长期的革命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段重要过程，而且目前正在取得明显的成效。

双方一致指出，中日友好交流一向是根据两国人民的共同愿

望和利益，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相互支援的立场上进行的，并且今后也将如此；对中日友好交流的各种诬蔑和诽谤都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都不过是为了从内部来破坏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

双方认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各方面的交流是加深相互理解、加强友好和团结所需要的，而加深相互理解、加强友好团结将会产生促进各方面新发展的力量。双方强调今后必须扩大和发展各方面的交流。

根据上述观点，日本方面表示将克服一切障碍，为实现日本青年访问中国参加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而努力。中国方面表示参加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青年什么时候来中国访问，中国方面都是欢迎的。

双方一致主张：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文化、学术和其他各方面的交流和人员往来，包括一般旅行团；在中日友好的基础上，根据政治三原则（1. 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2. 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 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为发展中日贸易而进行切实的努力；为实现目前由于佐藤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而受到阻挠的中日两国双方侨民往返祖国的自由而努力。

双方认为，目前日本国内外的形形色色的力量正在或明或暗地破坏日中友好运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各界三十二位知名人士的声明以及五十二位中国各界人士和人民团体负责人的声明的发表，具有重要的意义。双方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必须齐心协力，排除万难，使中日友好运动在更加广泛的领域里展开，大踏步前进。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代表团

廖承志	赵安博
康永和	沈兹九
杨煜	彭炎

王晓云 张联华

郭劳为 李文耀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黑田寿男 宫崎世民

大森真一郎 三好一

足立梅市 今井长二郎

野村芳郎 松本勋

桦山秀一 桥本信一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二日

关于革新日中友好运动的声明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会员们、国民们：

十月二十五日的日中友好协会第十三次常任理事会上，发生了如报上所报道的“日中友好协会分裂”的事态。对此，我们是深感遗憾的。

但是，舍此之外，已经别无他法来维护日中友好协会十七年来的光荣传统和恢复协会的真正面目。接受特定政党指示的某些人，从阻挠破坏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开始，到事事阻挠破坏日中友好运动的发展。尤其阴险卑鄙的是，他们表面上挂着“日中友好”的招牌，暗地里却在拼命地干着反华宣传的勾当。

在昨天的常任理事会上，他们拒绝承认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十月十二日在北京发表的共同声明。这个共同声明可以说是日本和中国八亿人民开展团结友好运动的指针。连这样一个共同声明都拒不承认，我们还怎么能够和这些破坏者一起从事日中友好协会的活动呢！我们在现执行机构中是绝

对多数派,但为了粉碎这些破坏者纠缠不休的策略,我们迁移了事务所。

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的周围,恢复协会的本来面目,以各界各阶层广大国民要求日中友好的愿望为基础,以日中共同声明为支柱,大力开展友好运动。

那些残余的破坏者们将会仍然打着友好的旗号贩卖非友好的货色,但人民已经不会受他们的欺骗了。

日中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万岁!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总部

会长 松本治一郎

副会长 黑田寿男

副会长 伊藤武雄

副会长 三岛一

副会长 吉田法晴

理事长 宫崎世民

副理事长 大森真一郎

副理事长 岩村三千夫

事务局长 三好一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处的支持电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黑田寿男、三岛一、宫崎世民、大森真一郎、岩村三千夫、三好一等各位先生:

获悉诸位先生和坚持日中友好的朋友们,同一小撮企图破坏中日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分裂主义分子,进行了激烈斗争,并毅然

宣布同他们决裂，重新整顿指导日中友好运动的组织。我们对你们这一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坚决反抗现代修正主义、分裂主义分子，坚持日中友好的行动，表示最大的信赖和坚决的支持。

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实表明，少数仇视中日友好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追随者们，口头上讲“友好”，实际上却干着敌视中国、破坏中日友好的勾当，他们打着“友好”旗帜，进行反对友好的行动，他们的这种卑鄙手段，是欺骗不了广大日本人民的，其阴谋是绝对不能得逞的。我们将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根据我们双方最近发表的共同声明的精神，和你们共同把中日友好的事业干下去。我们向你们保证：我们将同打着“友好”旗帜、反对友好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修正主义分子断绝一切来往，彻底地撕破他们的假面具。

我们深信你们是代表了广大日本人民要求日中友好的愿望的，你们的行动一定会得到广大日本人民的支持。我们也深信，日中友好运动，在诸位先生的领导下，必将克服一切障碍和困难，更加向前发展。

中日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万岁！

中日友好协会秘书处

秘书长 赵安博

副秘书长 王晓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的邀请，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毛泽东主席于九月二十七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始终在友好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下述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根据上述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 本 国
国务院总理	内阁总理大臣
周恩来(签字)	田中角荣(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日 本 国
外交部长	外务大臣
姬鹏飞(签字)	大平正芳(签字)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在 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于九月二十九日在北京指出，由于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从今天开始两国间建立外交关系，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宣告结束。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是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在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这些话的。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主持了有中外记者参加的这次记者招待会。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说：“经过历时四天的日中两国首脑富有成果的会谈，今天发表了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声明，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他说：“日中双方对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已经在联合声明前言中表明了。我们相信，结束不幸地长期存在于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在两国间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在谈到联合声明本文时说：“正如第一条所表明的，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作为其具体表现，从今天开始两国间建立外交关系。关于这一点，请参照第四条。

“其次，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当然前提——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这一点，日本政府的意思已在第二条作了表达。

“另外，日本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已经在第三条表明了。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有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说：“关于在第五条中表明的大华人民共和国放弃赔偿问题，如果想到过去日中之间不幸的战争的结果，中国人民所受损害之巨大，我们认为对此应予坦率而正当的评价。”

他说：“邦交正常化的意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日中两国，互相尊重彼此的立场，建立起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这种日中关系应遵循的原则列入了第六条，第八条所述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也同样反映了两国政府向前看的态度。”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最后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编者注：即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在记者招待会上还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中央 总部关于日中复交的声明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中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从法律上结束了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并恢复了邦交。这样就结束了两国之间长期的不正常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国家关系。这是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我们热烈支持两

国政府的这一决定。

日本统治阶级，在日清战争以来的五十余年中，无视邻邦中国的主权，不断地干涉其内政和进行侵略；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所谓的“满洲事变”到日中全面战争的十五年期间，用刺刀威胁全体中国人民，打死和打伤了一千多万人民，焚毁和掠夺了无数的财产；而且在战败以后的二十余年中，拒不承认代表中国人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回避战争的善后处理，从事“两个中国”的阴谋活动。但是，这次复交说明了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和敌视中国的政策终于崩溃了，显示了日中两国关系开辟了新阶段。它为日本走上独立、民主、和平、中立和繁荣的道路以及亚洲的和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是多年来日中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斗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们一向认为，日中两国恢复邦交是日中友好的新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不能说多年培植起来的军国主义观点和蔑视中国的思想会因此而一下子消失。而且自民党仍旧在主张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在为美国侵略越南承担义务，在推进第四次防卫计划。一部分人不只是和台湾在搞经济交流，而且还在策划和蒋帮勾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继续揭露一切阻挠日中友好的阴谋，进一步加强同各阶层国民的联系，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团结而奋斗，为两国人民永远的和平与友好而奋斗。

《人民日报》社论 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

（一九七二年九月三十日）

日本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前来我国进行访

问。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会见了田中总理大臣，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中日两国总理和外长始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认真、坦率的会谈，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双方于九月二十九日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中日两国之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建立外交关系，尽快互换大使。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两国关系史上的新篇章。中国人民热烈祝贺这一丰硕的成果。

中日两国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这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中日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悠久的友谊。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曾经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人民造成很大的祸害。中国人民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广大的日本人民同极少数的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区分开来，对日本人民遭受的战争祸害怀着深厚的同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积极发展同日本人民的友好关系，日本人民也是始终愿同中国人民友好。日本各阶层人民和友好人士，包括政界、文化界、经济界许多有识之士，不断为促进日中友好而积极努力。正因为这样，二十多年来，尽管两国间的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一直没有间断过，而且日益获得发展。这就为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本着争取同一切愿意和我们和平相处的国家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原则，多年来一直坚持不渝地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争取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则，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这三原则在日本国内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

流。田中内阁成立后，就宣布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并果断地为谋求解决两国关系问题采取了许多实际步骤。我国政府及时作出了积极的响应。中日两国领导人通过富有成果的会谈，终于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是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长期以来希望实现的大事，也是亚洲和世界人民感到高兴的大事。

在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中，我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的事实，就进一步得到了确认。这对那些鼓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谬论的人，不啻是当头一棒。

中日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将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完全可以友好相处。只要本着互相谅解的精神，求大同，存小异，两国之间的种种问题是能够解决的。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一定会更加频繁，经济贸易一定会进一步扩大，文化交流一定会日益广泛。所有这些，都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中国和日本是隔海相望的两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相处，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人民的利益。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中日两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郑重宣布，两国任何一方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毫无疑问，中日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将大大有利于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中日两国有着两千年交往历史，尽管在半个世纪中经历过多次战争的灾难和祸害，但是，中日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瞻望未来，我们深信中日友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途，中日两国伟大的人民一定能够排除各种障碍，世代友好下去。我们决心同日本人民一道，为继续发展中日友好关系而共同奋斗。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在欢迎
日本有关友好团体访华团、
参观团招待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尊敬的藤山爱一郎先生、宫崎世民先生、宫川寅雄先生、冈崎嘉平太先生、木村一三先生、柘植秀臣先生：
各位日本朋友：
同志们：

在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后不久，我们有幸接待日本各有关友好团体访华团、参观团的这么多老朋友和新朋友，并和在北京的日本朋友们一起，欢聚一堂，畅叙友谊，共同庆祝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感到特别高兴。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代表中日友好协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今晚光临这个招待会的全体日本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大家知道，田中内阁成立后表示要加紧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并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我国政府作出了积极响应。前不久，田中总理大臣访问我国，两国政府首脑通过友好、坦率的会谈，达成了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协议，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共同庆贺的。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中日之间战争状态的结束，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在两国关系史上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必将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个月来，两国人民表达的欢欣鼓舞的心情，世界公正舆论作出的良好评价，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日关系的正常化，是两国人民长期共同奋斗的结果。超党派的“议员联盟”、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友好团体，日本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的不少有识之士以及各界、各阶层的许多朋友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为促进日中友好和恢复邦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有的朋友甚至为此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饮水不忘掘井人”，我愿意借此机会，向在座的各位先生，向一切为这一伟大事业出过力的朋友们，表示深切的感谢和由衷的敬意。

随着两国关系的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会更加频繁，交流会更加丰富多彩。“任重道远”，我们应该加倍努力，以期不负两国人民的殷切期望。同时还应该看到，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今后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障碍，极少数人仍在明里暗里进行破坏和捣乱。但是中日两国睦邻关系的发展，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让我们进一步携起手来，继续努力，乘胜前进！

最后，我提议：

为祝贺中日邦交正常化，

为中日两国的关系不断发展，
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万古常青，
为藤山先生、宫崎先生、宫川先生、冈崎先生、木村先生、柘植先生的健康，
为在座的全体日本朋友的健康，
为在座的全体同志们的健康，
干杯！

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团长
廖承志在日中友好协会（正统）
一九七三年度全国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尊敬的主席先生：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能够有机会出席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一九七三年度全国大会，感到十分高兴。我谨代表中日友好协会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并通过你们向长期从事中日友好事业的日本各界朋友和广大日本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同时，我还要对朋友们给予我们代表团的盛情接待和热烈欢迎，表示深切的感谢。

你们的这次大会，是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之后的新形势下召开的。去年九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结束了我们两国的战争状态，实现了两国邦交的正常化。这就为我们两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广泛发展中日友好运动，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途。

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我们两国人民长期以来共同奋斗的结果。在为促进中日友好和争取恢复邦交的斗争中，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是站在前列的。当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时候，你们的组织就建立起来了。二十三年来，你们高举中日友好的旗帜，积极宣传中日友好，促进恢复中日邦交，推动中日两国民间的友好来往，扩大中日友好群众运动的队伍，并且同形形色色破坏中日友好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热烈祝贺你们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并且衷心感谢你们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促进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亲爱的朋友们！随着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中日友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中谱写出更加美好的传之后代的历史，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的光荣任务。

你们的这次大会提出，要更加广泛、深入、细致地开展日中友好群众运动，促进贯彻中日联合声明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大力开展了解中国的活动，推进两国民间的各项交流，扩大组织并和其他友好团体加强合作。我们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预祝朋友们在今后的活动中不断地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我们还预祝，你们这次大会将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通过这次大会同日本各阶层人民更加广泛地团结起来！

朋友们！在今后的共同事业中，中日友好协会将一如既往地同你们紧密合作，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展望未来，中日友好前景无限光辉灿烂。让我们满怀信心，乘胜前进！

中日两国人民的团结友好万岁！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在一九七四年度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的中央总部干部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会长 黑田寿男

副会长 赤津益造 吉田法晴

顾问 市川房枝 伊藤武雄 宇都宫德马 大河内隆弘 冈崎嘉平太 小野思美 胜间田清一 川濑一贯 河原崎长十郎 西园寺公一 坂本德松 佐佐木更三 白石凡 德岛喜太郎 萩原定司 藤田茂 古屋贞雄 松田权六 松本俊一 八百板正

理事长 宫崎世民

副理事长 岩村三千夫 栗原俊夫 三好一

事务局长 榎崎富男

常任理事

中央选出：新井宝雄 岩村三千夫 大武旭 春日嘉一 兼田富太郎 栗原俊夫 小林进 斋藤和弘 斋藤绢江 坂田辉昭 盐谷一夫 岛田政雄 清水正夫 菅原惠庆 菅谷直子 田中稔男 柘植秀臣 津津良涉 榎崎富男 长谷川敏三 坊野正弘 穗积七郎 松冈洋子 松本英一 宫崎世民 三浦赖子 三好一 安井正幸 山崎昇 山下正子 山本悠夫 依田熹家 渡部一郎

地方选出：

北海道 荒哲夫

青森 关晴正

岩手 斋藤权次郎
宫城 佐佐木信男
秋田 丸岛通昌
山形 儿玉智惠
福岛 森新一
茨城 川津子之吉
栃木 饭塚昭吉
群馬 星野勇治
埼玉 桑木健之
千叶 太田茂男
神奈川 手岛博
山梨 长久保孝吉
长野 山口诚
新泻 米冈隆吉
富山 野村芳郎
石川 高野行雄
福井 小藤正忠
静冈 酒井郁造
爱知 浅野秋江
岐阜 多贺秀男
三重 足立梅市
京都 近藤良男
大阪 雨宫礼三 仲西清美
兵库 郡司和男 中岛正夫
和歌山 向井荣一
奈良 北山康夫
鸟取 门胁良治

广岛 玖村芳男
山口 古谷庄一郎 古野竹则
四国 小岛悦吉
福冈 篠原文治 西冈久隆
长崎 丰田正次
熊本 百武秀男
大分 田上光
宫崎 金丸喜代子
冲绳 许田盛喜
东京 片冈健 酒井诚 柘植彗次郎 藤吉一树
力月金治

会计监查 川村统一郎 神宫寺敬 山本庄八
理事

中央选出：浅野芳男 有山兼孝 安藤彦太郎 饭冈邦辅 石江
宗明 石野久男 板井庄作 内山嘉吉 内山正野 梅原
忠博 枝村要作 大类纯 押川俊夫 小野乔 梶谷善久
小池顺子 小岩贞义 小岛正己 小林实弥 近藤宏二
近藤年子 斋藤秋男 榊原二郎 佐佐木晴雄 佐藤重
雄 杉本重藏 铃木信光 武内五郎 田中寿美子 田村
三郎 鸟山稔 中村纪伊 中村正路 长泽松雄 长岛又
男 檀崎弥之助 奈良守康 花谷正男 滨田糸卫 广
泽贤一 藤川夏子 帆足计 细谷喜宪 堀江真一郎 松
田二郎 松山树子 三桥敦子 安永一

地方选出：

北海道 井口江美 松桥久保
青森 鸟谷部孝志 千叶清之助
岩手 藤泽富美 村上朝

宮城 早坂芳雄 高桥満雄
秋田 加藤清重 泷泽金治
山形 新关亨 佐藤栄一
福島 渡部行雄 大槻市郎
茨城 石井贞 櫻井清
栃木 花塚菊徳 大出胜久
群馬 白石一郎 相川彦四郎
埼玉 牛洼宗吉 村山十郎
千叶 菊地年子 加瀬包男
神奈川 矶野孝司 高桥良江
山梨 降矢健二 加地章郎
长野 串原义直 泷泽重人
新潟 常山升 柳贞作
富山 小谷利作 村井敏雄
石川 虎井吉雄 幅崎功
福井 宫崎宗俊 寺山俊介
静岡 乾善吉 铃木重郎
爱知 青山辰男 冈崎温
岐阜 田口诚治 栗本君雄
三重 杉本义雄 冈本文男
京都 川上年子 民内清道
大阪 山本登 堀口恒次 藤田喜正 坂井雅一
兵庫 斋藤正雄 泽田雅利 小泽进 入来一彦
和歌山 片山义一 丸山辉雄
奈良 松本弘 鸟居克之
鸟取 河崎严 田中雄二郎
山口 尾中正春 宇野顺二 川本博义 吉兼弘一

福岡 平山正卫 近藤伸一 高木慎一 露田正二
长崎 森彪 井关幸一
熊本 鹤田义郎 中山弘规
大分 滨田楠生 田中积
宫崎 涩木康雄
鹿儿岛 松尾繁
冲绳 大城贞昭 德岭尚武
东京 阿部达也 伊藤克 今枝二郎 榎本庸夫 小川政
夫 加纳菊 坂田和子 佐藤峰男 泽田一 平野
忠嘉

日中友好运动史年表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四年——

(方括弧〔〕内的是日中友好运动有关背景事项,六角括弧〔〕内的是反友好或与反友好有关的背景事项。)

一九四九年(昭和二十四年)

一月三十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

五月四日 中日贸易促进会成立。

五月二十四日 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成立。

十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十月十日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筹备会成立。

一九五〇年(昭和二十五年)

一月六日 [英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月十二日 召开日中友好协会发起人大会。

二月十四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

二月二十日 《日本与中国》创刊。

三月二十日 协会筹备会开展日本第一次“日中友好周”活动。

四月八日 协会筹备会对“花冈事件”发表声明。

六月二十五日 [朝鲜战争爆发。]

六月二十七日 [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

七月十三日 协会筹备会和华侨总会共同召开“日中友好会议”。

七月十七日 [《每日新闻》刊载造谣中伤的报道,攻击协会是间谍集团。]

九月三十日——十月一日 召开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成立大会。

十月二十五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

十一月十五日 [美国占领军挑起“分发《人民日报》事件”，对协会进行镇压。]

十二月四日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说，没有中国参加的对日和约是无效的。

十二月六日 [日本政府根据美国指令，全面禁止对中国出口。]

一九五一年(昭和二十六年)

一月三十日 [联合国通过中国是“侵略国”的决议案。]

二月二十日 中国各城市召开反对重新武装日本大会。

五月七日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要求召开美、英、中、苏四国会议，讨论对日媾和。

五月十八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劝告各国对中国实行禁运”的决议。巴黎统筹委员会下设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

七月七日 协会开展“反对排除中国的单独媾和、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行动月”。

八月十五日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反对对日和约的美英方案。

八月二十四日 促进日中贸易工会协议会成立。

八月三十一日 协会召开“日中友好会议”，通过“迫切要求全面媾和决议”。

九月四日 郭沫若发表《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

九月八日 [旧金山对日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签字。]

九月十八日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声明，没有中国参加的对日和约无效。

十二月十四日 中国呼吁石桥湛山等人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一九五二年(昭和二十七年)

一月十六日 [日美两国政府发表日本政府为向蒋介石媾和而致杜勒斯的吉田书简。]

一月二十七日 石桥湛山、村田省藏、北村德太郎、铃木一雄等人组成国际经济恳谈会。

四月三日——十二日 召开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参加了会议。

四月十二日 日中友好协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地方二十个支部的代表和中央各界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会上决定了运动方针，反对吉田书简，争取实现和中国媾和。

四月二十八日 [旧金山条约生效。“日台条约”签字。]

四月二十九日 帆足计和宫腰喜助二人到达莫斯科，与高良富一起受到中国的邀请。

五月五日 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声明，不承认旧金山条约和“日台条约”。

五月十四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成立。

五月二十二日 日中贸易促进会议(常任议长山本熊一等)成立。

六月一日 第一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签字。日本方面签字的是高良、帆足、宫腰三人，中国方面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七月?日 [日本参加巴黎统筹委员会。]

七月三日 召开欢迎帆足、宫腰大会(三日于大阪、五日于京都、六日于名古屋举行)。

九月七日 郭沫若发表《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召开之际，致日本人民的公开信》。

十月二日——十三日 在北京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参加会议的很多日本代表抗议日本政府不发出国签证。

十月二十二日 中国政府准许日本船只进入天津与上海的港口。

十二月一日 中国政府通过新华社发表协助在华日本人归国的方针。

十二月十二日 再次成立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

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

一月二十六日 日本红十字会、日中友好协会及和平联络委员会三团体的代表访华,商谈在华日本人归国问题。

二月十七日 中国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会长大谷莹润)成立。

三月五日 日本红十字会等三团体和中国红十字会在北京发表《关于商洽协助日侨回国问题的公报》。

三月二十三日 第一艘归国船“兴安丸”到达舞鹤港。

四月六日 日中贸易促进会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

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 日中友好协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首任会长松本治一郎。

六月一日 日文版《人民中国》于北京创刊。

六月二十日 促进日中贸易地方议员联盟成立全国协议会。

七月二日 送还中国殉难者遗骨船“黑潮丸”开往中国。

七月十二日 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向日本九州地方水灾受害灾民赠送一千八百万日元慰问金。

七月二十七日 [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

七月二十九日 众议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促进日中贸易决议案。参议院于三十一日通过。

九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总理向大山郁夫说明中国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方针。

十月二十九日 第二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在北京签字。郭沫若

谈日中互不侵犯条约。东京都促进日中贸易工会协议会成立。
十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中日关系》。

一九五四年(昭和二十九年)

四月二十五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五一”节口号中有：“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

五月二十七日 众议院通过决议(参议院于二十九日通过)：为感谢协助日侨归国，由日本红十字会邀请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

六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共同声明，确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七月九日——十一日 日中友好协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日中渔业问题，提出解决方针。

七月二十一日 [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字。]

八月十九日 中国政府宣布，特赦四百七十七名日本旧军人战犯。

九月二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宪法。]

九月二十二日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召开成立大会(首任会长村田省藏)。

九月二十七日 日中友好协会派遣第一个文化学术代表团(团长安倍能成)访华。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也同时访华。

十月十一日 周总理向文化学术代表团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说明新中国的对日政策和邦交正常化问题。

十月二十八日 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风见章)成立。

十月三十日 中国第一个访日代表团——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来日。

十一月十三日 日中渔业协议会(会长村山佐太郎)成立。

十二月十日 鸠山内阁成立。

十二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论日本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

一九五五年(昭和三十年)

一月八日 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访华。

二月十一日 久原房之助就任恢复日中、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松山芭蕾舞团开始在日本演出《白毛女》。

三月二十九日 中国贸易代表团(雷任民团长以下共三十七人)来日。

四月十五日 第一次日中渔业协定在北京签字。

四月二十二日 经济审议厅长官高碕达之助和周总理在参加万隆会议期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举行会谈。

五月四日 第三次日中贸易协定在东京签字。

六月九日 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学术代表团(学术会议会长茅诚司和学术院代表南原繁、大内兵卫等)。

九月三日 日中友好协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有二百多个支部和支部筹备会)。

十月五日 日中友好协会应中国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决定派市川猿之助歌舞伎剧团进行访华演出。

十月十七日——十一月三日 在东京(晴海)首次举办中国商品展览会,有六十七万人参观。

十一月十六日 发表片山哲、周恩来联合公报,强调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必要性。

十一月二十四日 日中进出口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成立。

十一月二十七日 日中文化交流协定签字。

十二月一日 中国科学院访日学术考察团(团长郭沫若)应日本学术会议的邀请来日。中国商品展览会在大阪(中之岛)开幕,至十二月十五日共有一百二十三万人参观。

一九五六年(昭和三十一年)

- 三月二十三日 日本中国文化交流协会成立。
- 三月三十日 众议院决议促进日中贸易，争取放松巴黎统筹委员会的限制。
- 四月二日 中国乒乓球代表队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二十三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 五月二十六日 日中友好协会和朝日新闻社共同邀请中国梅兰芳京剧团到日本各地演出。
- 六月二十一日 中国政府免于起诉并开释三百三十五名日本战犯。
- 六月二十八日 中国红十字会与日本红十字会等日本人归国问题三团体的代表，签署关于战犯家属来华探望及协助日本妇女回国探亲等问题的天津公报。
- 七月二十一日 日中友好协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争取邦交正常化列为日中友好运动的第一项方针。
- 九月四日 毛主席接见日本旧军人代表团(团长远藤三郎)。
- 九月十五日——二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 十月六日 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开幕。毛主席亲临参观。至二十九日共有一百二十五万人参观。
- 十月十九日 [日苏恢复邦交。]
- 十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认为日本“今后应该尽速实现同中国恢复邦交”。
- 十一月七日 中国总工会代表团(团长董昕)来日。
- 十一月十一日 周总理接见日本文学代表团(团长青野季吉)。
- 十一月二十四日 中国渔业代表团到达东京。
- 十二月一日 日本商品展览会在上海开幕。至二十六日共有一

百六十八万人参观。

十二月十二日 众议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促进日中贸易的决议，内容是要求放松巴黎统筹委员会和对华出口管制委员会的限制以及设立民间商务代表机构等。

十二月十八日 [日本加入联合国。]

十二月二十三日 石桥内阁成立。

一九五七年(昭和三十三年)

二月二十五日 岸信介内阁成立。

四月二十二日 日本社会党第一次访华使节团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共同声明，谴责“两个中国”的政策。

四月二十五日 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六月二日 [岸首相在台北发表谈话，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

六月四日 日中渔业协定延长一年。

六月五日 [岸首相访美，二十一日和艾森豪威尔发表联合公报，鼓吹“日美新时代”，暗示了要修订安全条约的方针。]

七月二十五日 周总理谴责岸信介首相在台北的谈话。

七月二十七日 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理事长风见章)成立。

七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岸信介首相敌视中国的政策。

八月十九日 日中友好协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恢复日中邦交作为运动的中心。

十月十日 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代表团(团长小畑忠良)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共同声明，谴责“两个中国”政策。

十月二十八日 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松本治一郎)和中国五团体发表共同声明。

十一月十八日 [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莫斯科宣言。]

十二月六日 第二次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团长李德全、副团长

廖承志)来日。

一九五八年(昭和三十三年)

一月五日 中国敦煌艺术展览会在东京开幕。

一月二十四日 西园寺公一去北京就任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
联络委员会副秘书长。

二月一日 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广州开幕,至二十四日共有七十
六万人参观。

二月九日 在北海道积雪的深山中发现刘连仁。

二月十一日 陈毅副总理担任外交部长。

三月三日——五月一日 松山芭蕾舞团在北京演出《白毛女》。

三月五日 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签字。

三月二十日 [台湾就第四次协定中关于国旗的问题向日本政
府抗议。]

四月一日 [岸信介首相发出给蒋介石的亲笔信。]

新华社谴责岸给蒋的亲笔信是对中国的敌视。日本商品展览
会在武汉开幕。至二十四日共有七十四万人参观。

四月九日 [爱知官房长官发表谈话,不承认第四次日中贸易协
定中悬挂国旗的权利。]

四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谴责岸信介政府破坏第
四次贸易协定。

四月十六日 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李德全就刘连仁事件谴责日本
政府。

五月二日 [长崎发生侮辱中国国旗的事件。]

五月九日 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谈话,谴责岸信介政府
敌视中国,容忍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日中贸易被迫中断。

五月十九日 中国歌舞团中断在东京的演出回国。

五月二十日 召开打开日中关系紧张局面国民大会。

六月十一日 中国拒绝延长日中渔业协定，并在电报中提出了“政治三原则”。

六月二十五日 花柳舞蹈团访华。

七月七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廖承志向宫崎世民等人正式谈到政治三原则。

七月二十六日 日中友好协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为反对岸信介政府和美国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而斗争的方针。

八月十四日 [金门、马祖发生空战，美蒋军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挑衅。]

八月二十日 [报道人民公社化运动。]

十月四日 [修订日美安全条约开始谈判。]

十月十日 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和中国三团体（对外文化协会、和平委员会、红十字会）发表共同声明。

十月十四日 [岸信介首相通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发表广播讲话，污蔑中国是侵略者。]

十月二十六日 [二十五万中国人民志愿军撤退完毕。]

一九五九年（昭和三十四年）

一月二十七日 日中关系十一个团体的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发表关于立即打开日中关系的共同声明。

二月十三日 周总理接见总评事务局长岩井章，同意向日本供应漆和甜栗子等照顾物资。

三月十二日 社会党第二次访华使节团团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讲演说：“美帝国主义是日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三月十三日 [自民党干事长福田赳夫对浅沼发出抗议电。]

三月十七日 社会党第二次访华使节团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共同声明。

三月十九日 [达赖喇嘛等在西藏发动叛乱。]

四月十五日 [举行反对安全条约第一次统一行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辞职。]

八月七日 [印度军队侵犯中国边境。]

八月二十九日 日中友好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员一万一千人)修改会章,强调了要和阻挠破坏恢复邦交的势力作斗争的方针。

九月十五日 [赫鲁晓夫访美。]

九月二十日 周恩来和石桥湛山签署会谈公报,明确提出政治和经济不可分割的原则。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内山完造到达北京,突然病逝。

十月一日 七十一个团体在东京千駄谷体育馆举行有五千人参加的“实现恢复日中邦交、庆祝中国建国十周年国庆节中央集会”。

十月二十一日 日本庆祝中国国庆节代表团(片山哲团长等三十人)和中国七团体发表共同声明。

十月二十五日 周总理和松村谦三会谈。

十月二十九日 中国向伊势湾台风受害者赠送慰问金。

十一月二十七日 [举行阻止修订安全条约第八次统一行动,向国会请愿的示威游行队伍约两万人冲进国会的院内。]

十二月二十九日 [日本决定由岸信介首相等人组成签署新安全条约全权代表团。]

一九六〇年(昭和三十五年)

一月十二日 中国各团体为阻止安全条约第十一次统一行动发来鼓励电报。

一月十四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批判“新日美安全条约”。

一月二十日 [新日美安全条约在华盛顿签字。]

二月十日 [岸信介首相在国会答辩说,修订的“安全条约”的远

东范围包含金门、马祖。〕

四月四日 日中文化关系恳谈会等主持召开“反对批准安全条约请愿大会”。

四月二十六日 举行追悼中国俘虏殉难者国民大会。

五月二日 总评访华团、中国总工会和朝鲜职业总同盟等三国工会在北京发表反对安全条约的联合声明。

五月九日 北京召开有一百多万人参加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大会”。从这天开始的支援周，在三十三个城市共有一千二百万人举行集会示威，声援日本各地的第十六次统一行动。

五月十一日 日中关系企业界为阻止批准新安全条约，呼吁恢复日中邦交，举行有六十辆车参加的汽车游行。

五月十九日 一万名示威群众包围国会，反对自民党单独通过“新安全条约”。

五月二十八日 〔李承晚流亡夏威夷。〕

五月三十日 日中友好协会派遣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团长濑越宪作）。

六月三日 日中关系二十八个团体声明，要求停止艾森豪威尔访日。

六月四日 〔六百五十万人参加全国统一行动。〕

六月十日 〔哈格蒂（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来日，在羽田机场遭遇阻止艾森豪威尔访日的斗争，哈格蒂乘直升飞机脱逃。〕

六月十五日 二百一十一个产业工会共五百八十万人参加第二次行使实力的斗争。桦美智子在向国会示威游行中被警察机动队打死。

六月十六日 东西方贸易四团体召开“阻止安全条约、立即解散国会、要求岸信介下台的东西方贸易有关企业家大会”。日本

决定无限期推延艾森豪威尔访日。

六月二十三日〔“新安全条约”生效。〕协会声明不承认该条约。

岸信介首相提出辞职。

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日本人民的新胜利》。

七月十八日 池田内阁成立。

七月二十三日 日中友好协会召开成立十周年跃进大会。

七月二十九日 中国代表团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这是中国代表团自日中关系中断以来第一次来日。

八月二十四日 日本话剧团在北京的演出开幕。

八月二十七日 周恩来总理接见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提出贸易三原则,由此而开始了友好贸易。

十月三日 阻止安全条约国民会议代表团等日本十二个团体的代表团和中国的八个团体发表共同声明。

十月十一日 周总理接见高碕达之助。

十月十二日 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遇刺逝世。

一九六一年(昭和三十六年)

一月二十日〔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

一月三十一日 日本经济友好代表团(团长山本熊一)作为贸易中断后第一个大型经济代表团访华。

二月十日 召开“要求实现日中政府间贸易协定全国企业家大会”,一百五十个行业共四百人参加。

三月二十八日 中国作家代表团来东京参加第二次亚非作家会议。

四月四日 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开幕。北京广播电台特别为此开设了白天的对日广播。

四月八日 东京召开恢复日中邦交国民总动员大会。

四月十五日 第九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自日中贸易中

- 断后首次邀请了三十八家友好公司(四十人)。这个交易会以后成为友好贸易的主要场所。
- 五月十四日 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宫崎世民)和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发表共同声明,表示坚持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开展文化经济交流。
- 六月二十三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
- 七月二日 日中友好协会机关代表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在北京签订一九六二年度日中两国人民间文化交流计划议定书。
- 七月十四日 日本政府拒绝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入境。爆发抗议日本政府的斗争。
- 八月五日 日中友好协会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开展反对“两个中国”政策的运动。
- 八月二十八日 日中友好协会派遣的首次地方自治友好代表团(团长为福冈县鹤崎知事)到达北京。
- 九月二十九日 日中贸易、友好关系三十个团体联合召开“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央大会”,有一千人出席参加。
- 十月七日 毛主席接见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等。毛主席说:“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
- 十月十二日 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分别与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发表共同声明。
- 十月二十四日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参加苏共二十二大中途回国]。
- 十一月二十日 中国文化代表团(团长楚图南)来日。

十一月二十四日 召开实现恢复日中邦交、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全国统一行动中央大会。

十一月二十五日 [阿尔巴尼亚和苏联断交。]

十二月十五日 [联合国大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指定为重要事项，日本是共同提案国之一。]

十二月二十六日 [福特财团决定给东洋文库的中国研究补助津贴。]

一九六二年(昭和三十七年)

一月十三日 社会党第三次访华代表团(团长铃木茂三郎)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共同声明。

四月二十三日 中国电影代表团来日。

六月一日 东西方贸易五团体共同召开“突破经济危机、促进东西方贸易全国企业家大会”。

七月三日 日中友好协会举行集会，抗议美国在台湾海峡的军事挑衅。

七月五日 中国研究工作者三百人集会，反对中国研究计划依靠亚洲福特基金。

七月六日 日中关系十个团体举行集会，纪念“七·七事变”二十五周年，要求恢复日中邦交。

七月八日 中国围棋代表团(团长李梦华)首次来日。

九月十六日 周恩来总理和松村谦三会谈，开辟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的渠道。

九月十八日 毛主席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团的要求，赠送亲笔题词。

十月七日 杭州市和岐阜市举行交换日中友好碑文典礼。

十月十五日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贸易促进会和日中友好协会向广州交易会派出联合事务局。

十月二十二日〔“古巴危机”发生。〕

十一月九日 高碓达之助和廖承志签订备忘录，规定了为期五年的长期综合易货贸易和延期付款办法，开始了“廖承志—高碓达之助贸易”。

十一月十三日 在东京召开“打开日中关系、促进贸易企业家大会”，决议“支持廖承志—高碓达之助贸易备忘录，排除外国对日中贸易的非法干涉”。大阪、福冈、名古屋也召开了同样的会议。

十二月三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日美经济联合委员会上，要求日本积极协助推行“遏制中国政策”。〕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该协会关西总部、日中贸易促进会三团体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关于加强友好贸易、相互举办商品展览会等的议定书。

一九六三年(昭和三十八年)

一月二十三日 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团长平塚常次郎)会见周总理，要求重新缔结中断的日中渔业协定。

二月一日 北京杂技团来日演出。

五月二十五日 日中友好协会第十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都开幕，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六月十四日 东京举行集会，纪念《人民中国》创刊十周年。外文出版社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国共产党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

七月一日 日文版《北京周报》创刊。

八月二十日 日本政府正式批准“廖承志—高碓达之助贸易”的第一批交易——向中国出口仓敷人造丝公司的维尼纶成套设备(七十三亿五千八百万日元、分五年延期付款)。

九月六日 中国油压机代表团来日。

九月十一日 中国艺术团(团长林林)来日演出。

十月一日 毛主席接见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

十月三日 北京举行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纪念。

十月四日 中国日本友好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日友好的里程碑》(十月五日)。

十月五日——三十日 北京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一百二十三万人参观。

十一月九日 重新签订中断五年之久的日中渔业协定。

十二月十日——三十一日 上海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一百二十五万人参观。

一九六四年(昭和三十九年)

一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主席发表谈话，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斗争。中法两国政府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共同声明。

二月十三日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松本治一郎等二十五位知名人士发表呼吁书，号召开展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运动。

三月六日 中国释放最后三名日本战犯。

三月十八日 中国的排球代表队首次来日。

四月一日 [日本政府拒绝中国经济友好代表团随员吴学文入境。]

四月十日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东京开幕。至三十日共有八十一万人参观。

四月十九日 根据松村谦三和廖承志的会谈，交换了关于交换新闻记者及互设联络办事处的备忘录。

四月二十日 争取恢复日中邦交三千万人签名运动开始。

四月二十五日 日中友好协会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五月十九日 石桥湛山就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总裁。

五月三十日 [吉田前首相给台湾的张群发出向中国出口成套

设备不使用进出口银行的所谓“吉田书简”。]

六月十三日 中国经济展览会在大阪开幕。至七月五日共有一百五十二万人参观。

六月二十一日 第一艘中国轮船“燎原号”进入门司港。

七月七日 毛主席接见佐佐木更三等人，明确支持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领土。

七月二十二日 [日本政府拒绝参加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赵安博、王照华等人入境。]

八月十三日 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孙平化等人来日。

八月二十一日 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幕。日本六十一人参加。

九月二十九日 日中双方交换记者。

十月十五日 [苏联公布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

十月十六日 [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周总理建议召开讨论禁止核武器的世界首脑会议。]

十月二十九日 社会党第四次访华代表团(团长成田知巳)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共同声明。

十一月九日 佐藤内阁成立。

十一月二十日 [日本法务省拒绝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入境。]

一九六五年(昭和四十年)

一月十三日 [佐藤首相和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公报。]

二月七日 [美国飞机开始全面轰炸北越。]

二月八日 [佐藤首相发表谈话,在对中国的延期付款上不能使用进出口银行。日立造船所的货轮出口合同失效。]

四月二十二日 日中贸易关系团体召开“要求彻底实行进出口银行通融资金全国企业家大会”。

四月二十六日〔日本政府向蒋介石提供相当于一亿五千万美元的日元贷款。〕

四月三十日〔日纺公司的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也因“吉田书简”而失效。〕

五月十四日〔中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

六月四日 中国民族歌舞团来日演出。

六月二十八日 接到中日友好协会等三团体发来关于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的邀请信。

七月二十九日 中国总工会代表团(团长唐章)来日。

八月十二日 第一次日本学生友好访华参观团访华。

八月十八日〔佐藤政府发给参加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的三百名代表出国护照，对剩下十五个团体的一百九十二名代表宣布停发护照，爆发向日本政府抗议和要求签发出国护照的斗争。〕

八月二十五日 北京召开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万人欢迎大会，日本代表团、第一次日本学生友好访华参观团出席了大会。

八月二十六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参加大联欢的日本青年代表。

九月二十三日 日中友好协会第十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团长杨康华)出席参加。

十月一日 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日本代表团剩下的全体成员获得出国签证，出发访华。

十月四日——二十日 在北京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六十五万人参观。

十二月一日——二十二日 在上海举办日本工业展览会，八十一万人参观。

十二月十七日 修订的日中渔业协定签字。

一九六六年(昭和四十一年)

一月二十二日 日中贸易促进会友好代表团(团长川濑一贯)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表共同声明。

二月四日 《人民日报》评论佐藤首相的施政演说是“日本反动派亲美、联苏、反华的自白书”。〔日共《赤旗》报登载论文《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行动和统一战线》，主张联苏，影射攻击中国。〕

二月十日 〔“日共”宫本代表团到达上海。访问越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后，二月二十八日到达北京，三月二十八日回国。因意见分歧未发表共同声明。〕

三月二十九日 〔政府拒绝社会党邀请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代表团(团长胡愈之)入境。〕

四月六日 东南亚经济开发部长级会议在东京开幕。松山芭蕾舞团在日本首次演出中国芭蕾舞剧《小刀会》。

四月十九日 中国电影代表团(团长岳林)来日。

四月二十三日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通知日本的中国展览会全国协力会，十月一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九州市、十一月二十日至十二月十日在名古屋市举办一九六六年中国展览会。

四月二十八日 中国摄影代表团(团长吴印咸)首次来日。

五月五日 中国男女乒乓球代表团(团长陈先)来日。

五月十一日 〔“日共”《赤旗》报社论强调“独立自主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影射攻击中共。以后向有关党员秘密传达不协助中国展览会和反对日中交流的方针。〕

五月十六日 〔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六通知》，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方针。〕

五月十七日 周总理和松村谦三会谈，同意延长“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

五月二十六日 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团长曾生)应日中友好协会

的邀请来日。

六月一日 北京广播事业局代表团(团长胡若木)应日中友好协会的邀请来日。

六月十日 中国围棋代表团(团长仰柱)应日中友好协会的邀请来日。

六月十八日 中国展览会全国协力会(会长川濑一贯)正式成立。

六月二十四日 亚非作家会议日本协议会代表团(团长白石凡)访华。

六月二十五日 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文迟)应日本青年团体协议会的邀请来日,向各团体转达了关于参加第二次青年友好大联欢的邀请。另外还转述了欢迎中国青年代表团实行委员会所邀请的以钱大卫为团长的访日青年代表团,长期在香港等待日本政府发给入境签证的情况。欢迎中国青年代表团实行委员会开会,日中友好协会建议由协会申请签证手续来加快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钱大卫)的入境。参加实行委员会的团体之一——日本民主青年同盟根据“日共”的指示,拒绝协会的建议。

六月二十九日 河野谦三一行访华。

七月五日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发表关于日中文化交流的声明。

七月八日 [民主青年同盟根据“日共”的指示,拒绝接受第二次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的邀请。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钱大卫)在香港等了五十天,得知由于“民青”的阻挠而得不到入境签证后返回北京。]

七月十七日 在日中友好协会第十一次常任理事会上(六月末会员人数达六万),追随日共中央的盲从分子主张反对青年友

好大联欢,但多数理事反驳了这一主张,决定参加第二次青年友好大联欢。

七月二十日 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再次单独向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钱大卫)发出邀请电。

七月二十三日 北京科学讨论会开幕。日本二十八人参加。

七月二十六日 [法务省拒绝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入境(由于“日共”进行了阴谋活动)。]

七月二十九日 [“日共”干部会紧急召开全国统一战线部长会议,指示自下而上地来推翻日中友好协会的决定。]

八月三日 日中友好协会派遣的传统医学代表团(团长柏木正一)出发访华。十六国代表反对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反华的做法,退出了大会。

八月八日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日共”《赤旗》报发表《再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國際统一行动和统一战线》。]

八月十日 中国展览团先遣队张子泉秘书长等来日。

八月十四日 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钱大卫)应日本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的邀请来日。

八月十九日 中日友好协会等中国方面邀请的团体发表关于第二次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的谈话。

八月二十日 [“日共”《赤旗》报发表社论《争取国际友好运动的正确发展》。]

八月二十九日——三十日 中国展览团团长张子泉谴责占据中国展览会协力会事务局的破坏分子。在日中友好协会第十二次常任理事会上,追随“日共”中央的盲从分子再次反对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反对普及《人民中国》、《北京周报》和《中国画报》三种中国杂志,反对向听众普及“北京广播”。激烈辩论

的结果,盲从分子的意见遭到否决。

八月三十日 要求参加第二次青年友好大联欢的达五十一个团体、四百八十名代表。

九月五日 [“日共”中央开除该党山口县五名县委。从此在各个领域不断开除党员。]

九月十三日 天津歌舞团来日。〔“日共”《赤旗》报发表社论《争取东西方贸易促进运动的正确发展》,影射攻击中国展览团及其协助者。〕

九月十四日 自民党亚非研究会决议,反对联合国将中国代表权按指定重要事项的方式处理。

九月十九日 日中贸易促进会紧急理事会解除隅井、冈本等“日共”系统干部的职务。

九月二十日 [日本政府通告,拒绝给第二次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的代表发出国签证。]

九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阻挠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是美日反动派、苏联修正主义及其追随者的阴谋。

九月二十六日 日本三十二名各界人士发表《面临国内外危机,为促进日中友好,再告国民书》。

九月二十七日 中国渔业代表团(团长王云祥)应日中友好协会的邀请来日。

十月一日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北九州市开幕。至二十一日共有一百五十六万人参观。

十月三日 北京举行中日友好协会成立三周年纪念会。陈毅、郭沫若等谴责阻挠日中友好的破坏分子。

十月五日 中国各界代表五十二人发表声明,支持日本三十二人的声明。

十月九日 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访华代表团和中国亚非团结委

员会发表共同声明。

十月十一日 北京歌舞团来日。

十月十二日 日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表共同声明。

十月二十四日——三十日 [“日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提出反华路线。]

十月二十五日 [在日中友好协会全国常任理事会上,“日共”分子围绕着批准协会代表团签署的日中共同声明问题 进行阻挠,破坏了会议。]

十月二十六日 在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的旗帜下,清除了“日共”破坏分子,着手整顿全国组织。日中贸易促进会解散。

十月二十七日 中日友好协会给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发来支持电报。

十一月十一日 坂本德松等人在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日本委员会里清除“日共”分子,整顿组织。

十一月十五日 中国各团体通过日中友好协会(正统),赠给日本原子弹受害者一千八百万日元慰问金。

十一月十九日 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名古屋市开幕。至十二月十一日共有二百七十七万人参观。

十一月二十二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会长松本治一郎逝世。

十二月七日 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杨蕴玉)来日。

一九六七年(昭和四十二年)

一月十八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机关代表和中日友好协会的会谈纪要及一九六七年度交流计划在北京签字。

二月十日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对外文化协会的日中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备忘录及一九六七年度交流计划书签字。中国

研究所开除前所长平野义太郎等“日共”分子。

二月二十七日 日中贸易六团体代表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签订关于促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好贸易议定书。

二月二十八日 [发生善邻学生会馆事件。伪日中友好协会在东京的善邻学生会馆袭击中国学生。]

五月二十九日 日中友好宗教家恳谈会成立。

六月四日 日本科学仪器展览会在天津开幕。

六月十七日 [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六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召开第十六届代表大会。[日本政府不给出席大会的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入境签证。]

七月七日 “七·七事变”三十周年。日本各界八十五人组成纪念事业实行委员会，向全国发出呼吁。

七月二十三日——十一月三十日 齿轮座访华演出。

八月二十九日 举行“全国友好商社阻止佐藤访问台湾、南越动员大会”及汽车游行。

九月七日 阻止佐藤首相访台，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在羽田机场举行静坐斗争。

九月八日 [右翼分子袭击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

九月二十七日 举行“阻止佐藤首相访问南越、反对全面破坏日中关系、打倒佐藤内阁企业家大会”。

十月四日 召开阻止佐藤首相访问南越、反对参加美帝的侵略战争、反对破坏国民生活、反对全面破坏日中关系和日中贸易、打倒佐藤内阁国民大会。

十月九日 中国东方红杂技团应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的邀请来日。至十二月八日为止，在二十二个城市四十五个会场演出，

观众达十万人。

十一月十五日〔佐藤、约翰逊联合公报发表。〕

十一月二十七日〔台湾的蒋经国来日。〕日中关系团体在羽田机场集会抗议。

十一月二十九日〔政府借口“羽田事件”，非法搜查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及该协会的关西总部等，日中关系各团体发表声明抗议。〕

十二月四日〔政府逮捕在北海道协助东方红杂技团演出的华侨总会的陈学全。〕

十二月二十日 日中渔业协定暂定延长一年。

一九六八年（昭和四十三年）

三月六日 日中备忘录贸易会谈公报签字，其中承认政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的原则，并商定了一九六八年度的贸易。“廖承志—高碕达之助贸易”改称为“备忘录贸易”。

三月十九日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六个组织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之间的《会谈纪要》签字，对阻挠日中友好和贸易的敌人进行谴责。

四月十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机关代表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的会谈纪要在北京签字。

四月十二日 欢迎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万吨远洋货轮“东风号”进入横滨港。

五月十六日 毛泽东主席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

七月十九日——二十一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召开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

七月二十五日 日中进出口组合解散。

八月二十日〔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九月五日 除台湾外中国各省全部成立革命委员会。

九月十八日 毛主席为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代表团题词六周年纪念日，发表毛主席的题词。

十一月六日 [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

一九六九年(昭和四十四年)

三月二日 [苏联军队侵犯中国边境，挑起珍宝岛事件。]

三月十五日 [发生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第九次常任理事会事件。围绕事件处理，组织产生不正常状况。]

三月二十二日 日本工业展览会在北京开幕。佐藤政府不准展出十九种产品，开幕式变成了抗议佐藤政府的反华政策的集会。展览会于四月十一日闭幕。

四月一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二十四日闭幕。

四月四日 日本工业展览会第二十七次理事会发表声明，抗议佐藤政府中止在上海举办展览会。日中备忘录会谈公报签字，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日美安全条约是对中国和亚洲的威胁。

五月十五日 友好商社和中国在广州签署关于进口中国食用肉会谈纪要。

六月十日 [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

八月十四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在全国放映电影《新沙皇的暴行》，举办摄影展览，揭露苏联侵犯中国领土的罪行。

八月十七日 [中国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天津(十八万人)、上海(四十万人)等地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十一月二十一日 [佐藤、尼克松联合公报发表。]

一九七〇年(昭和四十五年)

三月十三日 大阪召开“打开日中关系、反对万国博览会的‘台湾馆’(‘中华民国’馆)全国企业家大会”，大阪市内举行汽车

示威游行。

三月十八日 [在美国挑动下,柬埔寨发生朗诺军事政变。]

四月七日 周恩来总理和金日成首相在平壤签署中朝联合声明,表示要共同和日本军国主义斗争。

四月十四日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七个团体和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发表共同声明。

四月十九日 日中备忘录贸易会谈纪要签字。周总理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七个团体的代表(十五日)及备忘录贸易代表,提出推进日中贸易的四项条件。

四月二十四日 [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在中国的广州召开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二十七日发表联合声明。]

四月二十五日 [周恩来总理在庆祝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大会上致词。]

四月二十八日 [中国政府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

五月一日 [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宣布成立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

五月二十日 毛主席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

五月二十二日 松山芭蕾舞团改编的《白毛女》开始在日本演出。

六月二十日 日中渔业协定议定书签字,并发表会谈公报。

七月六日 [“日华协力委员会”在东京召开会议,经济界受到邀请的人士百分之七十缺席。]

七月九日 在大阪召开反对“万国博览会台湾馆”全国企业家大会。

八月十八日 中国和出席“日华协力委员会”的企业断绝贸易往

来。在中国居住十三年之久的西园寺公一归国。

十月十二日 北京举行浅沼殉难十周年纪念会。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代表团和社会党纪念浅沼访华团出席了纪念会。

十月十三日 [中国和加拿大建交。]

十月二十四日 社会党第五次访华代表团（团长成田知己）到达北京，十一月一日和中日友好协会发表共同声明。

十二月九日 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成立。

十二月十三日 日中邦交正常化国民协议会成立。

十二月三十一日 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和中国渔业协议会代表团发表会谈公报。

一九七一年（昭和四十六年）

二月一日 日中乒乓球团体会谈纪要签字。中国乒乓球队决定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二月二十六日 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成立。

三月一日 日中备忘录贸易会谈公报签字，谴责日蒋朴“联合委员会”“联合开发”中国大陆架海底资源的阴谋。

三月二十八日 中国乒乓球队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四月十一日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六月十七日 [“归还冲绳协定”签字。]

七月二日 公明党代表团（团长竹入义胜）和中日友协发表共同声明，明确记载恢复邦交的五项条件。

七月十五日 [中美两国政府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以前访华。]

八月二十一日 松村谦三逝世。

八月二十六日 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王国权等参加松村谦三的

葬礼。

八月二十九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召开团结胜利的全国大会。协会组织正常化。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出席了会议。

九月十五日 关西财界访华团（团长佐伯勇）访华。

九月二十五日 松山芭蕾舞团访华，开始演出改编的《白毛女》。

十月二日 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代表团和中日友协发表共同声明，确认复交四原则。

十月十六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代表团和中日友协发表共同声明。

十月二十五日 [联合国大会通过阿尔巴尼亚等二十三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驱逐蒋介石集团”的决议案。]

十一月十二日 东京经济人访华团（团长东海林武雄）访华。

十一月十五日 [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

十一月二十日 恢复日中邦交国民会议代表团（团长飞鸟田一雄）和中日友协发表共同声明。

十二月四日 [印度和巴基斯坦爆发全面战争。]

十二月二十一日 日中备忘录贸易会谈公报签字。

十二月三十日 中国外交部就钓鱼岛问题发表声明。

一九七二年（昭和四十七年）

一月五日 [佐藤和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会谈。]

一月六日 陈毅副总理逝世。

一月十五日 齿轮座第二次访华演出在北京开幕。

一月十七日 日本精密仪器专业展览会在天津开幕。

一月二十一日 周总理会见日本总评和中立工会联络会议代表团、社会党“七〇年会”友好访华团及冲绳县第一次友好访华

团。

二月二十一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到达北京，会见了毛泽东主席。]

二月二十八日 [中美发表联合公报(上海公报)。]

三月一日 在日比谷公会堂召开恢复日中邦交国民大会。

三月四日 河原崎长十郎开始在日本全国演出《屈原》。

三月六日——二十日 在上海举办一九七二年日本工作母机展览会。

三月十一日 [右翼分子不断在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前挑衅。]

三月二十二日 召开反对“限制进口”中国生丝关西大会。

四月十日——二十三日 在天津举办一九七二年日本建筑机械展览会。

四月十三日 民社党访华团(团长春日一幸)和中日友好协会发表共同声明。

四月十七日 周总理接见三木武夫(二十一日再次接见)。

五月十一日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来日。

五月十五日 冲绳“归还”日本。

周总理接见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

六月十七日 佐藤首相表示准备引退。

七月三日 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夫妇到任。

七月七日 田中内阁成立。

七月九日 周总理发表谈话，认为“田中政府声明要努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值得欢迎的”。

七月十日 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来日。

七月十七日 中国农业农民代表团来日。

七月十八日 田中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决定了对在野党关于恢复日中邦交的质询的答辩书。

七月二十二日 周总理接见日本排球代表团。大平外相接见孙平化、肖向前。

七月二十七日 周总理接见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二十九日再次接见）。

八月十一日 周总理接见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会长黑田寿男。大平外相接见孙平化、肖向前，转达田中首相的访华决定。

八月十二日 姬鹏飞外长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欢迎并邀请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八月十六日 中国上海舞剧团乘羽田—上海直达机归国。

八月十八日 中国银行和东京银行签订关于日元人民币结算议定书。

八月十九日 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在东京和田中首相及大平外相会谈。

八月二十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在东京日比谷露天音乐堂主持召开“立刻实现恢复日中邦交中央大会”，来自全国的各界代表六千人参加了大会。

八月三十日 周总理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专务理事萩原定司和日本经济人访华团团长稻山嘉宽，指出正常化以后的日中贸易要靠政府和民间两条腿来推进。

九月十二日 周总理接见古井喜实、田川诚一、松本俊一等人。

九月十四日 自民党访华团（即自民党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一行）到达北京。

九月二十五日 田中首相一行访华。

九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主席接见田中首相等人。

九月二十九日 日中联合声明签字。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

十月二十三日 中日友好协会邀请日本民间代表，庆祝恢复日中邦交，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

十月二十九日 作为复交纪念，北京举行日本的大山樱和落叶松树苗移交仪式。

十一月四日 作为复交纪念，东京举行中国赠送熊猫仪式。

十一月九日 众议院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关于日中联合声明的决议。

一九七三年(昭和四十八年)

一月十一日 开设日本驻中国大使馆。

一月十八日 周总理接见中曾根通产相访华团。

二月一日 开设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二月十三日 廖承志会长接见日中渔业协议会代表团。

二月二十日 李先念副总理接见日本友好贸易代表团(团长萩原定司)。

三月八日 日本航空协定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

三月十日 日中航空协定谈判开始。

三月十一日 日中友好妇女代表团(团长小野恩美)到达北京。

三月十八日 廖承志会长接见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理事长宫崎世民。

三月十九日 中国工人代表团到达东京。

三月二十二日 中国电信总局局长钟夫翔到达东京。二十三日会见邮政大臣久野忠治。

三月二十七日 中国首任驻日本大使陈楚到达东京。

三月三十一日 日本首任驻中国大使小川平四郎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华团到达北京。

四月五日 北京举行欢迎日本相扑访华团招待会。

四月十五日 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团长廖承志)乘专机离开北京,十六日到达东京。

四月十七日 田中首相欢迎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

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召开一九七三年度全国代表大会。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

四月二十九日 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访华团到达北京。久野邮政大臣到达北京。

五月二日 中日友协代表团分成四个分团去日本各地访问。

五月四日 铺设日中海底电缆协议在北京签字。

五月十日 松山芭蕾舞团开始在日本演出《红色娘子军》。

五月十四日 田中首相接见访日代表团廖承志团长。

五月十八日 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由羽田机场归国。

五月二十六日 日本自治体首长访华代表团(团长是岩手县知事千田正,顾问为和歌山县知事大桥正雄)到达北京。六月四日会见郭沫若副委员长。

六月六日 中国出土文物展览会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开幕。

六月十六日 中国外文出版社代表团到达东京。

六月十九日 日本自动化、电子仪器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大阪、京都、神户市长代表团到达北京。二十四日宣布神户与天津结为友好城市。

六月二十七日 北京举行移交日本人遗骨仪式。

七月二十四日 日中两国围棋赛在北京开始。

八月二日 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团长河野谦三)。

八月八日 东京银行和中国银行签署日元人民币结算新协定。

八月十七日 在东京开始谈判日中贸易协定。

九月五日 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经济界访华代表团(团长植村甲午郎)。

九月十一日 中国经济贸易友好访日代表团(团长刘希文)到达东京。

九月十四日 兵库县“青年海洋大学”一行到达北京。

九月十九日 三重县“青年海洋大学”一行到达北京。

九月二十六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代表团(团长宫崎世民)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团长宫川寅雄)到达北京。

九月二十八日 中日友好协会举行庆祝中日复交一周年宴会。

同日驻日陈楚大使、三十日驻华小川大使分别举行庆祝宴会。

十月九日 周总理接见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代表团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

十月十日 中华医学会医学考察访日友好代表团(团长孙金城)和中国体育代表团到达东京。

十一月二十七日 日中备忘录贸易代表团(团长冈崎嘉平太)为结束日中备忘录贸易举行纪念宴会。

十一月二十八日 横滨市友好代表团到达上海。三十日宣布横滨、上海结为友好城市。

十二月九日 廖承志会长接见总评、中立工会联络会议友好代表团。

十二月十日 日中冰球友好赛在北京开幕。

十二月十二日 日中贸易协定在北京草签。

一九七四年(昭和四十九年)

一月三日 大平外相乘飞机到达北京。四日会见周恩来总理，五日会见毛泽东主席，六日归国。

一月五日 日中贸易协定在北京签字。

一月二十一日 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宣布结束活动。

一月二十三日 中国青年代表团到达东京。

二月一日 宣布奈良和西安结为友好城市。

二月七日 《日本与中国》编辑代表团(团长岩村三千夫)到达北京。

二月十八日 日本各界青年四千人于千驮谷体育馆集会，欢迎中国青年代表团。

二月二十七日 张香山副会长接见日中友好妇女代表团(团长小林时枝)。

三月一日 日本女科学家代表团(团长山田翠)到达北京。十日会见邓小平副总理。

三月十一日 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访华团(团长米内山义一)到达北京。

三月十四日 在北京重开日中航空协定谈判。

三月三十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社会党、总评等举行集会，要求立即签订日中航空协定。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乒乓球代表团(团长徐寅生)到达羽田。

四月二日 第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横滨举行。

四月三日 福冈市“青年之船”进入上海港。

四月四日 中国围棋代表团(团长陈淇)来日。

四月十七日 “神户—天津友好之船”进入天津港。

四月十八日 大阪“日中友好之船”进入上海港。宣布大阪、上海结为友好城市。

四月二十日 日中航空协定在北京签字。大平外相谈对台湾飞机上旗帜标志的看法。蒋帮声明关闭日台航线。

五月二日 天津市友好访问团(团长赵成武)到达神户。

- 五月七日 众议院通过日中航空协定。
- 五月八日 河原崎长十郎开始在日本全国演出《天平之甍》。
- 五月十日 西安市各界集会,欢迎京都市友好代表团(团长是船桥求己市长),会上宣布京都、西安结为友好城市。
- 五月二十三日 日中渔业谈判在北京开始。
- 五月二十四日 双方政府完成日中航空协定的批准手续,协定生效。
- 五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召开一九七四年度全国代表大会。
- 五月三十一日 廖承志会长接见日本创价学会访华团(团长池田大作)。
- 六月十日 东京都议会通过《关于东京都、北京市之间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决议》。
- 六月二十日 日中渔业协定谈判决定暂时中断。
- 六月二十六日 在横滨市召开中国船只航行日本十周年庆祝会。
- 七月四日 上海杂技团(团长林德明)来日。至八月二十二日在各地演出三十八场。
- 七月六日 在横滨举行日中友好体操比赛。
- 七月十三日——八月十二日 在大阪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
- 七月十八日 上海市友好代表团为访问横滨、大阪来日,八月七日回国。
- 八月三日 在东京举行的日中海运协定谈判,未达成协议,暂时中断。
- 八月十五日 邓小平副总理接见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团长竹入义胜)。

八月二十日 邓小平副总理接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团长胜间田清一)。

九月十四日 中国明清工艺美术展览在东京开幕。

九月十五日 中国少年武术代表团(团长魏明)一行来日。

九月二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展览会在东京开幕。十月十日闭幕。

九月二十二日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举行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

九月二十九日 日航和中国民航的班机首次相互开航。中日友协代表团(团长王震)、日本日中通航友好访华代表团(团长小坂善太郎)分别乘首航班机飞往东京和北京。

十月一日 北京举行庆祝国庆节游园会。日本的各代表团参加了游园会。

十月三日 邓小平副总理接见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代表团(团长黑田寿男)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团长中岛健藏)。

十月十一日 中国中央乐团(团长林丽韞)来日;在十三个城市进行了访问演出。

十月十五日 藤山爱一郎等二十名各界人士发表促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告国民书》。西安市友好代表团(团长孙长兴)来日。

十月十九日 在仙台举办鲁迅留学仙台七十周年纪念活动。

十月二十一日 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发行关于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特集《答十二问》。

十月二十二日 京都市各界二千人集会,欢迎西安市友好代表团。

十月二十六日 奈良市各界八千人集会,欢迎西安市友好代表团。

- 十一月二日 日中海运协定在北京草签。
- 十一月十二日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代表团来日。
各界知名人士在东京召开促进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大会。
- 十一月十三日 日中海运协定在东京签字。在东京举行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次预备性谈判。
- 十一月十八日 七四年日本印刷机械、包装机械展览会在天津开幕。
- 十一月二十六日 和歌山县“日中友好之船”进入上海港口。
- 十一月二十七日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总部举行创立二十周年庆祝会。
- 十二月二日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京都支局举行集会，庆祝创立二十周年。
- 十二月五日 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分别接见创价学会第二次访华团(团长池田大作)。
- 十二月八日 李先念副总理接见三井财团友好访华代表团(团长是三井物产公司经理池田芳藏)。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总部主持召开“争取实现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国民集会”，全国二千三百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